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书	202
号	119·1 2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 9.5印张 190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0册

书号 3230·43 定价 1.00元

**内部发行**

677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关于出版《中共党史资料》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为了发掘、积累和交流中共党史资料，以促进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并满足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内部刊物《中共党史资料》，于一九八二年第一季度创刊，以后各辑陆续出版。

“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本此原则，《中共党史资料》将尽力为学习、研究、编写党史提供有价值的新资料，及时反映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新成果。《中共党史资料》以刊载新征集到的党史重要资料为主，包括：新发现或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件；党史专题座谈纪要；专人、专题访问记；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日记、函电；重大事实的辨证、订谬、考据。另外，还将转载和介绍国内、包括台港以及国外各种书刊上发表的有价值的党史资



料。

《中共党史资料》的发行范围是：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党校、团校、各类干校、军事院校、大中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宣传教育组织部门，集体和个人都可以订阅。

创办《中共党史资料》的目的，是为研究和编写党史提供新资料。因此，它的内容力求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并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由于个人见闻有限，记忆有误，或者观点不尽相同，因此有些稿件涉及的事实难免有不尽准确甚至谬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特别希望亲历者和知情人给予补充和订正。

出版《中共党史资料》是件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提供所收藏的党史资料，希望熟悉我党、我军历史的同志踊跃写稿，并请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和党史研究部门经常提供稿件，大力支持办好这个刊物。来稿一经采用均给予稿酬；对有参考价值但不便公开发表的亦酌给资料费或赠送纪念品。来稿来函请径直寄北京一九二四信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 目 录

发刊词.....	廖盖隆	( 1 )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 4 )
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	赵 镛	(18)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	廖盖隆	(29)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记陈云同志主持的		
“七道江会议”前后.....	彭嘉庆	(48)
我的回忆.....	王维舟	(69)
一、幼年时期.....		(70)
二、三年学徒.....		(71)
三、辛亥革命与光复川东绥定、		
东乡地区前后.....		(72)
四、护国之役.....		(78)
五、在川东时期的旧军队生活.....		(79)
六、寻求真理，加入朝鲜共产党.....		(82)
七、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85)
八、“赤心社”与“俄灾救济会”的活动.....		(86)
九、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大革命的斗争.....		(87)

十、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 88 )
十一、红三十三军的成立及川陕边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97 )
十二、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 长征到陕北·····	(101)
十三、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	(106)
十四、陇东十年·····	(107)
十五、解放战争时期·····	(110)
十六、伟大的十年·····	(112)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114)
一、青少年时期和家庭·····	(114)
二、走上革命道路·····	(119)
三、在苏联的五年半·····	(130)
四、回国前后·····	(149)
五、在中央苏区·····	(154)
六、为李德作翻译·····	(167)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孙冶方	(180)
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高文华	(184)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刘培植	(189)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经过 ·····胡  琦  何华生  许明修	(211)
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 的地位·····罗征敬	(224)

参考资料摘登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238)

参考资料选译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摘译

.....美籍华人郭成棠 (256)

一、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 ..... (256)

二、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点 ..... (288)

# 发 刊 词

廖 盖 隆

三十年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曾经编辑出版过丛刊性质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现在这个刊物——《中共党史资料》，是根据冯文彬同志的提议，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

为什么要出版这个内部刊物呢？这是为了满足研究和编写党史的需要，而且是紧迫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党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胜利的道路。尽管党犯过不少错误，经受过不少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但总的说来，党的工作有了伟大的成绩，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回顾党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总结党的丰富历史经验，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地去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有力推动和可靠保证。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二年的一个讲话中就说过：“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又指出，搞清党史，“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



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是，从毛泽东同志那次讲话至今，又过去了将近四十年，我们还没有编出一部党史。

正是鉴于编写党史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紧迫的任务，一九八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九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研究和编写党史的专门机构。一九八〇年五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征集党史资料。这样，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党史研究、编写工作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

要研究和编写党史，首先必须搜集、核实和整理党史资料，陈云同志在两年前就说过，为了编好党史，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因为只有在掌握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党的历史的全过程，才能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才能编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此，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党史资料从内容来说，包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决策、执行政策的过程的材料，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敌人的材料，以及作为党史的背景、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材料等等。但是，就材料的类别来说，无非是已经见诸文字的书面的材料，以及保存在年事已高的有丰富的革命阅历的老同志的头脑中的“活材料”。收集文献资料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还

要花很大力量。但抢救“活材料”的任务更为紧迫。因为从党的创立时期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健在的只有一万八千多人了，而这些老同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做过重要负责工作和革命阅历丰富的，他们大多数已年老体弱，对他们脑子里的“活材料”，再不发动一个“抢救运动”确实不行了。党的长远利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代的利益，迫切地要求这些老同志抓紧时间撰写或向别人口述回忆录。胡耀邦同志说：“要奉劝老同志晚年写回忆录，不要留恋安排一个职位。这两者相比，前者对革命、对后代子孙的意义比后者大得多。”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写革命回忆录的号召，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的重视，许多同志写出了实事求是的、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回忆录。

《中共党史资料》这个刊物将以很大的篇幅来发表老同志撰写或口述的回忆录，并发表一些党外人士撰写或口述的有关党史的回忆录。同时，将发表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献资料；译载或选载国外或台港报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转载或摘录转载报刊上已经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的党史资料；还将发表经过党史工作者综合整理的党史资料，以及对党史上的重要事实提出修正或进行讨论的来信来稿。

《中共党史资料》是为全体党史工作者、党史的喜好者以及全体党员、干部办的，它只有得到革命老前辈和全党的大力支持才能办好。我们这个刊物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热烈地欢迎同志们踊跃来稿来信，提出批评建议！

#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 革命的历史

——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

(一九四六年九月)

〔编者按：本文在刊出前，经邓颖超同志重新审定，并在文字上作了某些修改。〕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



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滸》。

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

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〇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



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 \* \*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茎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

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作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

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作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〇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



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 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

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 \* \*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



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十五师，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

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即离开南征军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时，我曾去过一次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在西安参加和平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二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挺将军去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亦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到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〇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茂林事件）。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北视察新四军。顺路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七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〇年二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八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茂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

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为打败日本后，同意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又去重庆。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 朱德同志与辛亥革命

赵 镛

七十年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风华正茂的朱德同志初露锋芒，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在以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逐渐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为革命播撒种子

一九〇九年，朱德同志胸怀救国大志，决心投笔从戎。他离开家庭，肩担货郎担，沿途贩卖，以补助旅费之不足，与同学敬镛一起来到昆明，住在昆明市龙井街四川同乡肖大妈开的临阳栈内。他以原名朱代珍报考正在筹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次考试未被录取。朱德同志想，平时在校成绩常比敬镛稍优，为何敬镛被录取，自己却榜上无名？乃与敬镛交谈，得知此次只收云南籍生，临考时，敬镛随机应变，把籍贯改报云南大关厅人；而自己却仍以原籍四川人报考，故未被录取。于是二次改名朱德要

求补考，并报以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人，让店东肖大妈证明，乃被录取。同年，朱德同志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同盟会。

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成立于一九〇九年农历八月十五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先有学生四百九十三人，分甲、乙、丙三个班。甲、乙两班的学员全系新军及巡防营保送的士官，丙班的学员系由地方考取的学生。次年，随营学堂二百人并入讲武堂丙班后，又从丙班中选拔优秀生百余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同志品学兼优，由丙班选入特别班。

朱德同志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云南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了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斗争的重要场所。这个讲武堂，本来是清朝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新军，镇压革命而举办的，但讲武堂中建立了极其严密的全盟会组织。当时的教官大都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全盟会员和倾向革命的分子，他们经常在学生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培养人才。

讲武堂刚开学不久，法帝国主义将滇越铁路修抵昆明，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行。朱德同志和同学们前往车站参观时，目睹法帝国主义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火车头上插着法国的红、白、兰三色国旗，悲忿万分。回校后，朱德同志在《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的作文中，抒发自己的革命激情，申述救国拯民的主张。俟后，他经常和同学们秘密传阅《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等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的一些宣传革命的



刊物。

一九一一年，云南革命党人为在新军中扎下根子，积极准备起义，于六月将丙班学生三百余人分到新军十九镇各步、骑、炮、工标中入伍；八月又将特别班百余人分送到新军各标、营中去见习。这些讲武堂的学生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成为在军队中散播的革命种子。朱德同志当时被分配在十九镇（当时云南新军编制的番号为十九镇，相当于师）、三十七协（相当于旅）、七十四标（相当于团）第二营，以见习生的资格任付目（等于班长）。他广泛地接触士兵，在士兵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这时，朱德同志所在的部队中，革命党人已经控制了很大权力。三十七协协统蔡锷、七十三标标统罗佩金、二营管带刘存厚、三营管带雷飏等，除蔡锷外，其余都是同盟会员。朱德同志在二营，和士兵打成一片，平时代士兵写家信、看家书，和士兵们摆“龙门阵”，逐渐和士兵们密切了关系，并利用与刘存厚的同乡关系，互相掩护，很快在本班、本排、甚至本连中打开了局面，和其他连队的士兵也发生了联系。

未几，朱德同志担任了第二营左队的司务长，走出营门的机会多了，与外界联系也就更方便了。他利用哥老会的活动，很快与炮标、骑标、机关枪营及总督府的卫队营等部队中的哥老会弟兄们取得了联系，秘密进行革命串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一天，朱德同志以外出采购为名，和事先约好的同盟会员、哥老会



员及倾向革命的活动分子范石生、李凤楼、敬镛、金汉鼎、杨如轩等二十余人，在昆明市大观楼集合，乘船三只，作遨游滇池之状，待船驶至西山脚下，将船束在一起，开了一个关于积极参加云南起义的秘密会议。会上，大家情绪激昂，争相发言。朱德同志在发言中进一步解释了同盟会的“四大政纲”（即：（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及武昌起义后对云南革命带来的有利条件，并提出了积极参加起义的四项主张：（一）严密侦察云贵总督李经羲的言论及行踪，必要时把他拘捕囚禁。（二）策动十九镇中同盟会员及富于民族感的哥老会的弟兄们，积极作好起义准备。（三）严密监视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和镇参谋长杨集祥等一些反动头目的行动，必要时予以击杀。（四）拥护云南独立，组织民主革命的大汉云南军政府。

不久，朱德同志升任排长，做士兵们的工作更多了。他每日带着士兵们按时出操、上课，有的士兵学不会，他也不发脾气。课堂上，他耐心地给士兵们讲解学科（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等等）。操场上，他模范地带着士兵们练习术科（跳木马、翻单杠、跑缆桥以及制式教练、野外演习、识别地形地物等等），一次不会二次，二次不会再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直到学会为止。在整理内务方面，他逐个地教士兵们叠被褥、挂水壶、放饭盒、架枪架等等。他对那些农家子弟倍加体贴，常常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教导他们练好军事技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朱德同志还时常在新军中提倡

上下一致，废除打骂体罚制度，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但同时也受到了北洋军官们的嫉妒、排斥。然而，朱德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宽厚待人。他也知道那些北洋军官，不仅仅作风恶劣、思想反动，而且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在时机未成熟时，不和他们发生冲突，只是逐渐把连队中军事训练全盘掌握起来。当时清廷为防止暴动，停发子弹，朱德同志则巧妙地利用演习实弹射击的机会，秘密地要求每人暗地留下四、五发子弹，静待革命时机的到来。

## 生擒总督李经羲

当朱德同志被分到新军中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时，云南革命党人在总体上的准备也日臻成熟。在新军中，革命党人和讲武堂的学生控制了大部兵力，少数满人及忠于清廷的高级官吏，如总督李经羲、藩司世增、十九镇统制钟麟同、镇参谋长杨集祥，总参议靳云鹏，兵备处总办王振畿等，虽在精心防范，但他们只能在上层掌握少数部队。

辛亥年农历九月初七（阳历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晚，蔡锷同罗佩金、谢汝翼、李鸿祥、雷飏、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等革命党人会商于唐继尧家，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午夜十二点起义。公推蔡锷为起义总指挥，各部队统归蔡锷调动，一起率队入城。

农历九月初九（阳历十月三十日）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驻北校场的七十三标三营管带李鸿祥正在组织部队进行临战前的准备时，排长黄子和、王秉钧、文鸿逵等派士

兵抬子弹，被值日队官唐元良，右队官安焕章发觉，打了起来，士兵们一时忿怒，将唐元良、安焕章和督队官薛树仁等三个反动军官击毙，顿时兵营一片混乱。这时刚到晚上八点四十分。李鸿祥见士兵们群情激忿，事已泄露，于是毅然集合部队提前行动。北洋派的一、二营管带齐世杰、成维俊及其他一些顽固队官孔昭国、李敬符等见势不妙，吓得在混乱中逃跑了。李鸿祥立即命令刘祖武为三营管带，迅速整理队伍，在击溃标统丁锦带领的卫队后，便率部队向北门进发了。当部队刚行进到北门外时，正好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闻讯赶到，同李鸿祥一起指挥七十三标打退了李经羲派来阻截的一哨巡防队，浩浩荡荡地杀入城中。这时才九点多钟，距原定起义时间还有近三个小时。

李经羲闻变后，一面急调骑兵团入城死守；一面急向蔡锷呼救，在电话中乱喊乱叫：“松坡！松坡！北面枪声紧急，七十三标兵变，你赶快入城援救！”蔡锷听到后，趁势答道：“好！好！我马上增援！”蔡锷放下电话，立即在离昆明市五里地的南校场，集合七十四标和驻附近炮标部队，郑重宣布：“我们起义了！我们反正了！我们云南就要独立了……！”整个南校场欢声雷动，起义部队迅猛向城中冲去。

这时的七十四标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晚，为组织起义，原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悄悄到了巫家坝三十七协与蔡锷密议，假造七十四标三营管带起义的情报，把新任标统唐尔锷吓跑了。罗佩金又回七十四标当了标统，指挥七十



四标队伍积极配合前进。同时，撤掉了一些表现不好的军官，逮捕了其中的顽固派。朱德同志所在连队连长被撤职，蔡锷指定朱德接任连长。

朱德同志率领本连一马当先，奋勇冲向南城。南城骑兵团的人大声问道：“干什么的？”朱德同志答道：“是打野外演习回来的，不要开枪！”骑兵团派两人前来查看时，朱德同志发现其中一人象哥老会弟兄，乃悄悄告诉他们：“反正了，不要打了！”这样，骑兵团不但没有阻止他们进城，反而大部参加到了起义行列中来。

午夜十二时许，各路起义军全部进到城内，相继占领了所有城门，控制了交通要道，并分别向总督府、军械局等地进行了重点进攻。李经羲等企图挽回败局，一面死命扼守总督府、军械局等要地，一面由钟麟同、靳云鹏亲率巡防队两营、辎重营、宪兵营及两挺机关枪，占据五华山，居高临下，向围攻军械局的起义军进行夹攻，激烈的枪炮声响彻了昆明城的夜空。

朱德同志带本连参加围攻总督府的战斗。辎重营两连并配有两挺机关枪，依仗着坚固的工事，进行负隅顽抗。可是，在防守总督府的士兵中，有些人受到革命影响，有些哥老会员早就同朱德同志有过秘密联系，所以并不真心为李经羲卖力。进攻总督府的战斗得到了炮兵支援时，开花炮弹击中府中大树，把树炸倒，辎重营管带当即惊死，士兵们纷纷缴械，起义军在唐继尧的带领下，占领了总督府。总督李经羲惊恐万状，坐卧不宁。他听四面的枪声越响越近，他所仰仗的蔡锷，已成起义首领，他信赖的骑兵

团、机枪营也纷纷反正，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只好逃之夭夭。

次日，起义军攻克军械局，占领总督府后，又立即集中兵力，拿下了五华山，钟麟同、杨集祥被打死。

这时，朱德同志承担搜捕李经羲的任务。原来，李经羲夤夜潜逃后，企图到法国领事馆避难，但枪声紧急，唯恐遭捕，乃仓促跑到二鑫街（现民生街）肖巡捕家躲藏。朱德同志带队捕查时，得到肖巡捕的邻居密报，便在肖巡捕家楼上天花板内活捉了李经羲。李经羲向朱德同志跪地求饶，朱德同志指着他的鼻子，义正词严地说：“你这利欲薰心，为虎作伥的罪魁，甘愿卖身异族，涂炭中华子孙，已属十恶不赦，云南父老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死心踏地，再图为非作歹，这是死路一条；一条是迅猛回头，赶快立功赎罪。是生是死，由你抉择！”李经羲急忙叩头说：“我有罪，我认罪，请告以立功赎罪的明路。”朱德同志说：“你要想彻底悔过，就赶快给三迤当局（指迤南、迤西、迤东）发电，晓以大义，要他们立即响应昆明的革命举动，和平实现全省光复。”李经羲立即答应照办，给迤东的镇台夏豹伯、迤南蒙自关道尹龚心湛（所部辖四十九个边巡防营约一万余人）发电。这样，云南兵不血刃就改换成共和旗帜。朱德同志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蔡锷汇报，得到蔡锷的当面嘉奖，赞美朱德才华出众，智勇双全，军政兼通。后蔡锷念李经羲能悔过自新，电三迤起义，使云南顺利光复，便以礼相待，送出河口。

九月初十，革命军完全占领了昆明全城。清朝官吏除

李经羲被活捉外，藩司世增也被拿获。提法司杨如璋、提学司叶尔恺、巡警道郭灿、粮道曾广铨、劝业道袁玉锡、盐道毛玉麟及阖城文武官吏，均来投诚。接着，省城外府州县，传檄而定，大理、永昌、腾越、临安、蒙自、昭通、东川等地的新军和巡防营纷纷就地起义，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朱德同志在七十五岁高龄回忆辛亥革命时，曾吟诗一首，描述五十年前亲身参加的云南辛亥革命的景象：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夕庆开场。”

### “出师两路援川鄂”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即农历辛亥年九月十一日），云南宣告独立，正式成立革命军政府，公推蔡锷为都督。

军政府成立后，蔡锷认为光复大业决非一省大事，北廷未覆，其责未尽，故拟联军北伐。是时，武昌、云南革命之举，大大鼓舞了四川民众，保路同志军急骤发展，端方和四川总督赵尔丰合力向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反扑。蔡锷为支援四川革命，并进而实施北伐计划，首先派出一路大军入川参战。月底，当汉阳失守时，蔡锷耽心清廷复振而导致辛亥革命功亏一篑，又毅然编定第二路北伐军，命唐继尧为司令，拟取道泸州，与先期援川军会合，夺取成都。成都得手后，循江东下，进窥襄阳，径取中原。朱德同志亦曾有诗赞此大举曰：



靳逃钟死<sup>①</sup>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sup>②</sup>，出师两路援川鄂。

第一路援川大军是农历九月二十五日（阳历十一月十五日）出师的。谢汝翼率第一梯团，取道昭通，向叙府前进；李鸿祥率第二梯团由毕节出泸州，到成都会师。当时，朱德同志随第一梯团入川。他们一路之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四川人民的热烈欢迎。沿途，连续击败了清廷驻各地的巡防营，直夺叙府，占领宜宾，随即渡江，向自流井前进。

自流井，系全蜀财源之地，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财政来源大半出于自贡两井。赵尔丰派了一个精锐巡防营驻守自流井。这个所谓“精锐营”，在四川保路同志军和云南援川革命军的威慑下，士气十分低落；其所谓精锐武器，也不过是一些单响枪、九响枪、老毛瑟，而大部武器都是乌铳和明火枪。他们一和革命军接触，即鸡飞狗跳般地散了下去。朱德同志很风趣地讽刺说：“他们是在空葫芦里装炒豆，摇得呱呱叫，借以吓唬人！”

赵尔丰见第一梯团直捣叙府，大有攻入成都之势；第二梯团亦已由黔入川，自觉难支，便于农历十月十九日逃入西藏，成都驻军即日反正，清臣端方在资中为其部下所杀，四川宣告独立。

四川独立后，成都民军推蒲殿俊为都督，蔡锷即命谢汝翼、李鸿祥分驻叙府、泸州，镇守地方，安抚人民，待

① 指靳云鹏逃，钟麟同被打死。

② 云南军政府设立在五华山。

机北伐。可是，由于“川事糜烂，仇杀相寻，军府林立，不能统一”，清廷钦差大臣傅华锋、统领风山、驻藏大臣联豫又领兵万余由雅安邛崃进扑成都，蜀军屡败。西藏叛军进据巴塘，英国也增兵入藏。是时，成都兵变，蒲殿俊逃走，政府乃助匪伤民；重庆方面，倡义者诸人被杀，全蜀骚乱。为此，云南援川军只得奋起平定川乱，再议北伐。待乱平之后，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于是，一九一二年农历五月初，援川军撤回昆明。

另一路，由唐继尧率领北伐军，取道贵州省境，亦正遇黔省革命成功后发生内讧，蔡锷受黔省绅民邀请，命北伐军协助黔省平乱，唐继尧当了贵州省都督。

一九一二年农历五月，云南军政府在昆明南校场巫家坝召开庆祝援川胜利大会。蔡锷在大会讲话中，赞扬朱德同志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授予朱德同志“光复”、“援川”勋章各一枚，并晋升为少校营长。

不久，朱德同志调到讲武堂任教官，兼任生徒队队长，继续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培养人才。当我们回忆这段历史时，对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护国、靖国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应予以肯定和赞扬。可是，一九一六年讨袁护国之役以后，这个讲武堂却变成了军阀扩充实力、培养亲信、制造派系的场所。朱德同志胸怀远大的革命志向，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激流中数年，在珠目混杂的环境中，泾渭分明，避恶扬善，无不令人敬佩。

（一九八一年十月）



#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蔡和森

廖盖隆

蔡和森同志，湖南湘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一九三一年冬初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是伟大的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如周恩来同志生前所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也正如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九月为《蔡和森文集》出版的题词所说：“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

## “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

蔡和森同志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他和妹妹蔡畅、母亲葛健豪、以及其他革命青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探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翌年初到达法国后，他一面学习法文，一面“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仅在半年内，他就读了大约一百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且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这年七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蒙达尼会议上，提出新民学会的宗旨应当是：

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年八月，他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蔡和森在信中提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这就证明了中国社会对于创建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确实有了需要。他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热烈的赞扬。毛泽东在同年十二月一日写给蔡和森和新民学会留法诸会友的信中说，他“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蔡和森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同样旗帜鲜明地指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蔡和森在留法期间，一面把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中的大多数和其他革命青年引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一面又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一

九二一年下半年，蔡和森和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名中国留法学生，因为进行反对法国借款给中国军阀政府，反对华法教育会扣发中国留学生的津贴的斗争，被法国政府拘捕，随后被武装押送回国。

蔡和森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从事宣传工作。

## 杰出的理论家和卓越的 革命群众运动领袖

蔡和森参加了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指定参加起草大会政治宣言，制定了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从“二大”起直到党的“六大”，历届大会他都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并在“二大”以后担任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主编。他在《向导》周报上先后发表了大量的（仅署名和森的就达一百三十多篇）充满理论力量和革命激情的文章，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批判敌人的各种反动宣传，同时批评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向导》一创办就获得了普遍的好评，被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黑夜沉沉的中国的“曙光”，真不愧是几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向导》。在几年间，《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就从几千份扩大到十万多份。

蔡和森总的说来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同以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为代表的党内右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

领导人。当然，他有时也犯过左的错误。例如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他主张只能和小资产阶级合作，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同时又认为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但是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错误主张，并且强调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我们党的独立性，和争取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却是完全正确的。随着革命运动的逐步高涨，蔡和森还提出了“武装工农”的口号。一九二五年二月，他忠告广东的革命政府当道们，“须知在近年各种巨大事变中试验出来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真正保卫者，现在大敌当前，你们应完全信任工农，武装工农，不可专恃那些纵横捭阖的赳赳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高潮到来了。实践证明，蔡和森不仅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群众革命运动的领袖。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群众革命运动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潮。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有利的形势，并且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党应该不失时机地把上海一地的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而关键就在于把工人的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并且把工人和学生的反帝斗争，汇合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商、学各界的反帝运动中去。他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当领导本阶



级及全体人民，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要分头到工厂、学校、商店去进一步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在五月三十日，集结到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

但是，蔡和森的这个正确主张却遭到陈独秀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这是“空泛不切实际之谈，”甚至断言：“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我们能撑出个什么局面！”蔡和森当即痛驳了这种错误论调，指出，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的观点，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革命形势，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现在进行的反帝斗争，决不是三、五百人，而是三、五万人，还要把运动推到全国去。”与会的多数同志赞成蔡和森的主张，因此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并决定立即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会后蔡和森和刘少奇、李立三、向警予等投入了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如蔡和森所预料，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大示威爆发了。十多万的工人和学生走上了街头。五月三十日晚上，党中央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蔡和森在会上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党中央采纳了蔡和森的这些正确意见，反帝运动迅速扩大，“三罢”斗争实现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起来了。这个反帝大示威很快就普及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参加示威的群众共达一千二百万人。就这样，“五卅”大示威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第一次伟大高潮的起点。这次革命高潮，从根本上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蔡和森是我们党应当引以自豪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战略家。

### 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正确策略

一九二五年十月，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会议开完以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才回国。在这期间，蔡和森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他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在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作了共有五万字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党的“一大”到“四大”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明确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说：“由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分析，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

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是应该夺取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方能够实现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危急关头，蔡和森回到了祖国，四月初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武汉。四月十二日，混入革命营垒、窃取了国民革命总司令职位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面对着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顽固地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方针，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惜一切代价要搞好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四月二十七日，党的“五大”在武昌召开。蔡和森出席了大会，他同其他代表一起，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坚决斗争。蔡和森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到职前，由蔡和森代理。

五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唐生智部下的高级军官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蔡和森多次建议予以坚决反击，并提出要以暴动对付暴动，以便把反动派的气焰镇压下去。但是，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接受。不仅如此，党中央还在六月二十四日决定改任邓中夏为中央秘书长；在邓中夏到职前由张国焘代理，并决定蔡和森不再代理中央秘书长。



蔡和森因此告病假，到武昌毛泽东的住宅休养。在那里，蔡和森每天都接触到从湖南来向毛泽东要求对反动派的屠杀进行反击的农民代表，这就使蔡和森更加相信自己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是正确的。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在毛泽东住所给中央常委写信，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他建议“中央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实力，做军事计划，以防万一。”在这以后，蔡和森又多次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同样的主张。但是，坚持右倾投降主义方针的中央领导人不但拒绝采纳，反而攻击蔡和森是“天天写信唱高调”，从事左派的宣传。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以避免国共分裂，其结果是促使汪精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行“分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完全破产了。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委成立，陈独秀停职，罗易和鲍罗廷也相继被召回苏联。十三日，党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实行宁、汉合流，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为了挽救革命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八月七日，党中央临时常委会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针。蔡和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和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邓中夏



等一起坚决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会上，蔡和森竭力主张把站在正确立场上同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毛泽东选进政治局，他自己则申请到湖南组织湘赣秋收起义。这次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彭湃等为委员，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候补委员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可是中央领导没有派蔡和森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决定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去北方局指导党的工作。

### 重要的历史理论著作《党的机会主义史》

“八七”会议后不久，蔡和森就从武汉到达北京和天津，恢复北方局的机构。九月十日，蔡和森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告。二十二日，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召开改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整理出来全文发表，以“供发展党内讨论之助”的。

《党的机会主义史》对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作了详尽、生动和深刻的论述，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在这个报告里，蔡和森充分肯定了党在幼年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积极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在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建立以后，又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掀起了“五卅”运动的高潮，并在北伐战争中取得了巨大发展。“中

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百万以上，农民到千几百万以上。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东东江及琼崖各县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蔡和森在这个报告中系统地批判了党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对的。“我们从三月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使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根本亦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唐生智、许克祥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

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对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是逃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的责任。”在这方面，蔡和森用大量的事实揭发批评了陈独秀、鲍罗廷以及“深中‘汪毒’”的罗易的错误。

蔡和森在报告中指出，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就是党内完全缺乏民主和党的领导机关完全脱离群众。在这里，蔡和森作出了共产党内必须具有充分的民主生活的极其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可以说，他是我们党内主张在我国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伟大先驱。他说：“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象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挥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内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挥其创造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就动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



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指挥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很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首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员都有超越此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

蔡和森由此作出的结论是：“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领导机关，党内事情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这个报告里，天才地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的伟大任务。他说：“党不是要改造成为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根本是要肃清政治上和组织上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丰富的



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蔡和森的这个富有预见性的论断是非常光辉的。我们党就是这样做了。我们党建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理论是逐步形成的，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逐步正确地结合起来，不断总结历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经验而形成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是我们党的理论形成的开始阶段或萌芽阶段。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都为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

## 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和武装割据的可能性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蔡和森出席了这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多次发言，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在这些发言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是他批评了盲动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说，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说革命形势仍在“一直高涨”，“我觉得不妥”；“从‘八七’到现在，

中央政治局维持革命一直高涨的分析。这种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革命论的分析，是在‘八七’后大毛子罗明纳兹同志发明的，‘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这种分析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偏于否认敌人的强点，只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也应该估计到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敌人来消灭自己”。

蔡和森同志也反对张国焘发言中“完全否认一切直接革命形势”的看法。他说：“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部分地方而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和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

由此，蔡和森作出结论：“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第二，蔡和森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进而得出结论：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建立割据局面

是可能的。他说：“游击斗争方面，这个问题在策略上的主要问题首先要问，游击斗争是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以事实看，无论那个地方，农民运动起来，很快的就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现在分几方面来看：（1）游击斗争与过去零碎斗争方式已改变，零碎斗争易被敌人分段击破；（2）游击斗争得到的是什么？从前说大一点游击斗争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这不仅在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红军而已，现在的问题在游击斗争的出路怎样？”“这里讲到分配土地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以没收土地。部分的建立政权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有可能，而且是必需的。”

由于认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实际经验，蔡和森已经极其接近于得出同毛泽东一样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了。

## 在党内蒙受打击和为革命壮烈牺牲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继续当选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大”以后，蔡和森和李立三等随即回国。

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发动反对布哈林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党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七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错误的消息就传到了中国。当时掌握实权的李立三，就依样画葫芦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反起“右倾”来。他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蔡和森，把蔡和森维护党的“六大”决议，反对冒险地进攻大城市的正确主张，错误地攻击为“右倾”错误，并撤销了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蔡和森受到这种严重的错误打击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继续斗争，毫不悲观失望。不久他的哮喘病发作，只好离开中央机关，一面看病，一面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国民党借辛亥革命纪念日大做文章，说什么辛亥革命开始的事业已经完成，中国已经“统一”，现在的任务是五权宪法，阶级合作等等。蔡和森撰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一文，驳斥了国民党的上述欺骗宣传。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表现了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使革命遭到了挫折，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才使辛亥革命事业复兴起来。但是就在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的重要关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严重失败。往日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叛变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借着国民党做工具，更残酷的统治现在的中国。所以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建立真正独立统一自由的平



民式的民主共和国等——一个也没有完成。但中国革命仍将向前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消沉。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存在一天，中国便一天也不会统一。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蔡和森又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革命和前一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主要特点就是：“第一，这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重要地位，超过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第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完成；第四，因此，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即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权主义独裁制；第五，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且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蔡和森还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革命条件。”实践证明了蔡和森的革命转变论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党的正确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二八年底，由于蔡和森的病愈来愈重，党决定送他去莫斯科治病，并派他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莫斯科以后，蔡和森仍然不顾重病努力为党工作。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蔡和森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讨论。他在一九二九年五月批判陈独秀的错误的发言，后来在一九三一年整理出来以《论陈独秀主义》为题全文发表。

在肯定蔡和森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的同时，还应该提到，他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例如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又如，他由于受到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倾情绪的影响，而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永远背叛了革命；他夸大了路线斗争的意义，错误地认为“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他还不顾当时党内的问题是左倾错误，而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中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危险”。但是总起来看应当说，这些缺点错误在蔡和森的遗文中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蔡和森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是非常宝贵的。

一九三一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投入新的斗争。但是他回到上海后，继续受到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和打击。他们没有恢复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又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不久，党派他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他于三月前往香港，在那里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

工作。六月间，熟悉蔡和森的叛徒顾顺章窜到香港侦察蔡和森的行踪。六月十日蔡和森在参加一个海员工会的会议时被顾顺章认出而被捕。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六月间决定恢复蔡和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但蔡和森殉难前并不知道。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设法营救，但是他很快就被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匪帮政府了。国民党匪帮政府对蔡和森施尽了各种酷刑，他无数次被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但是蔡和森始终坚贞不屈，对党的机密没有吐露半个字。这年冬初的一天，国民党匪帮把蔡和森拖到监狱的墙边，将他的手脚拉开，用几颗大铁钉把他钉在墙上，野蛮地用刺刀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最后戳穿他的心脏。蔡和森英勇坚定地共产主义事业而壮烈殉难了，他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蔡和森高尚的坚贞的革命精神，他建立的伟大功业，他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将永垂不朽。中国人民将世代记着他，学习他。中国人民将继承蔡和森和其他无数革命先烈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而努力奋斗！

（本文的摘要曾在《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发表，这里刊载的是包括对重要的历史理论著作《机会主义史》的评论在内的全文。——作者注）



# 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

——记陈云同志主持的“七道江会议”前后

彭嘉庆

在东北的大地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人民解放军曾有过“四保临江”的光荣历史。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里，南满我军在北满兄弟部队“三下江南”战役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粉碎了蒋军四次对临江解放区的进犯，挫败了东北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使敌人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这一段既是我们在东北最艰难的历程，又是从困苦走向胜利的转折。夺取“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是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方针的结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间辽东军区党委召开的“七道江会议”，是直接决定这一胜利的关键会议。

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如此事关重大？现将我所接触到会议前后的情况忆述如下。

## 乌云密布

一九四六年秋，东北蒋军占领了四平后，深感兵力不



足，鞭长莫及。为了改变其战线过长之颓势，采取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于十月倾其东北主力八个师约十万人，分三路向南满解放区进攻，妄图先破南满我军，解其后顾之忧，稳住后方，转而进攻北满，以实现其占领全东北之迷梦。我辽东军区基于敌强我弱之势，根据上级指示，主动避敌锐气，放弃了军区所在地安东，将机关迅速转移到临江。我四纵队完成了掩护机关和后方后撤的任务后，于十月底至十一月二日，在新开岭地区全歼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而后奉命北上，也准备开到临江地区，与军区机关及三纵队主力会合。

北上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早在我们组织新开岭战役之际，蒋军其他部队已占领了通化、桓仁、安东、庄河等南满大部分解放区。敌所到之处，多方收罗土匪、特务，扶植地主、伪满人员，建立反动政权和组织各种游杂武装。大大小小的“坐山雕”趋炎附势，重新起来欺压群众，行凶作恶，反攻倒算。我不久前才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象刚露土的幼苗被践踏摧残下去。大批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被血腥镇压。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随着凄冷的严冬笼罩着南满大地。我们四纵打完新开岭战役后，冲破敌人几个师的追堵，沿太平哨、沙尖子、集安方向北上时，一路目睹的村镇，都被敌人破坏了。那些情景实在惨不忍睹，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使人怒火万丈。敌人为了困死我们，想方设法从各方面进行封锁，所到之处，大量并村修路，妄图把老百姓同共产党、解放军隔绝起来，若知谁与

我党我军接触，即抓去做苦工和受刑。群众被蒋军和伪满人员整怕了，也不敢公开大胆地靠近我们。一路上，部队有时连找个向导都困难。所到圩镇，连一颗铁钉也买不到，马蹄脱了也找不到钉子钉。我们在新开岭全歼敌二十五师时，打的是运动战，天气还不太冷，干部战士为了轻装行动，都把棉衣棉裤丢下。没有料到一打完仗就向北开进，找不到冬装补给。越往北走越冷，饥寒严重地威胁着部队，加之还带着几千俘虏，也找不到药品给伤病员治疗。战士们埋怨说：“打了胜仗为何还后撤？”一些老百姓见到我们往北走，都摇头叹气。有的人说：唐代薛仁贵征东，高丽将军盖苏文就沿此路进入一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满洲溥仪皇帝一九四五年也是沿这条路逃走，到大栗子被苏联红军所擒。你们不要重蹈覆辙呀！就算杨靖宇将军那样革命，被关东军追逼，无路可走，上了长白山，也没有下来，你们现在要走这条路，肯定有去无回！虽说我们不怕任何困难，但我们从来没有上过长白山，面对此情此景，也有些心寒。人们对前途的看法，就象望见飞舞着风雪的群山一样——一片白茫。以前日本关东军在这一带搞过并村，因此我们越往北走，人烟越稀少，有时走了半天见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在没有冬装御寒的条件下连续长途行军，掉队人员较多，一时又找不到兵员补充，困难越来越多，指战员的思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但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大讲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如何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传统作风，加上我们领导干部与大家同甘共苦，跟战士们一样走路，一起

抬担架，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到十二月初，好不容易跋涉到铁厂子、六道江一带，与军区领导机关及三纵队主力会合了。

当我们到那里时，整个南满解放区的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我们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长白、抚松等四个县，其余地区全部沦陷。在这个荒凉狭小的地区里，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交通落后，人烟稀少，整个地区只有二十多万人。在此隆冬季节，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机关和安东省委机关一部分，以及三纵、四纵主力部队，都聚集在这小块山沟角落里，粮食供应困难，装备不足，兵员无着，一切人员的衣食住藏都成了大问题。加之敌四个师兵力正向这个地区猛扑过来，情况日益危急。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上上下下的心情都很焦急，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才是万全之策。

## 去 留 攸 关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电示东北局要做各种准备。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将原辽东、辽宁两个军区合并，并派陈云、肖劲光同志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陈云同志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同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我们四纵队到了六道江后，可能是为了保存和聚蓄力量，军区最初打算由机关率三、四纵队主力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



合，指示我带四纵队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我们纵队领导干部对军区这个意图不大理解，感到南满根据地危在旦夕，都为南满命运担心。这个决定象寒风一样，一阵阵紧抽着人们的心，搞得上上下下都心乱如麻，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了一年的南满根据地，难道就这样丢掉了吗？有的同志甚至怀疑：这么大的决定，报告了党中央没有，中央知不知道？尽管当时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不通，心情沉重，但接到指示后，还是坚决服从，抓紧时间，做好上长白山的各种准备。部队已换了轻装备，筹备了上山的斧头、锯子、绳子等工具，带上了过冬用的辣椒面和其他东西。有的机关和部队即将分开，准备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上山。正当部队整装待发之际，军区又发出通知，要我们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

“七道江会议”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陈云同志有事在临江没到会，由肖劲光司令员主持。因他刚到南满不久，会议主要由肖华同志具体组织。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目前南满的形势、今后的作战方针和布置军政教育训练问题。同时，大家也想借这个机会，表示欢迎陈云、肖劲光同志来南满工作。会议首先布置了部队整训问题，紧接着讨论作战问题。当时大家都共同主张好好与敌人打几仗，但究竟怎样打，开始时出现了几种意见：一是把三、四纵队拉到临江正面并肩与敌作战。二是留三纵队在临江正面打，四纵队分散到敌后打。三是两个纵队留在南满力量小，不好打，要开到北满与其他兄弟部队相配合，打几个大仗，



一块一块地吃掉敌人。几种意见各有理由，争论不休。随着争论问题的深化，不知不觉都把话题转到是坚持南满还是到北满的问题上来，出现了重大分歧，愈争愈烈。有的同志主张放弃南满北上。有的同志主张坚持在南满斗争。有的同志主张大部到北满，小部留在南满。也有的同志主张先在南满打一仗看看，打不赢就北上，打得赢就坚持下来不走，等等。当时虽是零下三十多度，外边滴水成冰，但同志们在小房子里争论这些问题时，就象开水在锅里翻滚一样，热闹得很。肖劲光同志听到大家这些意见后，非常谦虚谨慎，在此关键时刻，他没有武断下结论，而是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主张放弃南满北上的理由：一是不能在长白山与敌人决战。因为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是想把我南满主力赶到长白山，在长白山决战，能将我消灭就消灭，消灭不了也把我困在山上饿死冻死。而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加上兵员、粮草缺乏，不是主力久留之地。若在此地与敌决战，寡不敌众，势必把主力拚光，恰恰上了敌人的圈套。二是主力离开南满到了北满，以松花江为依托，可摆脱敌主力追击。与北满主力会合后，兵力集中，力量雄厚，不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三是到了北满，若有危急情况，可背靠苏联，比较保险，等等。

主张坚持南满反对北上的理由：一是要把敌人主力拖在南满。敌“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是打算在松花江结冰之前，以小部兵力凭江为险，阻我北满主力南下，而集中其主力围歼南满我军。但经过两个月作战，并未达到目

的。现在眼看封江，天险即将夷平，心急如火，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把我压缩，围歼于长白山下，或把我困死于长白山。如果我主力北上，只留小部兵力于南满，势必顶不住敌主力进攻和围剿，等于放弃南满。这正适合敌人的战略意图，解敌后顾之忧。从全局看，东北战场的胜负问题，虽说主要靠北满主力，但南满现在却是主要方面。要是我主力留在南满，与敌周旋，可在敌人的“屁股后边吊个大冬瓜”，拖住敌人的主力。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困难多，代价大，但对整个战局有利。在南满吸引和杀伤敌人越多，越有助于全局的胜利。二是南满战略地位很重要，不能丢。南满是东北的工业中心，比较富，又是海上与内地交通要道。北满与南满相比，有几个不如：人口不如南满多，群众基础不如南满好，工业不如南满发达，气候不如南满暖和，地形不如南满有利。而南满小丘陵地多，便于大小部队活动。这些条件只要利用得好，我们定能在南满站稳脚。三是坚持南满，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主力若到北满，就失去南满的各方面基础，将来反攻回南满时，要花很大力气。若留在南满，既能积蓄力量，为反攻打下基础，又不让敌占区连成一大片，反攻时就容易得多。四是敌人在东北没有增加作战部队，正规军只有七个，其他是杂牌军，经过几个月作战，占领了许多地方，又背上很多“包袱”，拉长了战线和前后方距离，运输困难，兵力分散，不可能集中兵力马上置我于死地。五是既然到北满，有危急可依靠苏联，那么留在南满有了危急也可在苏军管辖下的大连旅顺“避雨”，还有朝鲜也可作依托。六是如果

集中力量打一仗再定去留之策，为时已晚，心情不定，决心不硬，可能打不赢，就是打赢了也出不去，走不了，损失会更大，不如早定坚持南满之计。

会议开了两天，去留的几种意见还僵持不下。会开到十二日晚上，突然接到情报，获悉敌一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已向集安进攻。军区马上决定，会议提前结束，各师负责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作准备，对付敌人进攻，先打一仗看看，打得赢就留在南满，打不赢就五个师到北满，四纵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留下坚守长白山。纵队以上干部留下来继续讨论南满军事方针和作战问题。因我是纵队政委，便留了下来。当时，我和军区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同睡一个床。他也主张留在南满，眼见敌人已逼近，而我们作战方针还未定，心焦如焚，怎么也睡不着，老是与我议论去留问题。我见到其他同志也是一样，碰在一起都谈论这个事，有的人还争得脸红耳赤。不管哪一种意见，都是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都是对革命战争高度负责的表现，只不过是各人看法不同罢了。

### 三 槌 定 音

由于敌人开始进攻，我们对去留问题的意见还统一不起来，作战方针就更不好确定，军区党委便请陈云同志从临江来参加会议。

陈云同志是十三日晚冒着大风雪连夜赶来七道江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在房子里烤火，焦急地等待着



他，是去是留，等他来裁决。到了深夜十点多钟，他才赶到。他进来时，首先向大家问好，给人带来一种轻松亲切的感觉。有的同志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有的说：“我们心情都很紧张，等你来决定问题。”他非常谦虚地说：“肖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我们见夜深了，劝他早点休息，明天好开会。但他不肯，说要跟我们互相扯一扯。关于主力是到北满还是留在南满的问题，他来七道江之前，曾在临江征求过一些同志意见。到这里与我们交谈时，对南满的敌我情况还问得很细。他平时喜欢用“作文章”来比喻研究解决问题，这次也是一样，问我们：“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我们在房子里一边烤火，一边毫无拘束地议论着各种问题，陈云同志兴致勃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一直到了凌晨三时，才分散休息。

十四日，我本来有事要回六道江，但早饭后，陈云和肖劲光同志要我继续留下来开会，参加讨论南满军事方针问题。这天的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肖劲光同志先将前两天会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陈云同志听了后，又象昨晚一样，问大家：“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我听了他这么一问，感到他不是来一板定案，而是来跟大家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在这种民主风气之下，尽管外边敌情严重，形势咄咄逼人，但屋子里讨论问题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有的同志说：南满没有多少文章可作了。有的同志却说：



文章还是有做的，看是做什么文章，是作大文章还是作小文章？陈云同志在会上很少说话，一直耐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从容不迫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以前很少见到。

这种辩论足足进行了一天。到了晚上，陈云同志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我听他这么一问，估计可能要在南满作大文章，便回答说：“看怎么放法。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以放一个军。”有些同志同意这种看法，有些同志则表示异议。陈云同志见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便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一言九鼎，落槌定音。为什么都留在南满？他说：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五个师上北满，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有十个师跟着进北满。就算我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即可牵制敌四个军。权衡利弊，还是在南满大有作为。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敌人占了，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大胜仗，将来要回来就难了。只要把长白山留在我们手里，群众就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他还阐述了能够坚持南满的许多理由，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艰苦奋战，以新的姿态与敌人斗争到底！他当时是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

政委，看问题的角度高，考虑问题全面，具有驾驭整个局势的能力。大家听了他的分析，都很信服，都拥护和赞成他的意见。他这一裁决，结束了几天来的争论，在关键时刻，稳定了众人的混乱心情，统一了大家的意见，改变了会议的气氛。我感到这一槌定音，定得准，定了南满根据地的命运，定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要留在南满，怎么样留？主力部队是留在现地跟敌人硬顶？还是打出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主张派一部分部队插到敌人心脏地区活动，从后方积极打击敌人，逼其调回一部分兵力保“家”，减轻我临江正面的压力，这样，效果要比正面与敌硬顶好得多。

当讨论到由哪些部队打到敌后时，会议气氛又大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沉住气不表态。这种沉默僵持了好一会，使人很难受。因为已到深夜，不能再这样呆下去。肖劲光司令员就说：“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大家又沉默了好一会。司令员催了几次，我就说：“我们四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就撤到这里，伤病员还没有很好处置，新兵尚未补充，几千俘虏还来不及消化，部队冬装还未解决。按理说，不应轮到我们去，但为了顾全大局，如领导上需要我们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出去……”

“好！由你们打出去。”还未等我说完，陈云同志马上表态定夺，这算是他的第二槌定音。

接着陈云同志问：

“你们出去有什么困难？”我当时感到深入敌后，不知会碰上多少艰难，一时无从说起，只感到兵员未补上，无

后方作战，力量比较单薄，便说：“要想把敌人拉回去，减轻正面压力，一个师出去不够，要一个纵队出去才有力量，对敌才有震撼作用。这样，我们主动性就更大，对付大股小股敌人也有把握。”大家对出去兵力问题，议论了一会，开始定一个师出去，后来又定两个师，最后陈云同志说：“一个纵队出去，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纵队要什么东西，首先保证你们。”肖劲光同志接着说：“远距离的情报，我们首先保证你们；俘虏未处理，交给其他部队处置；兵员不足，我们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一部分；部队没有冬衣御寒，从三纵队和军区机关抽补给你们。”他们这么说，我感到是第三槌定音，心里非常激动。有许多问题我未想到，他们已经先想到了，说明他们对坚持南满斗争，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对如何坚持南满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研究。最后确定了坚决坚持南满，保持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宽桓凤赛、沈四梅地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会议决定遵照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思想，以三纵队在正面进行运动防御；四纵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集中打仗，分散做群众工作，变敌人后方为战场，前后紧密配合，消耗和消灭敌人。

这次会议在前方炮火连天、内部意见发生重大分歧的情况下进行，从争争吵吵到统一意志，从准备放弃南满到坚决坚持南满，这一重大的转折，挽救了南满的危局。这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依靠大家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方针的深刻理解，同时依靠会议主持者的高瞻远瞩和坚持生动活泼的民主作风。会后战局的变化，完全证实了会议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作用。当时为了落实会议决定的方针，进行了深入动员，并随即迅速行动。军区领导机关和兄弟部队对四纵队深入敌后斗争，给予很大关怀和支援。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军区从机关中精简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去，甚至把许多警卫员也补充到连队，还从医院动员了不少伤病号归队。此外，还从地方部队抽调兵员给四纵主力部队。当时有个省军区领导同志对调兵补充四纵队不太满意，陈云同志亲自出面做工作，说：“没有野战军就没有你地方武装部队的存在，你们将一部分兵员交给野战军，是为了顾全大局，如果交出去后，地方丢了，由我陈云来负责！”同时，军区机关和三纵队兄弟部队抽调了部分冬装支援四纵队，保证我们按时挺进敌后。

## 大 闹 敌 后

“七道江会议”结束后，我连夜赶回六道江，向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刘澜波（安东省委书记兼四纵副政委）等同志传达了会议决定，研究部署了向敌后挺进的问题。根据上级的指示，四纵队三个师分三路向敌后挺进。

先遣十二师率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在新开岭战役后仍留宽甸、石头城地区活动，与敌周旋；三十六团在通化至辑



安一线活动，归军区指挥），于十二月十四日从横路、台上一带出发，经八里店子、赛马集、跨越安（东）奉（沈阳）路，再经海城外围的隆昌州，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插到了庄河以西的占屯堡，开辟敌后根据地。该师后来率两个团（在挺进途中，三十五团归回建制）一直在辽南碧流河流域坚持，同辽南独立师一起，与敌纠缠，闹得敌人六神不安。直至第四次保卫临江战役期间，才奉命北上归回建制作战。

纵队机关率十一师为左路，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由六道江一带出发，越过梅（河口）集（安）路，向西进发，经桓仁、八里甸子、永甸城等地，开辟了牛毛坞、太平哨周围地区的根据地。第二、三次保卫临江战役期间，该师又奉军区的命令，再一次深入敌后。先向宽甸、桓仁、集安三角区挺进，箝制敌主力，造成敌后顾之忧；后向安奉路两侧频繁活动，炸桥破路，捣敌心腹。与敌纠缠数月，到第四次保卫临江时，才转回正面作战。

十师为右路，于十二月十八日由东升堡出发，经新宾以东的东昌合、平顶山，到月底便打开了平顶山以西、碱厂以北的广阔局面，威逼敌本溪、抚顺地区。该师自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起，奉军区之命，转为正面配合三纵队作战，打击进犯之敌。

为了保证会议决定的方针实现，我们四纵挺进敌后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敌军活动的特点，集中兵力重点打击敌人的游杂武装和摧毁敌据点，把敌主力从正面拉回来，减轻临江当面的压力。敌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地区后，一般以

营为单位，到处抢粮、抓丁、征税、并村、修路。同时扶植伪满人员、土匪、警察，在各村镇建立大团、保安队，作为地方武装，巩固其据点，并大量集训特务，对我进行破坏，配合其军事活动。当公路修好和据点建立巩固之后，正规部队则撤出，转到正面向我作战。针对敌人这些特点，南满分局专门电示我们：“在军事上是趁敌后空虚，采取远距离奔袭，主动打击敌人。打击对象，除坚决消灭一些可以消灭的敌正规军外，重点首先应大量歼敌地方游杂武装，以消灭压迫群众的‘地头蛇’，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支持群众斗争，铲除蒋军依托。再就是炸桥断路，以增加敌人的交通运输困难，打乱其后方，使敌人不安，以吸引箝制敌之主力，扩大其兵力不足之矛盾；倘使敌人主力回师，我则与它周旋，避强打弱，争取主动，多打胜仗，以战养战，提高士气。”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向敌后挺进时，原则上不带大车和辎重，少带炮多带弹，采取轻装奇袭的方法，迅速插到敌后。

我们向敌后挺进了几天，在二户来地区遇上敌人一股地方部队。打不打这股敌人？开始我们拿不定主意。因为纵队的任务是趁敌后空虚，出其不意地迅猛插到目的地，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企图。如果不打，必须绕道翻山越岭，耽误行军时间和增加困难。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打开前进道路。打了之后，抓了一批俘虏。因当时我们急于向目的地奔袭，为减轻前进中的“包袱”，对他们进行政治宣传后，就释放了。这批俘虏回去后，马上给敌人通风报信，说我主力已开向敌后。据说这个情报很快传到沈阳蒋

军东北司令部长官的耳里，敌人乱了手脚，赶快从正面调回三个师对付我们。二户来一仗并不大，但象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向蒋军表明我们已调头南下，深入其腹地。其作用大大超过了战斗行动本身，产生了我们所预料不到的效果。实践证明陈云同志在会议上关于牵制敌人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们在挺进中，尽量避开敌据点和公路线，遇到敌人一般不恋战，减少纠缠，不以小利乱大谋。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和使敌人捉摸不到我们的意图，我们组织了数路纵队，按预定目标前进，争取时间尽快插到敌后纵深地区。在作战中，一般以团为单位行动，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歼灭敌人。我们尽量打弱敌，打最坏之敌，争取时间多打小仗，求得首战必胜，每仗必赢，积小胜为大胜。这样，既能造声势，震撼敌人，又能鼓舞士气，教育宣传群众。对不同敌人，我们采取不同的战术手段，根据敌游杂武装熟悉地形、民情的特点，不采用对付敌正规军的作战方法，而是严密封锁消息，先组织轻便分队迂回包围，主力分数路纵队随后跟进，进行扫荡，在敌闻风逃窜之际歼灭之。鉴于南满交通方便，敌机械化兵力便于机动、互相支援的情况，我主力部队在一个地方作战都不太久，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法，多在夜间行动，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造成敌人到处呼号救援，拉长战线，扩大前后矛盾，以达到牵制和调动正面敌人回师之目的。除了战斗行动之外，我们还开展了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对敌宣传，扩大和加深



敌人正规军、杂牌军和游杂武装之间的矛盾，造成敌人内部混乱。我纵队深入敌后一个月以后，在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本(溪)抚(顺)外围，北起永(陵)通(化)公路、南至普兰店的长宽几百公里的广大地区内，积极主动向敌人出击扫荡，截取粮草，断绝交通，攻克和破坏了敌据点四十余处，占领了敌后大片地区。敌见我深入其后方，进行外线与内线相结合作战，对其前后夹击，乃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旬从前线拉回三个师，来巩固它后方的安全。这就宣告其一犯临江企图的破产。至此，原来敌来势汹汹之局面，变成了敌我对峙，相互拉锯的局面。实践证明，“七道江会议”所作的估计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三次保卫临江作战期间，四纵主力和其他地方武装在敌后加紧活动，打击敌人，相继收复了大小据点二十余处，控制了纵横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区，直接威逼着安奉一线，箝制住敌人的主力，逼它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有力地支援了三纵队的正面作战，实现了“七道江会议”所确定的作战方针。

## 冬 去 春 回

我们深入敌后时，正值隆冬季节，所到之处，全是冰封雪地，行军时雪深没膝，路也看不见。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里，连纵队作战科长都没有棉裤穿，基层干部和战士御寒物资奇缺更可想而知。纵队领导干部有马不敢骑，与战士们一起走路，来暖暖身体。为了避开大部敌人的围



堵，部队一般不在白天行军，不走公路，只在夜间开进，或者走小路爬雪山。由于天气寒冷鞋子冻裂，人员疲劳，掉队的很多。部队宿营又不能进圩镇，挤在人烟稀少的山沟，常常在山沟雪地里烤火过夜。在山沟里，没有油盐供应，只能吃老百姓的酸菜水。包米窝窝头被冻得象石头那样硬，牙咬不动，只好用口水漫漫泡软来吃。部队真正在战斗中减员的并不多，而冻伤减员则大大超过战斗减员，有的单位一夜之间就冻坏几十人。严寒威胁着部队，阻碍着通往胜利的道路，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问题。有的同志参加过长征，有的同志从八年抗战中度过来，开始以为回到敌后去问题不大，很乐观，后来也感到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有的人说：“从关里到关外，来到关外吃酸菜；从关内到关东，到了关东受苦冻。”“走路就爬山，住下挤不下，睡下睡不着，吃饭吃不饱。”老百姓见了也为我们担心，说：“八路军打不垮，拉不垮，就怕冻垮饿垮。”俘虏跟着走也害怕，说：“八路军是属鬼的，满山跑，没个窝。”对于这些困难，上级是事先估计到的，曾指示我们抓好挺进敌后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家“咬紧牙关，熬过困难，爬过山顶，迎接胜利。”

为了战胜严寒，度过难关，我们首先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肃清了各种悲观情绪和无所作为的思想，号召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看到光明，从精神上藐视困难，使部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同时，积极想方设法解决各种物资供应问题。部队御寒物资奇缺，我们不等待成批补充，能在就地筹措多少就补给多

少。部队收集了当地群众的防冻办法，教育战士们防冻。部队杀猪，光吃肉不吃皮，将猪皮穿几个小孔扎起来当鞋子穿。有的连队把毯子剪成小块，分给大家包脚。战士们行军时穿单鞋，打仗、放哨时才穿棉鞋。因天气太冷，枪拉不开栓，撞针缩短，扣扳机击发时枪打不响。为了护枪，战士们两人合盖一床被子，抽出一床来作枪套。广大指战员发扬了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终于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其次，是紧紧依靠和发动南满的广大群众。南满分局曾电示我们：敌后斗争“是军事政治全面结合的群众性的斗争”，“在政治上，则加强宣传，大量发动群众，恢复新政权，摧毁伪政权，对极其反动之地主恶霸，予以公审镇压，以支持群众的斗争。”南满的群众也跟东北其他地区一样，在伪满统治时期，与关内隔绝了十四年之久，在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经过蒋介石的反动宣传，有不少人开始还存在着盲目的“正统”观念，因而受骗上当，在“想中央，望中央”。为了打破敌人的欺骗宣传，驱散笼罩在群众心灵上的迷雾，我们部队所到之处，加强宣传工作，同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保护群众切身利益，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并用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罪行教育群众，启发他们起来斗争。我们第一次经过太平哨时，曾经向老百姓宣传过蒋军不好，有些群众开始不相信，说“他是梨子，我也要尝甜不甜；他是辣椒，我也要尝辣不辣”。我们走后，国民党来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们第二次经过太平哨时，老百姓凄惨痛哭，向我们诉苦说：“想中

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的人讲：“老百姓有福，八路就胜利；老百姓没有福，国民党就胜利。”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犹如严冬之后大地的复苏和解冻，万物获得新的生机。这种生机，是我们在敌后能立住脚的基本条件，并充分证明了“七道江会议”对南满形势的正确估计。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部队给南满大地播下革命政权的种子。我们组织了三、五十人不等的工作队，帮助和领导群众斗争，建立政权，开创了許多小块根据地。广大群众为了保田保家，用血汗和生命帮助我军夺取胜利。他们大量地源源不断地参军，使部队充满了新的血液和前进的活力。当我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时，许多群众冒着危险替部队联络送信，送情报，当向导，送粮食，护理伤病员，看管俘虏。在寒冬季节里，部队在山村里宿营时，群众住在菜窖里，让房子给部队住，我们下去请，他们也不肯上来。他们舍不得吃酸菜水，送给战士洗脚治冻伤。战士没有鞋穿，群众把自己鞋子让给战士。部队缺少粮食，群众把仅有的玉米碾成包米面送来，自己吃包米皮。我们如果没有南满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真诚保护，是很难在敌后立稳足的。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在南满终于度过了难关。随着大地的解冻，各地反动游杂武装相继被铲除，蒋军地盘日益缩小，我们力量越来越大。除了几个大城市被敌占据外，大片地区都被解放，革命政权一批批重新建立，为我军的胜利创造了可靠的基础。在冰雪消融的时候，三、四纵队在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直接指挥下，同

北满兄弟部队相配合，取得了第四次保卫临江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企图。寒冬过去，我们迎来了明媚的春光，踏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坦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重走几个月前所经过的行军路线，看到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心里油然而产生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活力感，骤然回想起“七道江会议”的情景。我想，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很难取得全东北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七道江会议”的正确决策，我们也不可能在南满立住脚，度过难关。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 我的回忆

王维舟

〔编者按：王维舟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参加了辛亥革命。一九二〇年参加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他在川东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曾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一九三二年以后，先后担任红三十三军军长、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王维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王维舟同志不幸逝世。

这篇革命回忆录是王维舟同志生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撰写的。〕

## 一、幼年时期

一八八七年六月十日(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宣汉清溪场王家坝一个贫寒的农民家里。祖父名元相，为人正直，勤奋持家。祖母姚氏，操理家务。父亲名正启，号光迪，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品性刚强，生活简朴，毕生辛勤劳苦耕种田地。母亲符氏，出身劳苦人家，除操劳家务外，尚从事田间劳动和出外做零工。母亲还稍通一点文字，这是她自幼跟我的外曾祖父学得的。据说，我这位外曾祖父是一位“拔贡”。因此，母亲对于子女们的读书习礼，甚为重视。她宁愿自己多受劳累，总要设法让我们读点书。母亲十分勤劳俭朴，自幼就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母亲所生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长兄名天辅、号佐卿，弟名天干、号意诚，另有三个姐姐。

在祖父一代，家景宽裕，除自家耕种田地外，还收少量租谷。祖父务农之余，在本场兼营一小商店，零星收益也颇能资助家庭。所以，当时大哥能够顺利地读了几年书，考过几次秀才，并且还去成都应过一次“拔贡”考试。到我五、六岁时，祖父母相继逝世，办过丧事之后，家境便日趋艰难了。

我从八、九岁入私塾读书，勉强读到十三、四岁。因为苛捐杂税，连年灾荒，以及兄娶姐嫁等花费，致使家庭负债累累，我只得弃学随父耕种田地，帮助维持艰难的家庭生活。十八岁那年，由父母包办，我和本乡覃家少女结

了婚，由于双方感情不好，在我参加革命后就离了婚。

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残酷的。我家所欠之债银二、三十两，在高利盘剥下，不到几年工夫，家中田产便失去了大半。全家人终年辛勤耕作，总是入不敷出，劳动所得交息后剩余无几，半年口粮无着，欲学无钱，欲耕无田，终年在饥寒交困的日子里经受折磨。地主豪绅对穷苦人的压迫剥削，激起我心头无限的愤慨，促使我下定决心，出外另找生路。就在十九岁的那年，我离开家乡到城里一家姓冉的货栈当学徒，从此开始了另一种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这时，大哥也去为人设馆教书，以便糊口和接济家里。父母年老，犹自事耕作，并为人打短工。全家人就是这样终年勤劳而不得温饱，过着凄凉、心酸的日子。

## 二、三年学徒

我的店主是本县的一个大地主、大袍哥头子。他开设的是一座大土栈，专门接待两广贩卖鸦片的巨商。在旧社会，店主对学徒的压迫和剥削同样是残酷的。我从早到晚给人送茶端饭、擦桌扫地，上街跑腿……，整日忙碌，累得筋疲力尽，而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日三餐淡饭，根本没有工资可言，更谈不到接济家庭。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要经常受那些有钱人的讥笑谩骂和种种凌辱，这使我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倍感穷苦人的一生是在做奴隶，贫穷的老实人，在旧社会总是受宰割的。后来，大哥考入成都

铁道大学读书，因学费无着，迭次来信，要我设法资助。我是个学徒，无分文收入，自然无力解决他的学费。为了不使他失学，我还是尽力设法想为他筹措一点钱。一些朋友提议用“请会”，“摆赌抽头”等办法来筹款。虽然我也知道这是靠不住的，但在那样的社会里，贫困所逼，要凑点钱接济大哥，就只有靠侥幸了。“摆赌请会”的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上了这些“朋友”的当，累得我欠下了店主二、三百元钱。后来，店老板竟诬我是偷盗，要送官治罪。在三年学徒的最后一段时间，店主担任了本县“劝学所”的总务长，我被调去做会计员，月薪三串。从这时起，我才稍可资助家庭。

三年学徒使我受尽了店主的剥削和凌辱，过着囚徒般的枯燥生活，思想上深感痛苦和寂寞。加之，目睹豪绅地主们损人利己、阴险狡诈，对穷人无止境的盘剥和迫害，使我心头异常愤怒，“只恨手无三尺剑，斩尽天下有钱人”。我决心另找出路。

### 三、辛亥革命与光复川东绥定、 东乡地区前后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战争，压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古老的封建帝国变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当时的一般劳苦青年，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痛恨；另一方面，精神上抑郁苦闷，感到前



途渺茫。一九〇七年，四川统治者赵尔丰在成都设立弁目学校，其目的是为了改革旧军制，为“新军”训练一批班排长和军队基层工作人员。我欲投考该校，以求富国强兵。但到成都时，考期已过，却逢成都东门外兵工厂内设立工兵学校，招收半工半读生，我遂考入该校。那时，工人、学徒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由于受剥削受压迫，在失业、破产后进入工厂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有一部分青年学徒是因家庭贫寒，在失学后抱着对现实极为不满的情绪进入工厂的。

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加紧进行侵略，以及清朝统治者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横征暴敛，就使得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激烈。当时，成都的工人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很多，也未被社会所重视，但我们这批工人学徒对社会上的政治动向是很敏感的。我们积极参加了四川的保路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满清王朝的卖国勾当。一九一一年，清廷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并转手将粤汉、川汉两条铁路拍卖给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于是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川汉铁路是靠向广大劳苦人民抽收租税而修建起来的，所以，“铁路国有”的实质，就是向人民夺路夺款，全川人民对此莫不义愤填膺。四川立宪党人，极力想把这个反帝反清的群众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发出告白，要群众不怨恨朝廷，不反抗官府，不聚众要挟，不打教堂……。但是，轰轰烈烈

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是立宪派分子控制不了的。一九一一年的八月末，成都首先罢市罢课，接着出现遍及全川的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运动。群众暴动，捣毁征收局、巡警分署和教堂的事情不断发生。

在保路斗争中，我和工厂的数百名工人及其他同学与成都学生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参加了成都数万群众在九月七日的游行示威。当人们手上捧着“皇帝万岁”的牌子，准备在总督府请愿时，突然传来了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总督赵尔丰逮捕的消息。于是，人们纷纷涌向总督府，提出路归民办，释放被捕者等要求。起初，赵尔丰花言巧语欺骗群众，说他可以将大家的要求“禀上处理”，随后，便喝令群众各自回家“安分守己”。赵尔丰的狡赖推诿，蛮横无理，激起了众怒。顿时，人声鼎沸，喊声四起，坚决请求答复要求，当场放出蒲、罗等九人。赵尔丰见群众不再受骗，竟悍然命令军警开枪，示威群众当场死亡数百人，伤者无数。总督府仪门外尸体纵横，血染遍地，惨不忍睹。这便是震撼全川的“成都血案”。然而，示威请愿的群众并没有屈服，被打散一次，又重新聚合一次，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示威一直坚持到深夜，仍未获结果，群众情绪更加悲愤激昂，喊出了“拿起枪杆子，打倒满清”的口号。当时，我也深感赤手空拳，任人屠杀的苦痛，看出清朝统治者决不会发善心，要合法斗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当夜，我和工人、同学们议定：各回本地拿起武器向清王朝作殊死斗争，不推翻清王朝誓不罢休。我连夜潜回东乡，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

我从成都出走以后，抵达绥定蒲家场稍事逗留，便回到东乡（今宣汉县）。我首先接触了当地一些进步青年，如龚权山、刘子圭等十余人。他们对时局非常关心，对清政府媚外卖国、出卖川汉铁路的罪行无限愤慨。他们对我回乡很高兴，要求立刻行动起来。经过商议，决定成立东乡保路同志军，目标是推翻宣达地区的清朝地方统治，夺取政权。接着便联络了当地哥老会。大家分头四出宣传，向群众指出：（1）清政府没收铁路，转卖外国，丧失主权，必将亡国。（2）四川保路同志会和铁路负责人，全部被总督赵尔丰逮捕，并大肆屠杀成都的请愿群众。（3）清政府派端方为查办铁路大臣，已率鄂军入川镇压，屠杀川人。经过十多天的联络和号召，全县五十多个场的群众都沸腾起来了。我又从双庙、双河场经湖家场到普光、南坝，再到天生等场巡视一遍，议定了起义日期。前后半个月的功夫，全县便组织起了数万农民和知识青年。人人手持刀矛棍棒、土枪土炮，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声势十分浩大。一九一一年十月初，群众队伍分作四路，围攻东乡县城。在攻城的前数日，我先潜入城内布置准备。攻城的当日午夜，我同城内事先埋伏好的数十名青年分别来到西门和北门，收缴了守城清兵的武器，打开城门。群众队伍顺利进入城内，活捉了知县吴讯和征收局长林某，并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东乡宣告独立。当即，全县各阶层代表和士绅成立了东乡军政府，推选出本县开明士绅冉崇根为政府主席，张贴布告，安定人心。我则继续准备围攻绥定府的一切军事工作。



东乡光复后，队伍经过初步整顿，颁布了一些纪律，如加强巡逻，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工商民众等。

绥定府有清军一个府练营。我怕攻城的力量不足，便派人去大竹县蒲凸山与“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取得联系，请他派队伍支援，联合围攻绥定城。绥定被我围攻十余日后，府官广某（满人）见城内人心动摇，粮草将尽，援兵已绝，便派人出城见我，乞求归降。经过商议，答应保证他的性命和家眷安全，准其率部投降。队伍进入城内，广某等高举白旗，俯首跪地，剪去发辫，缴出伪印，随后被遣送离境。接着，成立了达县军政府，选出土绅王瑜南主持民政，达县遂告光复。

这时，四川各县民众风起云涌，纷纷揭竿而起，自发地组织起保路同志军，兴汉灭清，攻占城镇，夺取政权。显然，四川各地这种自发的保路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保路的范围，而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

绥定光复不久，全川亦告光复。但清皇朝仍盘踞北京，并派出重兵侵犯潼关，企图先据西北再图西南，西南各省大局危急。四川则有组织北伐军之说，我在绥定，地处前哨，自应率先行动。我遂率众返回东乡，挑选精悍士兵六千余人，改编为北伐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我任大队长。我们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并制定了经陕西北上的作战计划。为了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坚定信心，当时提出了“直捣幽燕，驱逐鞑虏”的口号。这一口号对部队的鼓舞很大，人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都准备为攻取北京，最后消灭清皇朝贡献自己的一切。但不久，省当局来示，传达



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议和，北伐告停，辛亥革命就此结束。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所取得的果实，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攫取。四川人民武装起义所夺得的政权，也尽落于封建军阀和旧官僚之手。此后数十年间，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拉夫索款，鱼肉人民，劳苦群众又落入饥饿贫困，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的觉悟，因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两面性，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完成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任务，而使辛亥革命遭受了失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人民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会胜利。

我所指挥的北伐军随即缩编，留下五百多人，编为一个营，其余人员一律遣散回家。这时，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土匪蠢起，危害人民。我任宣汉县团练局长，率领部队驻扎宣汉，主要任务便是剿匪安民。经一年之后，匪患平定。当时的宣汉县知事已更换为张尔公。

由于感觉自己军事知识不够，一九一三年四月，我获准进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省警备司令卢锡卿委任我为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

## 四、护国之役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人民革命的果实，成为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宠儿。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在武昌起义之后，已完全离开人民，与袁世凯和地方封建势力实行了彻底的妥协。这就使反动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公然推翻民国，恢复帝制，号称洪宪皇帝。此时，我在绥定任警备司令，已历时一年之久，知悉袁氏称帝，怒火满腔，当即邀约达县国民党进步人士陈应怀、洪秀生、尹守白等商议，组织讨袁军，举兵反袁，首先推翻了拥袁的达县知事黄某。同时，推选国民党人颜德基为讨袁军司令，陈应怀为副司令，我任纵队司令。十天之内，我率部队攻克营山，击溃袁军钟体道部一个旅，又回兵攻取宣汉，活捉了县长李策安。从此军威大振。随后，攻取开江和开县，在开县歼灭北洋军吴光新部一个团。吴光新是奉段祺瑞之命率兵入川的，表面上他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兼查办使的名义，赴川查办刘存厚与滇军罗佩金、黔军戴戡的交哄事件，实际是为了支援川军对抗盘踞四川之滇、黔军。至此，四川省内的主客之战变为南北之争。一九一七年夏，吴光新到达重庆后，得知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与新任四川督军周道刚之间矛盾很深，暗斗甚烈，便多方拉拢熊，企图联熊攻打滇、黔军。同时，熊也极力留吴扼守川东，想利用吴军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熊克武在这段时间

内，对反北洋军阀的斗争，持观望态度。

一九一七年秋，“护法”运动兴起。孙中山先生召开非常国会于广州，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我军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号召，部队改称“靖国军”，与北洋军吴光新部展开了激烈战斗。这时，熊克武见局势变化，始改变对北洋军的态度，联合滇、黔军，响应护法，分兵进攻重庆。吴光新见熊未遵照他的计划行动，周道刚又力量薄弱，不足以成事，且川东之“靖国军”势盛，被迫于一九一七年底仓皇撤离四川。我军则乘胜追击，新滩一役，歼吴军一部，迫使其只能沿长江两岸缓慢撤退，为我造成歼敌之有利机会。我部接连攻克四川的云阳、奉节、巫山及湖北的秭归、巴东、利川、始建等县城。吴光新残部和湖北督军王占元部大败而逃。四川“护国”、“护法”斗争，获得全胜。

与此同时，云南军阀唐继尧以援川为名，举兵入川，并担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西南半壁河山为唐所有。四川人民在本省和外省军阀的压榨下，生活更加贫困。军阀连年混战，兵燹之害，造成全省农村破产，十室九空，劳苦大众仍旧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

## 五、在川东时期的旧军队生活

讨袁世凯之役胜利后，我所统率的川东纵队改编为靖国军颜德基部第七师，我任该师第三团团长，追歼吴光新匪部至川东的夔府（奉节）。我部进驻夔府一带，我被任

命为边防司令，镇守夔门。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前后历时三年。

我部进驻夔府不久，川东军阀、镇守使熊某密令奉节县长刘某，勾同该县的商团、团练及土匪五千余人，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夜间十二时，乘我部主力追击吴光新匪军于湖北巴东、秭归一带未回、司令部空虚之际，突然向我袭击。当时我留守部队只有两连兵力，一连在司令部（住夔府旧书院），一连分散驻于县城外高山上（距城五里）莲花池庙一带。敌众我寡，形势危急。我率一连兵力严守于司令室内，等待外援。拂晓时，驻城外山上的一连人前来增援（我亲弟天干任连长）。我立即将团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应战，发动进攻，形成内外夹击，毙敌百余人，俘虏五百余人，缴获土枪刀矛甚多。县长刘某潜逃，其余敌人全部溃散。第三天，我们将五百多俘虏全部释放，枪毙了商团团团长、县警察局长、商会会长三个匪首。从此，奉节一带人心大定，并使川东一带的反动派和拥护袁世凯的杂牌军感到很大震动。

当时颜德基的司令部住在达县。颜德基放纵土匪，如龙占魁、范海廷、花茂如、戴及安、帅恭安等部，奸掠烧杀，给人民生活带来无限痛苦，群众极端不满，曾流传这样的歌谣：“颜部五妖怪，龙范花戴帅”。

一九一七年，陕军进攻万源县，上级调我团去增援抵御。该县是范海廷营防守。范是土匪，只知纵容部属鱼肉人民，毫无作战能力，搞得这一带人民纷纷逃离他方，十室九空，遍地荒凉，凄惨万状。我军见此景象，心中十分



痛恨。我对所部训戒极严，屡以爱民为教，对危害人民的各地散匪，则大力剿灭。并号召人民回家，安居乐业，保护生产，我军防守地区，无一匪踪，并且尽量减轻劳苦人民的负担，不抽丁，不派夫，使人民生活得以安定。我部防守的太平、开县、宣汉、开江、夔、巫各县人民，都称我团是保护他们的军队。奉节县有一老先生曾写诗称赞我团的军纪严明，爱护人民：“老生活了七十年，未听世上说官贤，……自从靖军（指我军）来夔地，拨开云雾见青天，……人民自此得安闲”。

颜德基部的郑启和旅和曾辑五旅矛盾很深。我团属于曾旅。郑启和想叛反颜德基，派钟某来太平县（今万源）向我说明理由，叫我首先反对颜德基。我当即拒绝，对来使解释说：四川各军勾心斗角，争夺地盘，致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如果我们内哄，使敌人有可乘之机，必然会自取灭亡。我认为要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只有公开召集会议，指明颜领导我部以来的罪证，迫使他下台。颜的亲信只有龙、花二部，但其兵力不足，逼颜下台是可以办得到的。如若叛变，颜出师有名，临近友军进攻我军亦有借口。但郑启和不听我的建议，暗中收买我团周绍轩一营，趁某日出操时，把杨继中暗杀。周绍轩一个营及另一个营王某劝逼我放弃太平防地，只留县知事（我兄王佐卿任此职）防守太平县城。我不得已同周绍轩和王某同时撤走，开赶巴中。

当我同周、王到达巴中后，郑启和任命我某旅之职，我当即谢绝，并当面向郑指出：“危机四伏，有可能不久即

将四面楚歌”。果然，颜德基残部倾巢进攻，临近的所谓“友军”也同时进攻，郑启和完全溃败。

熊克武部队余际唐乘虚攻克颜德基司令部住的达县城。颜残部退散达县县南一带，想依靠大竹县肖静轩防地，结果落空。不久颜、郑只身逃往上海。此时我早已到达上海，他们才知道我的前言是正确的。但已后悔无及了。

## 六、寻求真理，加入朝鲜共产党

袁世凯复辟称帝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全国讨袁风起，袁世凯不久倒台。可是全国人民仍被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豪绅们所统治，在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各派军阀都和外国帝国主义建立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联系，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各个军阀独霸一方，为争夺势力范围常年混战不已，弄得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惨不忍睹。这使我非常失望，原来抱着打倒封建、实现民主、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已成泡影。于是我决心弃职离开四川，径直赴上海寻找出路。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也使我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便立志到苏联学习。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发生，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在中国人民中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潮流。在这种思想

潮流的影响下，我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五月），经朝鲜金笠和李某二同志介绍，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并答应我去苏联学习，当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加入朝鲜共产党后，一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面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一部分进步青年展开反帝救国活动。

一九二〇年秋天，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远东运动会”，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的学生参加。我们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广大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贪官污吏、军阀豪绅。传单还译成日文、英文，各印数万份。考虑到散发传单时，必定会遭到印度巡捕的阻挠和逮捕，因此，要求去散发传单的同志，一定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不怕任何牺牲。我首先报名参加，另外还有肖华青（现在重庆市工作，当时他是进步青年，不是共产党员）和许持平九人，每人各携带一支手枪。那一天上午八点钟，运动会一开幕，我们就开始散发传单，起初巡捕并未察觉，因为会场上还有另一些人在分发各种商品广告。时期一长，传单散发得多了，终于被巡捕发觉。巡捕立即发出紧急警号，开始搜捕。我和许持平是一个组，在一个区域活动。巡捕先看到许，就要逮捕他，许持平立即拔出手枪射击未中，这时场上秩序大乱，运动会被迫停止。我手上的传单已经发完，乘机跑出会场。我估计被捕同志的住所一定会受到搜查，赶快搭电车到几个同志的住所收拾文件。我跑回霞飞路渔阳里、宝康里，刚把文件收拾妥当，巡捕就到了，因而避



免了一些损失。这一次被逮捕的有肖华青、许持平等人，并搜去八支手枪。

肖华青等八位同志被监禁在虹口万国监狱。我四出活动，为援救他们出狱而奔走。后来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当时住在上海的一位四川人、国民党员杨昌伯，通过杨去找孙中山先生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设法营救，手续费六百块大洋。这时，我改名为许安平，作为许持平的哥哥，先后五次到会审堂为他辩护，声称：“我的弟弟许持平在上海求学，在参加运动大会时，不知何故竟被逮捕。他尚年幼，只十五岁，还未成人，在法律上也不能构成罪犯，请求早日释放。”在第一次去会审公堂的前一天，为了让许持平知道我是以他胞兄的身分活动的，不致在公堂上答话时发生矛盾，另花了一百元，通过律师向监狱官员要求和许持平会面。许持平戴着手铐脚镣，被狱官带到监狱大厅，限定见面时间十分钟。我告诉他：我公开身分是你的胞兄许安平，到上海来贩卖麻布（因许是四川隆昌人，那里出麻布）。许持平坚定地表示说：“我不怕死，我是为了全中国被压迫人民而起来革命的，死了也光荣！”次日开庭，主审官问了许持平几句话，也没有问我，即宣布：“许持平是过激党分子，胆敢在运动会上散发赤色传单，又枪击巡警，幸未伤人，姑念年幼无知，待下次再审。”以后又审问了几句，结果判决：肖华青等八人驱逐出租界。逐到什么地方，以后我们多方设法打听，始终找不到他们，许持平一直下落不明。我在上海等了三个多月，没有结果，以后就离开上海到苏联去了。



## 七、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我是化装成商人去苏联的，同路的共有四人。我们由上海搭船动身，辗转到牛庄(营口)、安东。原想经过朝鲜去苏联，但当时朝鲜为日本占领，因不能过鸭绿江大桥而返转哈尔滨至满洲里。我们在地下秘密关系的帮助下，终于顺利地抵达苏联赤塔。在赤塔，经过苏联红军远东国防司令部的严格审查，便送我们住进赤塔后山一座漂亮的洋房内，并派红军一个班保护我们，劝我们不要上街，严防日本帝国主义奸细对我们进行侦查，使我们将来回国遇到危险。一星期后，接莫斯科电示，准许我们先到伊尔库次克学习。

一九二〇年底，我们到了伊尔库次克。当时有从广东、浙江、上海来的工人、学生十余人，一起学习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同时，我们还负责教参加十月革命的华工红军战士学中国文化。在伊尔库次克学习了七、八个月，我们到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星期。当时，正值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向年轻的苏俄进攻，而苏俄国内秩序亦尚未稳定，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工厂和农村被白匪破坏惨重，每人每天只有半磅黑面包，节约粮食供给前线战士吃饱。对于我们外国同志待遇稍微好一些。当时列宁号召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日，机关工作人员星期日不放假，只有工人休息一天。大家勤奋工作，积极生产，节衣缩食，支持革命，支持卫国战争。

一九二一年底，我们由苏回国。在满洲里中苏边境，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我们秘密改乘马车，由苏联红军护送，于夜间绕道进入满洲里市，住在苏联的秘密招待站。次日仍化装为商人，搭乘火车前往北京。

在苏联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习的收获很大，进一步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特别令我难忘的是，在莫斯科参观时非常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会，在会上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聆听了他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 八、“赤心社”与“俄灾救济会”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初，我们到了北京。那时吴玉章同志也在北京，于是我们协力组织了“赤心社”，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因为苏俄在战争时期发生了灾荒，我们又发起“俄灾救济会”，同时宣传十月革命对人类解放和我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我们中国人民应该帮助苏俄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我们组织北京各大、中、小学生游行、扩大宣传影响。经过一个月时间，共募得捐款数十万余元。我们用这笔款购买物资，运送苏俄。北京募捐结束，我和王某复至上海，又募得一批救济款，同样买了物资运往苏俄。在上海的工作刚结束，忽接家中来电，母亲病危，促我速返。我经原组织金笠同志批准，回四川省探亲。

## 九、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大革命的斗争

我于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回到家中，不上三天母亲就逝世了。把母亲安葬后，我留在家乡创办宏文小学，意为革命培养青年干部，招有学生三百余人。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大革命蓬勃发展，组织上电催我速去汉口。同路有周伯世、冉海航等同志。我走后宏文小学交王波办。后来由于王波提倡男女婚姻自由等，遭到具有封建意识的学生家长们的反对，于是学校便被豪绅地主们夺去。

我于一九二五年春抵汉口。由于我一九二〇年加入的是朝鲜共产党，到此时才由组织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四川被封建军阀杨森统治，中共中央军委特派高语罕和我同往四川作杨森部的工作，争取他不叛变革命，并带去一批子弹枪支接济杨森，以便取得他的信任。武器弹药运到沙市，被叛变革命的夏斗寅部队全部扣留，并将我们一同扣押。不数日，夏匪军乘武汉空虚，企图向武汉突袭。该军行至新捷下游时，秩序混乱，我乘看押人员疏忽之际逃脱，奔赴汉口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由于张作霖部进攻，武胜关吃紧，革命部队大部调往武胜关前线，只留有黄埔学生女生队，武汉空虚。军委得到报告后从前方调回一部分军队参加作战，才将夏军击溃。随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也叛变革命，企图进攻武汉。由苏联接济帮助的冯玉祥部队，在洛阳遭到张作霖部的堵击，不得前进。汉口

革命部队奋起出击，准备迎接冯军来武汉，以巩固武汉根据地。但出乎意料的是，冯军占领郑州后，不但不来武汉，冯本人反而去徐州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早已叛变革命了，冯玉祥此举助长了反革命势力，各地军阀日益嚣张，使武汉革命根据地陷于孤立。一九二七年，卖国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无辜惨遭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因此，我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同志们分赴各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我潜回四川，与周伯世同志一同在川东一带组织农民运动，并拟在宣汉、万源、达县、开江等县建立川陕鄂革命根据地。

在武汉工作时期，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是：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见到了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确地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充分发动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这些论断，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 十、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自从军阀割据以来，人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在万源、城口、宣汉和达县横行霸道，残酷



地掠夺农民，在田租、烟款、高利贷和重重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

“五四”以后，革命思潮波及到了川东。一九二三年前，我和一些同志在宣汉清溪场等地进行过革命活动，在地方上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之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戴治安、张鲤庭等）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校为基点，展开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在张鲤庭的领导下，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王波等又在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社会主义，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由武汉潜回四川，拟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万源一带，由固军坝进步青年李家俊（他在上海读书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出面号召，并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为掩护，组织农会。农会刚刚组织起来，就被刘存厚匪军发觉，万源一带的农会被匪军捣毁，革命群众受到严重的摧残。我们立即调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并组织群众与匪军作战。在此地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以农会代替苏维埃）。一九二九年，川东军阀刘存厚部的一个连，携枪八十支，在宣汉的七里峡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声威大振，川东游击队日益壮大起来。

当时，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

位。所有刚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都被调去参加包围武汉的战役。川东游击队由唐伯壮同志率领，远征到达鄂西竹溪房县一带，被敌人包围，英勇奋战数日，终因敌众我寡，遭受失败。川东游击队的斗争，前后坚持达两年半之久，牺牲了雷玉启、唐仲明、唐伯壮、李家俊等数以百计的同志，就这样失败了。

第一次失败后，我与同志们又在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一带组织发动第二次游击战。我到广福场与该地学校校长蒋群林共同配合开展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蒋群林派该校学生马奎宣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又得到该地团总李介眉的同情和支持，通过他的帮助，游击队购买了不少枪支子弹。后被敌人发觉，李介眉便带队参加了我红军游击队（李现在云南省委工作）。

不久，奉省委命令，将虎城场一带所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拉到梁山县属太平场，与该地的李光华、李次华、李维等同志为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发动游击战争。党决定李光华同志任总司令，我任副总司令兼总指挥。这支新军成立后，军阀刘湘派了两个师进行“围剿”。沙河场一战，我军把敌人两个师击溃。之后，又在忠州后乡，歼灭了民团数百人。此时，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远征，包围武汉。部队到忠州石宝寨渡江开往石柱。先头部队刚到达石柱后山，不料刘湘派陈兰亭带一个师从后尾赶来。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损失惨重。

李光华同志不幸负重伤，被俘殉难；光华之弟次华亦被匪军屠杀。李光华同志牺牲后，我即率领所剩下的几百人，顽强抵抗，突围出来。

当时我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左倾路线，只知道这是不懂军事的错误做法。游击队都是刚组织起来的四川农民，军事上没有经过训练，就被调去攻打武汉，远离家乡，军心涣散。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动员，领导上也没有思想准备，盲目乱干，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当初我是极其反对的。在忠州后山黄金场召开的党内会议上，我和有的同志提出：“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远征作战是不行的，最好再向省委请示”。后来省委派来刘大明同志在会上说：“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应该服从！一定要执行省委的决议。”在此情况下，我又建议：可去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留下，一来继续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二来可牵制敌人兵力。但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只好服从命令。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又一次使川东游击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在石柱战斗中突围出来以后，回到老根据地，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平（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开会，我同王波前往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奉命返回川东进行第三次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王波因另有任务，省委决定其留成都工作。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悬赏十万大洋捉拿我，因此我不得不化装上路。我在万县等候交通员，护送我去根据地，



住在我胞兄佐卿家里的楼上。第二天黄昏，因天气异常闷热，在楼上更觉暑气难当，于是独自到盘龙石公园散散步。由公园出来时，只见路上军警戒备森严，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路上遇到我在旧军队中任职时的副官长李培之，他是特来找我的，一见面拉着我就走，并告诉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我到万县的消息，叛徒已向当地匪军王陵基告密了。在我离开胞兄家约五分钟后，王陵基的部队即将胞兄寓所包围起来，严加搜索。找不到我，便把我胞兄、胞弟及二侄捕去，并严刑拷打，追问我的下落，他们始终没有说出我在什么地方。

听了李培之所谈，才知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离开万县，但一时又走不出去，因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警哨盘查。李培之急忙把我领到一位好友李重仁的父亲开的钱庄内藏身。当时，万县全城都处于戒严状态，匪军的气焰嚣张极了，四处搜索捕捉共产党。李培之、李重仁见形势危急万分，便将我化装成妇人，抱着婴儿，坐于轿内，外面打着钱庄商号的灯笼，抬出了警戒线，到后山蔡花寨李重仁父亲的佃户家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李重仁的父亲天天都来看我，把王陵基部队的动态和我兄、弟、子侄受到酷刑等情况都告诉我，我听了心中怒火炽烈，总有一天，我要同这些匪帮算账报仇。三天以后，红区的交通员来了，我便回到根据地去。

我在万县脱险后，回到梁山、开江、宣汉、达县一带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决议，重新组织川东游击军，准备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党决定我任总指挥和川东



军委会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就驻扎在宣汉芭蕉场附近贺值三家里，贺全家都参加了游击队的工作。我及时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经过热烈讨论，总结出以前遭到失败的原因有下列几方面：

一、懂军事的人材少，对敌人估计不足，未掌握敌情；

二、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缺乏革命游击战争的锻炼；

三、反动势力强大。陈匪有一个师的兵力，我们游击队只三千多人，武器弹药装备又很差；

四、我无后方，伤病员得不到抢救医治；

五、没有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没有充分的政治思想教育，即远征作战，草率从事；

六、离开有党组织的农村，脱离群众，没有群众掩护。

总而言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有了两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左倾冒险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根据省委的指示和游击队广大干部的意见，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确定了对敌斗争的明确方针：

一、加强党的领导，普遍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成立县委，建立支部。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工作，坚定革命斗志与胜利信心，使群众斗争有党的坚强领导。

二、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基干游击队。实行破仓分粮，打富济贫。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抽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民主革命政权。

三、军事上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灵活地使用兵力，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巧妙办法去打击消灭敌人。

四、对各地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正确的政策。对顽固的、坚决反共的首要分子，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对一般的大多数则争取利用，扩大游击军的政治影响。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开创了新的局面。总指挥部成立后，游击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布在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县进行活动，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斗争中来锻炼队伍。我在广福场从一个已被反动派撤了职的团总曾某处借来步枪六、七十支（曾某对反动派很不满，因他过去和我认识，同情游击队，故能借到他私藏的枪支），重新开始发动组织第三次游击战争。

第一支队首先发动起来，以蔡奎同志为支队长。因吸取了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次在进行工作时特别谨慎小心。年轻的游击队对于公开的敌人，是有高度警惕性的，但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却放松了戒备。第一支队成立不到一个月，遭到敌人暗算，混入游击队的富农分子被刘存厚收买作了奸细，在饭中投毒。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蔡奎

同志带领游击队从远地破仓分粮回来，队员们吃饭后全部中毒，腹痛昏倒。正在这时，这个富农分子勾结刘匪军从四面包围上来，支队长蔡奎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一支队遭到严重损失。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于是，我们及时认真地对内部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阶级敌人和不纯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并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提高政治警惕，丰富对敌斗争的经验。

当红军游击队正在顺利发展，根据地逐渐扩大的时候，敌人步步为营，在各乡镇驻重兵把守，保甲长、团丁及匪特相配合，到处侦察游击队和指挥部的住地。刘存厚又增派他的第二师到铜鼓石下八庙一带，向游击区“围剿”。有一天晚上，游击军总指挥部正在贺值三家里开会，被敌特发觉，敌人连夜派了一个营来包围总指挥部。当我们接到情报时，已万分危急，总指挥部在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到桐家山。指挥部离开不久，敌人就包围了贺值三的家，进行了搜查，并将贺值三、贺泽忠、贺宝庭捕去，关进监狱。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并用金钱引诱等卑鄙无耻的手段迫使他们说出游击军的行踪。他们忠于革命，意志坚定，始终没有屈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贺泽忠被敌人枪杀，英勇就义。贺值三、贺宝庭被关押数月，也几乎丧命，后被营救出狱。不久，贺家又被叛徒李光年出卖，敌人将贺江氏（贺长清同志的母亲）抓去，悬吊屋梁毒打，要她交出总指挥部的枪支子弹和其他物资，但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口供。



游击军总指挥部积极调动各地游击队主力，进行反围剿斗争。在宣汉、铜鼓一战，将刘存厚增派的第二师击溃，并活捉了匪军陈团长（刘存厚的表弟），给敌人以沉重的痛击，使匪军内部受到很大的震动。这次战斗的胜利，给各地游击队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从而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一九三一年年底，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央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南江县。我们积极准备，以便和红四方面军配合进攻，夹击田颂尧和刘存厚匪军。我们派人迅速前往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但由于反动派在各地警戒森严，联络非常困难，派了几批人去都无消息，也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只有继续进行准备，等待时机到来。

一九三三年九月，红四方面军向万源进攻，我们派蒋群林同志前往，终于取得联系。十月，互相配合进攻宣、达，夹击刘存厚匪军，一举奏效。一开始刘匪全军调至万源前线，后由黄金口、峰城清溪场向开县溃退，我即调部队于峰城清溪场等地截击。但因敌众我寡，刘匪退到南坝场一带固守，我即请求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派军前来配合我游击队，以便一举歼敌。徐向前派许世友同志率一个师配合我川东游击军，并组织了数万农民游击队，在下八庙会合，一举全歼刘存厚匪军。

至此，红旗插遍了川东、川北，宣、达、万数县全部解放，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尽情庆祝胜利。



## 十一、红三十三军的成立及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川东游击军与红军会师，彻底打垮了军阀刘存厚，宣、达战役胜利结束。一九三三年十月底，我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主持召开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当众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决定我任军长，原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同志任政治委员，不久上级又派罗南辉同志为副军长，统辖三个师（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王波任九十七师师长，冉南轩任九十八师师长，蒋群林任九十九师师长。大会上群情激动，全体游击队员兴高采烈，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庆祝。大会之后，宣汉全城如同过年一般，到处红旗飘扬，家家张灯结彩，鞭炮声不绝，群众自发的欢庆活动延续了三天三夜。

川东游击军和川东广大人民有着极深厚的密切联系，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同人民共呼吸。队伍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后，保持与发扬了这一个光荣传统，每到一地便组织发动群众，帮助群众生产。农民翻了身，开始了新的生活。川东广大农村摆脱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统治，群众热烈地拥护和支持这支队伍。对此，反动军阀恐慌万状。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川军阀刘湘、王芳洲策动大小军阀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六路围攻，全苏区的军民投入了艰苦的战斗。我奉命率部队担负左翼阻击任务，进到南坝场前

杨柳关一带。我军防线自宣汉属芭蕉场至开县之樊口店，长四百余里，战斗相持了三个月之久。敌人十分疯狂，以为红三十三军是一支新部队，不堪一击。其实这支部队的许多战士都是经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的，新战士也都是翻身的农民，对军阀有着极深的阶级仇恨，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军扼守阵地与敌人顽强战斗，最后一次反击，把进攻的敌人赶出去几十里。红军主力为寻求战机，收缩阵地，从正面主动撤退了，我们左翼也不得不撤退。部队撤退时，节节阻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一天，我们正在官渡场前线指挥所，忽然从后方跑来一个人说：军部后方被“神兵”袭击，军用物资和大批给养全被抢去。来人还说：“神兵十分厉害，刀枪不入。”经了解，原来是一些反动地主武装，趁我军前方吃紧，组织反动会道门在后方捣乱。红三十三军的前身——川东游击军，曾多次清剿过“神兵”，知道所谓“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选出一批老游击队员组成一支小部队，迅速开回后方打“神兵”。两千多反动“神兵”正在那里大吃大喝。我们部队突然出现了，反动匪徒仓促披上红布，手提大刀，大喊：“真神护身打不死。”我军战士一阵排子枪猛扫，当场击毙很多“神兵”，大部分做了俘虏。

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即命令我军，组成一支专打反动会道门武装的部队，由副军长罗南辉同志率领，经罗文坝、王坝、清花溪等地清剿反动匪徒。后沿宣汉县后河一带，一直清扫到万源县全境及城口县城下，每战必胜，给反动的“孝义会”、“大刀会”、“扇子会”以毁灭性打击。反动“神

兵”惊慌地说：“不灵了，不灵了，红军有了破神法。”红三十三军智勇打“神兵”的事迹，迅速传遍各地。

当我军撤退时，不知撤退到何地，并和四方面军失去联系和配合。这一点当时很难理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对我军发生疑惧，怕我军靠不住，因此不和我们联系。上级没有通知我军，使我们几次处于被敌人包围、孤军奋斗之困境。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四方面军领导由于对我军了解不够，需要对我军加以考验，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个考验前后竟达三年之久。我军对党忠诚，毫不怀疑上级对我们这种待遇和考验。一九三四年，张国焘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当时我在城口前线，奉调前去赴会。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我同张国焘曾在列宁所召集的东方民族会议上见过面。在四川这段时间，常与他见面，对他提出过很多建议，但都未被采纳。自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处处受到张国焘的歧视。我军人多枪少，武器、弹药缺少补充，而我们担任战斗的任务很重，防线又长，万一有所失误，要以军法从事，处境相当困难。但我们为被压迫人民谋解放的坚强意志绝不动摇！年轻的红三十三军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和给养来装备自己，在严酷的战斗中不断提高战斗力，丰富战斗经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到张国焘的无辜杀害。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的双河场，以开会为名，集中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长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去，暗中杀



害。在宣汉的清溪乡三弯崖，又杀害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在黄中铺前线，把正在火线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还将排级以上干部五十余人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只有少数几个人幸免。全军的干部和战士，随时有被叛徒张国焘杀害的危险，这是张国焘对革命犯下的罪行。我们对干部进行了多方的教育和解释，使全体同志都认识到，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对革命决不悲观失望，决不灰心动摇，决不因此而掉队落伍，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清江渡会议以后，我得通知，随总部徐向前同志到中巴县，参加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又参加围攻广元。由广元以南渡嘉陵江后，在羊模坝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团，后因胡宗南主力猛烈反击，部队即折回东岸。一九三五年一月，发起了陕南战役，攻克宁强、阳平关，与敌人展开激战，歼敌甚多。后主力围攻褒城未下，遂结束陕南战役，由汉中返回四川，在旺苍坝举行庆祝会，庆祝陕南战役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开始西渡嘉陵江。我随徐向前，王树声两同志在苍溪县附近塔子山下找到了渡江点。此处敌人虽有坚强的江防工事，山势险峻，但敌人兵力薄弱。我军在苍溪后山凉风凹下小河边制造木船。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制造了三十余只木艇（每只木艇能容一排人）。在某晚夜半时，我与王树声同志指挥渡江。王树声同志把兵力和船只调动完毕，用电话通知我，即开始渡江。我一



声令下，二十门迫击炮一齐开炮，接着数路大军发起猛攻，敌人惊慌失措，全线崩溃。我军取得了渡江战斗的胜利。

## 十二、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长征到陕北

胜利渡江之后，我军乘胜追击敌人，歼灭刘湘等四川军阀数师之众，接着又在剑门关歼敌一个师。另一路渡江部队进占梓潼、德阳、绵阳等县和成都北面的重镇——中坝。

中坝在成都以北，商业繁华。我军在此缴获和没收官僚资本物资很多，使我军得到物资补充，士气更加高涨。

在剑阁，张国焘只派少数部队到平武，欲打通去松潘的道路。我军刚到平武，胡宗南的一个旅已从甘肃文县赶来，抢先占领了摩天岭，使平武受到威胁。我军不得已放弃平武，经青川县到茂县，然后到了理化县之杂谷垭，开始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民族工作政策和纪律，一定会遇到很多麻烦。张国焘完全不接受我们所提的意见，将投降来的民族保安队队长逮捕杀害；继而又将原任西安警察厅长，后跟杂谷垭喇嘛寺活佛学讲经的汉人杨某逮捕杀害，因而引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和喇嘛数百人对我军的坚决反抗。我和刘瑞龙、杜义德等同志到喇嘛寺向他们解释，被喇嘛和群众武装包围。我们和随身的三、五名警卫奋不顾身地

持枪冲了出来，徐向前同志的一位副官被害。这时先头部队已经前进，后续部队还没上来，我们只得组织机关人员抵抗。坚持了两天，大队才赶上来，住杂谷垭的机关才转危为安。

我们从此进入草地。不久，我奉命同傅钟同志去马塘欢迎中央和毛主席。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全军无不兴高采烈。

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会师后仍野心不死，对与中央红军会合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当张国焘、陈昌浩前去懋功两河口开会，与毛主席商议今后的战略方针时，全体干部、战士和群众高兴异常，箪食壶浆，准备迎接中央红军。大家都希望从此在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使革命步步走向胜利。但事实令我们非常痛心和失望。张国焘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未到马塘之前，在他去参加两河口会议之前，就表现了对中央红军的歧视、对毛主席的不尊重和许多可疑之处，这是张国焘闹分裂的开始。两河口会议以后，张国焘即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说中央不好，说部队精神不振，暴露了对中央的严重不满。继而对中央红军轻视、谩骂，在供给上百般刁难。进一步暴露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野心。

中央和毛主席坚持正确路线，多次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帮助他改正错误，但终归无效。当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同中央红军会合，渡郭曲河北上抗日，将要出草地，朱总司令督促红四方面军前进。在阿坝准备了干

粮，走了三日，到郭曲河岸，因河水陡涨而不得过河。张国焘令我率一个团沿岸察探渡河点。我正要出发，张又令停止察探。张国焘借口军粮缺乏，要部队退到阿坝找粮。全军往回走了一天，来到某一宽阔的草原上，张令部队暂停休息。这时候，事变发生，张国焘反中央、阴谋分裂党的野心彻底暴露了。张国焘召集高级干部会议，阴险地提出：我军是前进呢？还是南下呢？朱总司令当即表示应该继续前进，与中央红军一同北上抗日，并指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但有的同志竟当着朱总司令的面，谩骂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主张红四方面军不该往北逃跑。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议论纷纷，秩序大乱。张国焘对错误的意见毫不制止，并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批评中央。他不仅要四方面军孤军南下，而且主张红军全部南下。他急令秘书拟电调徐向前、陈昌浩立即率四方面军脱离中央南下。时在一九三五年秋。

电报发出后，陈、徐无奈回电同意南下。次日急返阿坝准备干粮，经马塘、卓斯甲一带草地，进驻卓克基。张国焘令我率领一个团绕郭曲河上游去接陈、徐；令陈、徐部由原路经黑水返卓克基。我接电后急返卓斯甲。此时张国焘和少数几个亲信，公开进行反党活动，拉拢一些干部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反对与中央分裂，并耐心向干部进行说服教育。我虽然看得清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但因为一直被张国焘歧视，列席旁听，无发言权。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



使他的分裂阴谋不能得逞。

部队在卓克基编成两个纵队，倪志亮任司令，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我任倪的参谋长。后又调我任抗日总指挥，组织当地青年抗日。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进驻成雅公路上的百丈镇，攻四川宝兴。经半月的激战不能取胜，我军伤亡很重，不得不返回草地再翻夹金山，退往西康甘孜过冬。

在甘孜过年时，张国焘任我为伪中央五局局长，兼抗日总指挥（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同一方面军五军团合并，虽未明令取消红三十三军，但实际上红三十三军的番号从此就消失了）。方强同志任五局秘书长，毕占云同志任第一队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侦察通过草地的路线。

光阴荏苒，春天已到，气候转暖。自从同中央分裂后，南下走不通，草地又无粮，不得已决定继续北上。出发时，我同许世友同志所率领的骑师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前进的道路。我们经冬古、阿坝，过郭曲河，再经上下包座草地，到达甘肃省哈达铺，兵临岷州城下。甘肃敌军鲁大昌、邓宝珊坚守岷州城，我红军四面围攻未下。当时有两个前途在军中争论不休：一是绕道青海到甘北，打通新疆“国际路线”，这是张国焘的主张；另一个是取消自己不合法的伪中央，与中央、毛主席会合，开了几天会仍不能解决，于是决定部队继续经草地拉卜寺到青海。行至洮州（今临潭），因草地无粮，继续走下去，全军有覆灭的危险；想回中央，又无颜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面，事处两难。此时，党中央派陈赓同志率部队来迎接



我们，并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张国焘与中央红军会合，免使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再三劝说，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拒绝与中央会合。当时敌人大军逼近，需迅速越过陕陇公路，靠近陕北中央所在地和中央红军的驻地为上策。敌人逼近，不容张国焘有丝毫犹豫，如果再想逃跑则军心涣散，又无粮食。张国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命令部队越过陕陇公路，到达会宁，同毛主席的队伍会合。敌人仍在后面猛烈追击，我军后尾部队在会宁以南花家岭进行阻击，五军团副司令罗南辉同志（原三十三军副军长）英勇牺牲。

我们越过陕陇公路后，胡宗南部尾随跟进。这时，张国焘的野心不死，他不向中央和毛主席请示，急令部队主力由宁夏中卫渡过黄河向甘北开去。结果，因敌人追逼甚紧，部队只渡过大半，渡河点即被敌人切断。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坚决要求与中央汇合北上抗日。张国焘的反党阴谋破产了，不得已只好走向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

当时，四方面军去甘北的西路军中，有三十三军缩编的两个团，这两个团随陈昌浩逃到甘北酒泉一带，大部分干部损失净尽。原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同志和董振堂司令员亦英勇牺牲，西路军全军处于危急之中。但陈昌浩仍然坚持不与中央会师，采取按兵不动、坐以待毙的政策，使得四方面军西路军数万人被困于甘北地区。毛主席派刘伯承同志组织援西军加以援救。援西军行至甘肃陇东正源、平凉间，西路军已被敌军全歼。这是张国焘错误路线所造

成的恶果。

一九三六年冬，我们到达陕北之山成铺，敌人仍然跟踪追击。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剩余部队会合后，即在山成铺夹击敌军，歼敌一个师和两个旅。我们当即去保安见毛主席。经历了一段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全体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心情激动，从此脱离了张国焘的压迫与羁绊，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 十三、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

在保安，刘伯承同志陪同我去会见毛主席。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张国焘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对我们的歧视等种种事实。毛主席说：目前红四方面军在甘北还没有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待将来时机成熟，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指示我暂时要严守秘密。毛主席这些亲切的慰勉和英明的指示，使我至今铭记不忘。

此后，中央令我任中央四局局长。一九三六年底，中央直属机关进驻延安。到延安后，经我请求并被批准调往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后，我们同蒋介石合作抗日，因此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住的是石窑洞，在院子里上课，也没有桌椅黑板，但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等等课程。毛主席在百忙中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作报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常来校授课，对我们的学习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学习过程中，中央领导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系统地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四方面军的干部接受党的教育，很快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全体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进一步揭发了张国焘的罪恶活动，因而更加体会到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和伟大。

## 十四、陇东十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我党立即通电全国，并接连发表宣言，积极推动一切进步力量，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与我党合作抗日。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与争取民族的解放，实现全国抗战，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担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红军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一带进行改编的时候，令我旅留守，进驻陇东三河镇。一个月后又进驻陇东庆阳一带。三个月后，旅长王宏坤调抗大学习，由我任旅长兼政委。时在一九三八年。

三八五旅驻守陇东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保卫



党中央的安全，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和生产自给。一九四一年，新四军在皖南遭蒋介石反动派的毒手后，在陇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又与我们搞磨擦，破坏抗战。我们进行了反磨擦斗争，打击反动派。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军事上组织武装力量向我进犯，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封锁政策，在一九三八年春停止对我军的一切经费供给，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陕甘宁地区。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伟大号召：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部队在不影响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要做到生产部分或全部自给。我们的军队学会打仗，又学会生产，就有力量，就不怕任何敌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全体指战员热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坚决表示：敌人在哪里进犯，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敌人封锁我们，只会促进我们生活得更好。

我部在陇东一边反磨擦，一边抽出一个团（七七〇团）开赴大樵山下，向荒山进军，开荒种粮。要把长期没有人烟的荒山野沟变成沃土良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农具，就发动大家到处拾废铁，收集破庙里的破钟，制造出各种生产工具。没有宿舍，就用树枝、树皮、野草，搭成临时性的窝棚。部队里南方战士多，不熟悉北方的农时气候，每个连队都请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民作指导。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全体同志在生产中克服了许多艰苦困难。当年秋天，全旅人员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不仅有粗粮吃，而且有大米吃，生活过得很美满。

我们还组织了运输队，到陕北的三边（盐边、定边、



安边)去驮盐,除了供应部队食用,还可满足边区人民的生活需要。当日寇占领了华东各省,海盐断绝,西安一带群众食盐奇缺,依靠我边区运销食盐。我们以盐换布或卖钱,解决了部队的穿衣问题。

部队还要上山伐树,烧木炭,解决了冬季取暖用的燃料。为了改善生活和积攒肥料,又大力组织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做到每人养一头猪,一只羊,两只鸡,每四人养一头牛。剪下羊毛,自己用纺车纺线,织毛线衣,打毛袜、手套等,增加日用品,节省部队开支。

后来,全旅还建筑了新营房。各营都修有公共体育场,每连都建有课堂和俱乐部、文化室、阅览室、理发室、澡塘等。所有建筑不但坚固耐用,而且美观大方。

陇东十年,由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生产自给运动,冲破了蒋介石反动派对我们的一切封锁,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支援了敌后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我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是党给予我的极大鼓励和最大的光荣,令我永世不忘。我时刻用它来鞭策自己,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马列主义,谦虚谨慎,永不骄傲,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十五、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党提出和平团结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国共两党谈判结果，达成了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若干协议，发表了“双十协定”，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毛主席指示我们不要有幻想，达成协议的，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中央调我速往四川重庆，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职。吴玉章同志任书记。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率全家去重庆。后来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蒋介石撕毁和谈协定，发动了内战。七月间，蒋介石公开下令限我三日内出川，否则要将我逮捕。重庆市长张笃伦假借请吃饭名义，将吴玉章同志和我请到他家里，向我传达蒋介石限期要我出川的命令。张笃伦申明一条理由，因为我是搞兵变暴动的专家。后来由国民党派飞机送我及家人到南京，住了两个月，后经周恩来副主席交涉了一架飞机，才送我们回到延安。

抗战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打败，美国强盗又来了。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蒋介石烧起了内战的大火，积极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和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央任命我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蒋匪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并亲自指挥我们与蒋胡匪军进

行战斗。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撤出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全体指战员无不奋勇杀敌，执行保卫边区人民，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神圣使命。由于我陕北军民一致努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共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奠定了西北我军胜利的基础。一九四八年夏，我们终于胜利地收复了延安。

毛主席对延安收复后的善后事宜，当面对我作了指示。他说：“敌后各战区不断取得胜利，全国反攻的形势即将到来，我去华北，计划解放全中国的事情。延安收复后的善后工作，你们去做。”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解放了西安，并准备进军解放西南各地区。

北京解放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召开，我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后到北京参观，不久，即返回西北，准备进军四川。中央令我任西路军副司令。这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驻成都。

一九五〇年八月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令我任副主席；中央西南局令我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三千多万人口，西南要占一千四、五百万，约占全国少数民族半数。民族间历来不团结，隔阂很深。西南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号召下，民族问题解决了。主要是通过



多方面的工作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组织上层人物多次来内地参观，用为少数民族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团结教育他们。一九五一年开办了西南民族学院，由我任院长，为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多年的努力，各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大好局面。

## 十六、伟大的十年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政策，在西南局的领导下，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艰巨的社会改革，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以及剿匪、镇压反革命与肃反等工作；还进行了反恶霸地主的斗争，完成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一九五二年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五年冬，出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使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胜利前进。

一九五六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我被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七年，我国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

又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新的任务，我国在经济战线、政治、思想战线上不断取得伟大的胜利。

经过建国十年来的艰苦奋斗，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成长与壮大起来，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回顾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充满信心，坚决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定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胜利不是伸手就可以获得的，胜利不会一帆风顺地到来。中国人民在从事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重重困难，今后也仍然会有很多困难。要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必须埋头苦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彻底的坚定性和革命精神，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

〔编者按：伍修权同志的回忆录，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历次口述的记录稿，通过对自己革命经历的简要叙述，反映了我党、我军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有关人物的活动，对研究党史很有助益。

本刊发表这篇回忆录时，伍修权同志表示，由于手头缺少有关的资料，仅凭个人记忆，所谈情况难免有所遗漏或不准确，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订正，以便修改充实。〕

### 一、青少年时期和家庭 (1908—1922)

我于一九〇八年，也就是光绪末年的农历二月，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普通家庭。老家在湖北省大冶县。那里有我们这一姓的祠堂，过去每三年修一次家谱，每个新增加的男丁都要去报名上谱。我出生时，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朝湖广总督衙门的一个下属机构里，充任文书一类的低级职员，在经济上算是个小康之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各地的清朝衙门纷纷关闭，我

的父亲和祖父就同时失了业，全家靠先前的少量积蓄度日，当时我四岁。一九一三年祖父去世，家庭生活从此江河日下，开始衰败下来，不久家境就沦为城市贫民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我父亲在他的旧交吴元泽（湖北襄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吴德峰同志的叔父）家里当管文牒的“师爷”，得点生活费。后来，黎元洪当大总统时，吴元泽又带我父亲到了北京，找到在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他是我党“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建国后曾任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农业部长），吴元泽想在自己找个职位的同时，也为我父亲谋个差使。经过他的活动，先给我父亲挂了个“候差”的空衔，领取数量很少的干薪，住在湖北会馆里。他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每一季节都积攒点钱寄回家。这样“候”了一个时期，谋事的希望终于完全落空了，只得丧气地返回武昌。我记得他当时从北京回来，只给家里带了几个“心里美”萝卜，还带回几样当时我们看来认为很贵重的药品：一种是北京同仁堂的眼药水；一种是“金老鼠屎”，其实只是一种金色的有老鼠屎大的治肠胃病的普通药丸。他经过千里跋涉，多方奔走，就带回家这些“宝贵”礼物，可以想见那时他谋生度日的艰辛和家境的窘迫。

一九一八年，父亲回到家中，求职当然更加无望了。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依然无以为生。他就给学校里抄写讲义，誊写石印蜡纸，每写一页，可得几个铜板，就这样家里还是经常无米下锅，我自然也没有机会上学了。那时我已十岁，记得经常买红苕（红薯）糊口度日，在市内买



还嫌贵，就由我同哥哥跑到十几里外的长江边上，直接找乘船运来红苕的农民买，这样可以多少便宜一点。尽管来去一趟要两、三个小时，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能买到稍微便宜的红苕，心里也是满高兴的。为了生计，家里又找了些零星杂活，象糊火柴盒子，就是全家人一齐出动，不分早晚拚命地干。当时还闹什么选举，有大量的选票要叠起来，这也是挣钱的一个门路。尽管我们不放过每一个机会，不辞辛劳地干，可是生活仍然难以维持，连房租都付不起，就搬到差点的房子里去。住了一阵，还是付不起房租，又搬到更差的房子里。结果，在不长的时间里，一连搬了四次家。从已经很坏的房子，搬到了条件更差的贫民区。刚到贫民区时，我们开始还有四间小屋，以后还是因为住不起，又划出了一间。全家十口人，住了三间小屋，薄瓦盖顶，冬寒夏热，下雨就漏，每天晚上都要临时搭铺，早晨掀起放一边，不然人就无法落脚，我那时就跟着奶奶一起睡。我家的地址在后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东边，现在那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那时我们有好几家邻居，一家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一家是卖甘蔗、桔子的小贩，一家是挑剃头担子的理发师。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的孩子也就成了我的好伙伴，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不少事情，学到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波及到武汉时，也在武昌的大中学校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学生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武昌的两条主要大街，一条是南北向的长街，一条是东西向的察院坡，到处都挤满了游行的队伍。那天我正好

到蛇山去挖做泥巴的红土，在街上看到了那么多的学生，虽然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但是学生们的热情精神却引起了自己的无限羡慕。晚上，各校学生又举行了提灯游行，我又去看了热闹。这些活动对于武汉市民和我，都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那以前，我没有上过学，只由我的叔父教过一点“四书”，但是只知道背诵，却不知道意思，仅仅认识了一些字。一九二〇年，我家邻居，一个工人的儿子，在武昌高等师范附属的“单级学校”读书。他问我想不想上学，说他们那个学校不要钱。我说当然想去。因为不要钱，家庭也就没有阻拦。就在那年春节后，跟邻居的孩子去那学校考试，因为我已经认得一些字，又会一点算术，就被收下了，并被插进二年级二期。那时我已十二岁，比正常的上学年龄晚了好多年，可是我仍然很高兴，眼前展现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所单级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同时教四个班，每班十多个学生。老师先教一个班，例如一、二年级的学生学算术，三年级的学生学语文，四年级的学生则在写作文，然后交换。这样，不同年级、不同课程交错进行，各班互相配合。老师确实很辛苦，象走马灯似的来回穿梭。但他教学得法，安排得井井有条。也许是环境所迫，他的“精讲多练”的方法倒使我们学得比较扎实，使人至今难以忘怀。我在这所单级学校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九二一年夏，省里因为教育经费不够，停办了这所单级学校。老师看我在这段时间内学习如饥似渴，一直很用功，成绩也很好，就推荐我免费进入高师附小的四年

级，校方也同意了。因为家里困难，做不起校服，我就穿着老百姓孩子的旧布衫上学，不过我的功课好，待人也诚恳，老师和同学同我的关系也很好，避免了因为贫穷而容易受到的歧视和侮辱。在那里我又读了三年，直到毕业。

这所高师附小是一个很简单的学校。我在该校四年级时，级任老师熊器叔，长沙人，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生。他思想进步，工作努力，教学有方，学生们都很喜爱他。他是全校文娱活动的主持人，每两周、至少每月都有一次学生联欢会，那时叫做“余兴”，内容是讲演、双簧、话剧等，都是经他编写的。我是他写的演说稿的主要讲演者，也是他编写的剧本的主要演员。这些课余活动的锻炼，对我以后的工作和活动是颇有裨益的。

一九二二年，我在五年级时，来了一位新的级任老师，他就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与学生的接触很多，关系很密切，对学生的思想影响也比较大。这样，陈潭秋同志就成了我革命思想的启蒙人，正是他在次年冬亲自介绍我参加了“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他的直接引导、帮助下，我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参加革命，符合“穷则思变”的道理。正因为家庭破落，在社会矛盾中处于下层阶级，贫困与苦闷迫使我要求改变现状，要寻求出路，除了投身革命行列外，别无它法。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起首要作用的第一个社会物质生活的因素。还有第二个精神意识的因素，就是有了陈潭秋等同志和几位进步老师的引导教育。他们的革命真理之



火，落在我们这些要求变革的贫困青年的干柴堆里，必然会燃烧起来。第三个因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给予自己的现实教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悲惨现实，随时随地都在启发我们初步的革命思想。这也就是存在决定意识。正是这三个因素，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 二、走上革命道路

(1922—1925)

一九二二年秋，陈潭秋同志来到武昌高师附小后，我的母校很快成为当时在湖北的一个小小的革命摇篮。他直接和间接地引导不少进步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附小担任了五年级的级任老师，我正好是他班上的学生，不断地从课堂上和平时的接触中，接受了他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的革命教育。陈潭秋同志很有口才，工作也很严肃认真，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教学的机会，对学生不断灌输革命思想。在讲历史课时，他反复教育我们，不要仅仅从历朝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历史，而要从社会的变迁与经济的发展来考察。他还向我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些都是他在深入浅出地向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还结合社会上的实际状况及青年中的思想实际，揭露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指出什么“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



出路。我有一次问他，我们这样的穷孩子都上不起学，该怎么办？他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个别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社会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才能解决穷孩子上学等一系列问题。他还常常运用实例启发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那时汉口有外国人租界，我曾经在那里看见不少作威作福的外国阔佬，任意欺压我国劳动人民。有一次，我见一个外国人坐黄包车，车夫拉到目的地向他要钱，他不把钱交给车夫，却把钱扔到地上，侮辱人。车夫忍气吞声地捡起来，一数却太少，再向那外国人要，那家伙竟骄横地理也不理，挺着肚子扬长而去。这些亲眼看到的事，都深深地触动了自己，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老是这样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欺凌呢！我的这些初步的革命意识，当即得到了陈潭秋同志的注意和培养。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是我一生革命历史的重要起点，陈潭秋同志在对我进行了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之后，同负责团的工作的何恐同志一起，亲自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入团的还有其他两个同学，我被指定为团小组长。当时人们把共产党员叫“CP”，共青团员叫“CY”，谁要是加入了“CP”或“CY”，可是既神秘又了不起的事。我也觉得从那时起，自己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穷孩子，而是一个有目标、有理想和有组织的革命青年了，心里充满了一种自豪的感情。

我们入团后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积极发展团组织，物色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加入到我们的“CY”队伍中来。

不久，我们这个团小组就扩大到十个团员。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兴衰胜败，这十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两位同志很值得怀念。一位叫吴楚楨，他是湖北黄冈人，为人生性耿直，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并参加了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战争，可惜在攻打武昌的汀泗桥战役中不幸牺牲了。还有一位叫范正松，湖北黄陂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不幸被捕，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的亲属劝他不要承认是共产党，可以设法保全生命，但是范正松同志毫不畏惧，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终于被敌人枪杀了。其余的大多数人在大革命失败时都先后离开了革命队伍。当初的十个人，只有我是幸存者，回顾起来，不免感慨万分。

一九二三年秋，我已由附小五年级升到六年级。在此期间，陈潭秋同志曾一度离开武昌，到江西安源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四年夏，他又返回湖北，继续在武昌领导党的工作。这时我已是六年级，级任老师张朗轩，也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不知他当时是否已经入党，只知他受陈潭秋同志的思想影响很大，他曾写过一篇驳斥张君勱的哲学文章，是由我替他抄写誊清的。他对我一直很好，后来我被党选派赴苏学习，出国前由汉口至上海的路费开销，就是由他支援我的。

我在学校的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从四年级到毕业，每年考试都是第一名。我不仅学习很好，体格也很棒，同学们送给我一个绰号，叫“台炮”，这是湖北人用来形容身体特别健壮的人的叫法。由于我身体好，体育成绩同样最佳。一九二四年学校开运动会，按年龄大小分为甲、乙两组，

我被分在乙组，结果乙组的冠军几乎被我囊括了。当时的运动项目除了跳高、跳远、赛跑和高低栏外，还有算术竞走和提灯竞走。前者边走边算题，到终点马上写出答案，体力脑力一齐赛；后者既要走得快，又要保证烛火不灭，练身体的稳劲。这些项目我都得了优胜。

我还参加过武汉大、中、小学的游艺会演，附小的每次演出，我不仅是老演员，还总是演主要角色，并且又总是演正面角色，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气质有关。记得有一次我演了戏中的一个法官，主持审判了几个坏人，没想到几十年后我竟当了真的法官，参加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帮坏蛋。

二十年代的武汉，革命气氛还比较浓。我们附小的学生，也常在老师的组织和帮助下，参加一些活动。一九二四年春，我校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游行。同学们每人拿着一面小纸旗，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革命口号，也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时的国民党是孙中山领导的，正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游行的领队是钱介砮老师，殿后则是一支学生组成的“笛鼓队”，我也在其中。我们有十多支竖笛，几支小洋号，还有几面军鼓，一路吹吹打打，还不时喊着革命口号，路过热闹街道时，我们都特别起劲。几年前五四运动时，我曾羡慕过当时游行的学生，如今我也成为游行队伍的一员，并且是其中的骨干，心中不免感到兴奋和自豪。这次游行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们的“笛鼓队”既吸引了不少群众，又起了迷惑敌人的作用，整个行



动测试了一下反动军阀对革命活动的反映。

一九二四年我小学毕业，离开了武昌高师附小。这个学校不仅对我一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它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当时武昌以至湖北的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进行的。陈潭秋同志是中共湖北支部的第一任书记，他以附小为中心，团结了一批革命力量，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使附小成为武昌的一个革命活动中心。一九二七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在学校的小礼堂举行。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和罗易、鲍罗廷、威金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都到这里参加过会议。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做武昌中华路中学，听说有的建筑已经被拆除了。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地方应当尽量地保存下来，因为它也是我党初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我是赞同这个意见的。

我由高师附小这个小小的革命摇篮，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又直接受到过陈潭秋等同志的教育和引导，现在回想起来，还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幸福的。由于我家庭经济困难，附小毕业后我却无法升中学，得去找事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并贴补家用。正好武昌的“共进书社”招收学徒，这是一家常卖革命书籍的进步书店，很为青年学生所欢迎。我得讯后就去应试，结果被录用了。书社里也有共青团员，我去后一共有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团小组，除我以外还有吴云峰和一个女同志。到书社后，开始我不太会卖书，就做些粗活和跑腿，为几个小学送书。每天为



经理打扇子，也是我的工作之一。那时没有电风扇，房子里吊了个大布幃子，不断用绳拉着前后摆动，就生出风来，我就是这个风扇的主要“动力”。除了这些杂活，还要我帮助誊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尽力做好，埋头苦干。

正当我因为已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慰时，我的生活却又意外地发生了转机。我原来在高师附小的同学，经常来“共进书社”购买书籍和文具，有些同学过去跟我的感情一直很好，因为我在校时学习成绩好，曾经在学习上给过他们不少帮助，他们都把我当作小先生。他们见我在那里当学徒，很为我的失学惋惜，热心建议我还是去读书，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助我交学费。我回家与父母一商量，他们看这也是个机会，就同意了。于是我就在同学们的自发支援下，离开了书社，插入高师附属中学一年级去继续读书了。附中离我家有十来里路，我每天步行上学，来去得两个小时，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又没钱在学校搭伙，只能用零钱买点大饼充饥，赶上没有零钱了，就得饿肚子。有一次不仅我自己饿肚子，连家里都断了炊，连着几天揭不开锅，全家人简直走投无路了。我偶尔向一位最亲密的同学谈到这情况，他非常同情，马上解囊相助，送了我一枚银元。我忙拿回家全买了大米，使家里度过了一次不小的难关。

当时我的生活这样清苦，学习也很紧张，可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却更高。我经常和我们团小组的同伴一起，出去散发革命传单，张贴革命标语。一九二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沿着武昌的长街，见到坐在车上穿着朴素的人，就将传单送给他，车上如果是穿着讲究、戴金丝眼

镜的阔佬，便不能送传单给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接受革命宣传的。虽然这只是从外表形式上看问题，但也算是有个简单的阶级观点了。我们还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标语，贴到武昌一些最繁华的街道上。为了应付警察，我们贴标语时先派一个人去同警察纠缠，分散他的注意力，另一个人就乘机快速贴出。除了这些经常活动以外，还参加了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活动。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同志在高师附小临街楼上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二十多人参加的党团员会议，陈潭秋和董必武同志分别讲了话，记得陈潭秋同志讲的是列宁的逝世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国际共运的关系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林育南、刘昌群、李子芬、何恐等活跃人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所以印象很深刻。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昌阅马场组织了几千人的纪念活动，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用各种形式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组织出售了介绍新三民主义的书籍和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等。这些活动，冲破了吴佩孚、肖耀南等军阀统治的禁令，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也是当时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很快影响到武汉，党组织动员全体共青团员和部分进步青年，积极投入这一运动。我们被编成三个人一小组，分派到汉口市内进行街头宣传，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行，动员群众不用日货，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有一首提出“打东洋”口号

的革命歌谣中，曾经这样唱道：“高丽国（指朝鲜），琉球岛，与台湾，地不小，可怜都被他（指日本）侵吞了，……”我们在街头的演讲和宣传活动中，赢得了不少听众，每到一处，一开讲就吸引来不少人，多至百十人，少时也有几十人，听众中大都是年青的工人、职员和学生。有时遭到警察干涉，我们就及时转移地点，继续进行宣讲。夜里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找个小旅馆随便休息一下。那种地方，臭虫、蚊子特别多，咬得人根本睡不着，但是我们毫不在乎。这样连续好几天，身体确实很累，情绪却仍然高昂，每天有那么多人听我们的宣传，就是对我们的很大鼓舞，个人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共青团组织还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各种学习。何恐同志曾经利用到洪山野游的形式，使我们接受党的教育。有一次是由当时负责党的工作的彭泽湘同志，给我们讲唯物辩证法，听讲的有十多个人，何恐、许之桢等同志也参加了。虽然我那时并没有完全听懂什么叫辩证法，以后也没有真正学好，但是正是在那时，第一次正式听到了这个新名词，对自己一生的思想还是影响很大的。在洪山野游时，有回何恐自费买了许多面包、黄油分给大家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些洋东西。除了这些集体的学习活动，我们还经常阅读各种宣传革命的刊物，印象深的有《新青年》、《中国青年》和《向导》等，国家主义派办的刊物，如《语丝》等我们也常常拿来当作反面材料读。还读过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书。

那时给过我们教育和指导的，还有钱介磐老师（后改



名为钱亦石)。他当时是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出现的共产党员。原来高师附小的张朗轩、何春桥、刘季良、江子麟等老师，对我们的思想和学习，都有过不少的影响。当时武汉的一些大、中学校，主要设在武昌，这些学校内都有党团组织在活动。王明当时也在武昌，是商业大学的学生，他是在那里开始参加学生运动的，不过那时谁也不注意甚至不认识他。所有这些学校的党团组织，由卢春山同志负责联系指导，我校有一个团员帮助他搞联络。当时的这些活动，许多是由陈潭秋等同志组织和领导的。

陈潭秋同志在领导学校党团组织的同时，还领导了武汉的工运工作，他在这方面的事迹很多。我记得他在武昌城郊长江边一个叫“鲇鱼套”或“徐家棚”的工人区，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没有房子用竹子搭棚子，做了极简单粗糙的桌子、凳子，招收了一些十岁上下的工人子女，在那里识字学文化。陈潭秋同志专门分派我们一些共青团员深入工人区，一面了解工人子女的学习情况，一面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教育课。我们通过观察调查，接触了许多工人，深入了工人家庭，得到了许多学校里得不到的社会知识和生动材料，这不能不深深地教育了自己，更激发了自己的革命决心。

一九二五年秋，我正在高师附属中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有一天放学路过钱介砉老师家门口，他叫住我说有话要谈。原来那年孙中山逝世，引起了苏联共产党的重视，他们为了纪念孙中山，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和培养各国革命干部，决定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俄文名称是“孙逸仙大学”），



到秋天筹备就绪，便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动员并选调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习。钱介磐就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找我谈话的。他向我说了开办中山大学和去苏联学习的意义，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想不想去。我一听立即果断地表示愿意去，那时我们对苏联很向往，认为那是穷人的天堂，能有去学习的机会当然求之不得。钱介磐说如果我愿意去，就把我的名字列上。我说还是问一下家里，估计没问题，请他放心。

回到家里，我高兴地向父母说了这事，他们竟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都同意我去。他们对于儿子要远走他乡，心中究竟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家里兄弟多，生活困难，走一个人也减轻他们的一分负担，还可以寄托他们望子成材的心愿。父亲说了些勉励和关照当心的话，母亲和哥哥们也不反对，全家都赞成我上莫斯科学习去。我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家庭关”。不过，并非人人都能象我这样轻松地过这一关的。我们一同入团的三个人，都被党组织提名了，但是一个因为是独生子，不能去；还有一个家里反对，去不了。我是幸运的。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并且很不好解决，就是按当时规定，出国前从汉口到上海的路费和最必要的服装用品，必须自行解决。我家那么困难，实在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困难中还是靠了革命同志的帮忙，才解决了难题。我在小学六年级时的级任老师张朗轩，知道这一情况后，慷慨地拿出了四十块钱，帮我交了到上海的船钱，还给我买了学生装、卫生衣、胶鞋等必需衣物。何立人同学又送了我一件旧的短大衣，使我出国后安然度

过了西伯利亚的严寒。这些在我困难时给过重要支援的人，我一直感谢并怀念他们。解放后我曾找过他们，见到过何春桥、江子麟老师，而张朗轩、钱介砉老师则已去世了，但他们的革命情谊却永远温暖、鼓励着我。

一九二五年的阴历八月中秋，月亮格外明亮，这个日子我太难忘了，我父亲打了二两酒，母亲炒了一盘肉和一盘蛋，全家为我饯行。在我参加革命活动以来，虽然没有正面对他们讲过，但他们是知道的，并且从来没有反对和干预。有一次，我父亲发现我留在家里的团章，只是悄悄地关照我要小心。这次我要外出飘海留洋，他们仍然支持，连我母亲都什么话也没有说。

吃完告别酒后，父亲和三个哥哥一起，送我到汉口六码头，同被选派去苏联的另外十个人会合了，相比之下，我的行装最简单，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家境都比我好，我的年龄也是较小的一个，当时才十七岁半，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却要远离家庭和故乡了。当天夜里，在八月中秋的明亮月光下，我们乘的船就顺着长江的波涛开航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好象只被一种兴奋心情鼓舞着，别的竟很少想到，古代文人骚客那种离愁别绪我几乎一点都没有。

我们由汉口出发，共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默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知可（又名濮世铎）、高衡（又名高理文）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她们是黄励、杜琳和宋伟。当时我们是怀着同一个目标去苏联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们走上的

却并非同一条道路。有的同志在斗争中不幸牺牲了；有的同志解放后还在为党工作；也有些人走到相反的方面，变成了国民党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励同志，在我们由武汉动身时，她是进步的国民党员，到莫斯科后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十月回国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上海被捕入狱，七月在南京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她慷慨激昂地说：“革命者不怕死，革命者杀不完，国民党政府的寿命不会长了！”牺牲时才二十八岁。

### 三、在苏联的五年半

(1925年秋——1931年夏)

####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一九二五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在莫斯科开办中山大学，由我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前去学习。我们湖北选派了十一名，我是其中之一。农历八月中秋那天深夜，我们乘船离开武汉驶往上海。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船经过南京时，不知是那一方的军队，要征用我们乘的船，旅客统统被赶到了岸上。但是为了遮丑，他们还是安排我们在下关坐火车去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我们住在中央指定的一家旧式小旅馆里。一间大屋子里面用木板隔开了一个个小房间，每间住三、四个人，地点在法租界内。此时正进行江浙军阀战争，租界边上都堆了沙包，筑了工事，气氛相当紧张。因此，我



们很少外出，每天在旅馆中读书看报，等待出国。我们的领队胡彦彬经常同党中央保持联系。直到十月下旬，才得到了出发的通知，说有一艘回海参崴的苏联煤船，可以把我们带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去莫斯科。这一天，我们带着自己的简单行李，步行到黄浦江码头，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乘小舢板划出吴淞口，登上了停泊在长江口的苏联煤船。先后上船的共有一百多人，是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北平、天津等地选调来的。他们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马骏、马骅、于树功、刘辉、曾鸿毅、罗文炳等等同志。

为了应付可能的意外情况，我们上船前都准备好应付盘查的话，说自己是去苏联当劳工的。其实我们这批人中，除了有我这样的穷学生外，还有西服革履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大学教授。我那时的行装最少，有人带着阔气的大皮箱，根本不象去当劳工的样子。那时，我们革命者方面没有经验，反革命者方面也没有什么经验，当时的军阀政府还不象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那么组织严密，所以，我们并未经受到什么风波，全都顺利地登上了苏联的煤船。这艘船约有三千吨，船上并没有煤，我们大部分人都睡在下边的统舱里，因为都是从各省来的，大家互不相识。特别是我那时年纪又小，文化又低，样子也最穷，算是“第三等级”，加之口音关系，很少和人交谈。由于怕晕船，大家静卧在舱内，只是偶尔到甲板上透透空气，观赏一下海上

的景色。

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我们的船由上海开航，驶向苏联的海参崴。当时带领我们的两个人，一个叫杨明斋，他原来是苏联的华侨，俄文很好，曾于一九二〇年陪同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还有一个叫周达文，贵州人，他是与瞿秋白一起，在过去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会俄文的。他们这次受党中央的委托，专门为着送我们去苏联，一路负责照管我们，为我们向苏方联系各种事情。

在海上航行了几天，正赶上十月革命节八周年纪念日。船上举行了纪念会，由苏联船长主持，讲演十月革命的意义，又邀请中国同志讲话，我们推选了上海来的老资格党员俞秀松作代表，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接着又欢迎同船的日本和朝鲜同志讲话。在这艘船的甲板上，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气氛。在这次集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那悲壮的歌声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开始，我只是跟着哼哼，慢慢地也就会唱了。

在船上每天吃面包，加大块糖，我们中有的人不习惯这种生活，还晕船呕吐，不能吃东西。但我的情况还好，较快地适应了船上生活。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却象出笼之鸟，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想象，只盼早日到达久已向往的莫斯科，旅途的单调和疲劳，也就忘在脑后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前后，我们到达了海参崴。苏联船长带着杨明斋和周达文，先行上岸去与苏联的有关方

面联系，很快为我们安排好火车。黄昏时，我们一下船就上了火车，当夜就向莫斯科进发了。那时的苏联火车，就是电影《共产党人》中的那个样子，每节车厢安了个取暖的大油桶火炉，火车头要靠烧劈柴生火，每走几站就要停车搬装新的木柴上车，不然车就开动不了。车厢内是上中下三层木板铺，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幸好有同学送的那件短大衣，帮助我通过了一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现在看来似乎难以想象，可是那时年纪轻，身体好，情绪高，也就这么闯过来了。那时的苏联还很困难，车上的伙食有面包、黄油、方糖和开水这样一些东西，已经算是优待我们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吃不惯，特别是黄油。不过，我倒觉得很可口，还创造了自己的吃法，把黄油和糖放在一起，用开水一冲，又甜又香，它的味道和营养，比我家里的伙食要好得多了。这样一面喝着特制的黄油汤，吃着面包，一面看着西伯利亚铁道沿线的站台，一个一个地往后退去，离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莫斯科是越来越近了。我们怀着对未来的新的生活的憧憬，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习惯与不方便，一直保持着一种兴奋愉快的心情，终于走完了这段漫长的旅程。

我们的列车，在路上走了约两个星期，于十一月底到达莫斯科，那时天已经很冷了。我们被接到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的中山大学住下。学校面临大街，对面是一个大广场，还有一座俄罗斯有名的大教堂。我们开学后，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作体操，体育教员听说都是从瑞典专门请来的。广场南端还有个不小的公园，正好成为我们常去



散步、休息的地方。学校楼前也有个小型的花园，我们常在下课后去那里透透气，和同学们彼此聊天。中山大学最初是几层楼的宽大楼房，有宿舍、教室、食堂、小吃部和学校的办公用房等，不久后还修了俱乐部。从当时的眼光看，真是富丽堂皇了。开始时学员人数不多，都住在校内。进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我们每一个人谈话，问各自的姓名、籍贯、家庭成份、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曾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同时又请了裁缝专为我们每个人做西装、大衣和皮鞋等等。然后开始编班，发学生证。记得李培之同志的学生证是第一号，我是第七十三号。我一生有两个号码记得最清楚，一个是这个七十三号，还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关牛棚时的四十二号。

在我们这一批学生到达以后，又来了两批学生，一批来自我国广州，也是乘船经海参崴来的。他们中有后来东北军区炮兵司令朱瑞同志（已牺牲）、张如心同志等。这批学员成份比较复杂，国民党员较多；且有不少右派，如后来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之一的康泽，战时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抗战期间南京伪政权骨干人物林柏生、陈春圃和他们漂亮的未婚妻等。另一批是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来的，他们中有邓小平、傅钟、徐冰等同志，其中还有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二人。潘自力是我们的团小组长，刘仲容是学生会长。曾和我同班的有乌兰夫、张如心、张锡媛，还有张镇，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为是湖北人，同我关系不错，我想做他的统战工作，却没有成功。

学校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程度编成几个班，每班约二十多人。从法、德等国来的同志外语水平较高，编为法语、德语班。从中国去的英语较好的则编成英文班，直接用外语上课。我们同一批来的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沈泽民等同志，学习俄文进步特别快，不到一年时间，就一面学习一面当翻译。后来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同志考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我们学习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苏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在班上我的文化程度最低，别的同学都有大学程度，至少也是高中生，而我才读完初中一年级，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却居于中等。因为有些文化程度高的人对课程不在乎，学习不认真；有的人则是带着敌对的反共情绪在学，例如康泽、谷正纲等人，当然是学不好的。而我有“自知之明”，“笨鸟先飞”，全力以赴，非常认真地学，结果成绩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也叫“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吧！

学校的课程中，我对俄语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最大。当时我曾总结了学习俄语的三条经验：一是抓好文法的学习，记得那时只有刘泽荣先生编的一本俄语语法，一回宿舍我们大家都争着看，我把那些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化规律等等，都死背下来；二是抓记单词，把所接触到的新单词都抄到大本子上，将它们反复记熟，背熟后把这一批去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再反复背，如此不断反复，积累了大量单词；三是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听和讲俄语，通过实际使用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

平，这当然难度更大些，机会也不太多。政治经济学我也比较喜欢，教科书中有关剩余价值的理论，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找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和辅导材料来阅读。所以后来由我来担任这门课的翻译，就能够比较准确的翻译和讲解老师的论述，同学们听了也比较满意。

到中山大学不久，就是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展开了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报纸上公布了苏共中央同托派的不同纲领，中大的学生也卷入了这场争论。我当时虽然没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却有着传统的正统观念，一直很明确地支持斯大林的联共中央路线。但是同学中有些人却和我不一样，他们支持托派的观点，这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人特别欣赏托洛茨基的才华和知识分子气味。我校学生都听过托洛茨基的讲演。他能用英、法、德、俄各种语言演讲，他的才气是颇能吸引一部分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以康泽、张镇等人为代表的，他们从国民党的反动观点出发，拥护托派，反对斯大林。学校中支持托派观点的同学，在辩论会上，捧着一大摞列宁著作，一面翻书一面发言，说在什么书多少页上，列宁是怎么说的，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地为托派辩护，很有煽动性。

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不久，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这一期间的中山大学，也处于很紧张的气氛中。同学们都被不同程度的卷入了斗争，有的同学，如我们同船去苏联的陆渊等人，竟成了学校中托派的头头；还有人因此受到开除党籍、团籍、流放和遣送回国等处分。不过，这场斗争对我个人却影响



不大，我的主要精力仍然用在学习上，管它斗争如何激烈，我还是保持了正常的学习。当然我也不是完全不闻不问，还是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倾向的。我同某些有托派观点的人，虽然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从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还有个人交往，有的还比较亲近。例如我的小学同学濮世铎，在小学时我们就很要好，我有时就住在他家，他也住过我家，一同到中山大学以后，我们每月发十个卢布零用，我那时很节约，也没有什么嗜好，钱总是有存余的，看到濮世铎抽烟钱不够用，我就把节余的钱给他。他后来受到托派观点的影响，我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了，但个人的交往还是保持着的。他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投到国民党方面去了。解放前后，他参加了“民革”，现在可能还在世，住在北大他儿子那里。

有一回讲西方革命史，学校请来了一位八十岁的巴黎公社老社员，给我们讲巴黎公社的经验。给他当翻译的是叶青，那时叫任卓宣，他也是从法国来的。听说他回国以后曾经担任过负责工作，被国民党抓去未死成，以后却成了中国托派的一个重要成员。

我们在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受优待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学校还把我们送到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去。那里环境优美，虽然设备一般，但每天早餐是牛奶、可可、鸡蛋、黄油和面包，伙食很好。上午专门有位教员给我们读报，讲当天的形势，其余时间就是休息、散步、作体育活动。那时苏联建国还不到十年，就组织这些活动，使我们觉得

社会主义制度真关心每一个人，生活好得很。平时学校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千方百计安排好，曾经专门派人到远东采购海参、香菇等名贵菜，给我们改善伙食，衣、食、住等各方面都搞得很好，开始人少集中住在校内大寝室里，每屋有二十多人，后来学生多了，就分些人到外面好几个地方住。

我们后来住的地方离克里姆林宫不远，有时在路上还可以碰到正步行上班去的斯大林。他总是穿着一身红军的呢大衣，一个人很随便地走着，不见身边有警卫人员。当然，也可能警卫人员化了装，隐蔽得看不出来。他曾经到我们学校讲过话，所以大家都认得他。他来中大时，也是穿着红军大衣，很朴素，老是抽着他那个有名的烟斗。由于他是格鲁吉亚人，俄语发音不那么准确，所以讲话比较慢，但用词很准确，有一股深沉、坚定的力量。他当时的讲话，我认为当然是正确的，只是他讲的经过一层翻译，听得并不是那么清楚，直到以后看到了正式的译文，才有较深的理解。例如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那次答复中大学生十个问题的讲话，我是后来才领会了它的意义的。

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拉狄克，是国际共运中的有名人物，波兰人，德文、俄文都很好，常常不拿稿子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很有学问，他后来也成了托派的重要成员。副校长是米夫，以后是共产国际的东方部长，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两次来过中国。我党有名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他一手导演的。学校里的党的书记是个工人，长得很结实，叫阿戈尔，波兰人。教育处长叫波古良也夫。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曾到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作过报告，向我们讲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还讲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谭平山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到过苏联，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里作过报告，讲农民运动，也作了自我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当过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下令停止农民队伍进攻长沙，就是通过他去执行的。他讲话时有口头语，每一句话中都要带一个“这个”，这样，从头到尾有无数的“这个……”，给大家留下了谈笑的资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制造白色恐怖，中国大革命失败。这些变化很快反映到学校里，同志们对此也展开了议论和争论。当时苏联报纸上也登了有关中山舰事件、农民运动的消息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有的同学也在墙报上写稿子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我当时水平不高，对机会主义实质理解不深，不过陈独秀不让农民围攻长沙，让武汉工人缴了枪，我是表示了不满意的。在马列主义基础课中，结合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斗争，例如中国的北伐战争和蒋介石叛变，特别是苏共当时反托派的斗争，来进行分析和认识；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看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懂得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认清了资本主义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虽然这些学习大都还是填鸭式的灌注，但在确立我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是起了奠基作用。

学生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一种是对少数国民党



分子的斗争；一种是对共产党员内部动摇派的斗争。大家都思想活跃，态度明朗。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到处宣传他们的旧三民主义，有的党员受他们的影响，转向了国民党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原来是国民党观点，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好象不多。

在我们以后，王明、博古等也先后到了中山大学。王明他们看不起国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搞不团结，控制了学校党组织“共产党支部局”，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小宗派。他们最活跃的时候是一九二九年，那时我已经离开了中山大学，到军事学校去了。

也在那一段时期，在同学中还议论着有什么“江浙同乡会”，因事不关己，我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对托派问题，我虽然因为自己水平不高，没有在讨论会上作过有系统的发言，但平时与同学交换意见，我拥护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反对托派的态度一直是明朗的。当时中大不少学生参加了托派，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送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劳改，一部分人被遣送回国，以后也陆续受到审查和处理。我回国到苏区以后，一直没有碰到一个真正的托派，但是，我却见到不少同志因此被审查。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们在中山大学的學習告一段落。由于国内蒋介石和汪精卫国民党“左派”相继叛变，大革命完全失败，学校开始让一些人回国。第一批大都是些国民党分子和倒向国民党观点的人，他们是经过蒙古回国的。第二批主要是党团员中比较能干的，学习得好的，有选择地先行回国，他们也都路经蒙古。

本来我们都要陆续回国，但以后经过蒙古的通路发生艰难，我们就被留在莫斯科，最后中央确定我们到军事学校学习，准备回国参加武装斗争，我也就被留了下来。

### 在莫斯科步兵学校

因为回国的路线一度中断，更因为国内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党认识到不掌握武装不行，中央决定我们在苏联学习军事。同时，又从国内派来了一批经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同志，还有一些上海工人和农民武装骨干，分别到苏联的各军事学校学习。还告诉我们，举凡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空军都可以由自己选定目标。按我当时的条件，各科都可以去报名，但我考虑到学海军或空军不切合当时国内的实际需要，便决心报名到步兵学校去学习。

一九二七年秋，我们十一名中山大学的同学，来到有名的莫斯科步兵学校。我们在一九二五年秋从湖北动身时是十一个人，这次一起去学习陆军的又是十一个人。学校为我们编了一个特别班——中国班。班长叫梁振鸿，广东人，人很正派，学习比较好。他的父亲同叶剑英同志关系比较密切，叶到莫斯科时，还到中山大学去看望过他。同班的有从法国回来的甘瑞和傅汝霖，江西的郭景淳、罗文炳，河南的李星若，上海邮电工人尤赤，陕西的董汝诚，黄埔军校的彭文畅，加上我共十人，还有一个人的姓名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十一个人也分两派，有一些人是支持托派观点的，他们每逢星期天，就要到中山大学去，找他们

托派观点的人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搞串连。我们之间是常常有争论的。我们所在连队，主体是俄国同学，其次是朝鲜同志，我们的队列班长是朝鲜同志金国龙。我们和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很好，连长是一名红军战斗英雄，红旗勋章获得者。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月革命十周年时，我们步兵学校的学员，作为苏联红军战士参加红场的阅兵典礼。莫斯科的十一月，已经下雪了，这天正飘着雪花，可是我心里却热血沸腾，一大早就精神抖擞地集合在莫斯科大街上。时间一到，我们的队伍就排着整齐的分列式，在红旗的引导和军乐的伴奏下，擎着步枪，迈着阔步，通过了红场的列宁墓前，接受了斯大林和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检阅。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我国的建国十周年阅兵观礼，不由想起那次在莫斯科的阅兵典礼。从这回顾中，我不仅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壮大，也看到了个人的成长。我自己后来能在军队和政府中担负一定的责任，与我当初曾经象一个普通战士那样，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莫斯科步兵学校的这段生活，还是值得记忆的。

我们在步兵学校接受了整整一年的军事训练，学习内容有关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课目、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和俄文。有个老华侨给我们作翻译，实际上他当不了这个翻译，许多军事术语他翻不出来，这倒给我们创造了条件，锻炼我们直接听俄语讲课。这里的学习生活比中山大学紧张，除课堂讲课外，还有队列、打靶、



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夏天野营住帐篷，冬季训练踩着一尺多深的雪。平时每天一早就起床跑步出操，每人都穿着红军大衣和大皮靴，这是很累人的，但也是很好的实际锻炼。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上海等地又来了一批中国学生，他们先到东方大学经过一年政治训练，一九二八年秋被派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时学校就成立了一个中国连，有三个排。连长是一个朝鲜同志。排长三人，其中有现在军事科学院当顾问的王智涛和田德修（吉合），还有一个叫彭文畅。当时我班的其他同志，有的另外分配了工作，有的已秘密地派回国内去工作了。梁振鸿和我留下来当翻译。此外的翻译还有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四个人：一个是从法国来到苏联学习的乔丕成，一个是傅清华，另外两个翻译我记得他们的声音笑貌，却未记住他们的姓名。所以一共是六个翻译。我们干了一年，又当政治翻译，又当军事翻译。我最怕当军事工程学的翻译，什么“胸墙”、“背墙”等名词，因为我本来没有军事知识，又没有中文参考书，自己都弄不太懂，怎么能译得好，真是硬着头皮在干。我在中山大学学过政治经济学，所以当政治课翻译最有兴趣。当教员的是步兵学校的政治处主任，他是波兰人，上课只是照书本讲，没有一点新内容。那时我对书本背得也很熟，他讲的什么，我都能很清楚地翻出来，态度又很认真，有的学生向教员提问题，我就帮助他一一解答了。我在那里的学习成绩和工作情况都还不错，中国学生都比较努力，教员们对我们也比较满意。

一九二八年冬，中共六大已经开完了，我们团支部通过有关同志与瞿秋白同志联系，请他到学校同中国学生见面并讲话，他慨然应允，来到学校。他讲了六大的一些情况，并对盲动主义作了自我批评，使我们很受教育，他完全是个学者风度的人，没有架子，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和蔼可亲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乔丕成同志曾一起到黑海边的安拉普休假。我们受当地集体农庄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晚会，并由我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讲话，颇受群众的欢迎，因这也是国际主义活动的表现。当时的苏联人民是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事业的。

一九二九年苏共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党运动，也波及到了步兵学校的中国连。当年夏天，中国连停止了正常操课，全体党、团员集中时间进行清党活动，前后有一个多星期。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内各省去的，原来都互不了解，组织上也没有掌握什么材料，因此只能由每个党团员自己讲讲情况，也是搞人人过关那一套，出身成份不好的同志，都要作严格的检查和受到无情的批判，其内容大都是不切实际和无限上纲的，因为我当时还是团员，出身也可以，没有对我提出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参加对别人的处理。

### **在苏军远东司令部**

一九二九年十月，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中国的反动军队，挑起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战争。要抽调一批翻译到远东去协助苏联军队工作，一共调了约十个人。带队的是周

岱云留在伯力，梁振鸿到海参崴，彭文畅到赤塔，王懋坚到黑河，还有分到别处的。

当时苏军正同驻黑龙江的奉军张学良部交战，我随一个营当翻译。该营乘着内河的舰艇，沿黑龙江向中国境内航行。航行约一昼夜，进到松花江边上的富锦，部队上岸后驻扎在县城的街道上。当地的部队已撤走了。我领受了一个任务，动员当地老百姓到一个面粉仓库去拿面粉，谁愿拿多少就拿多少，还让他们再叫别人也去拿。老百姓很高兴，街上一时都是背着面粉的人。

当天下午即接到上级通知，战事宣告结束，我们仍然乘原艇退回伯力。我被安排到苏联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名义是见习员。去后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苏军俘虏了东北军一个旅几千人，旅长韩光第也在内，都被放在红河俘虏营。我和周岱云被派去进行俘虏的调查工作，同去的还有几名苏联同志。这件工作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因中苏两国政府已签订了和平协议，当时中方的代表是莫德惠，不久这批俘虏便全部遣返回国了。

第二件事是苏军在东北时，每到一个县城后，就将当地政府的公文卷宗统统缴获弄了回去，满洲里、海拉尔等好几个县的公文卷宗都搬来了，要我们清理这些材料，每一份都得看，要发现并选出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翻译给有关方面参考。这可是件“沙里淘金”的工作，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很少，只有少数高级机关的通报之类，还多少有一点内容。

第三件事是当时边界上走私的特别多，那时苏联很困



难，从中国把半旧的西装、日用品甚至高级的食品运到苏联，就能赚大钱。苏联很怕这些走私犯搞他们的情报，就把同走私犯的斗争当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分配我协助对走私犯的审讯工作。我发现他们大都是一般的经济犯，只要不是间谍犯和政治犯，对他们的处理都很轻，弄清了问题后，立即遣返他们回中国境内了。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是远东边疆保卫局成立十周年纪念，保卫局领导机关要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指定我写一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在纪念册上发表。当时我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应邀用俄文写了一篇文章，对当时中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全国革命的形势，作了评说论述。这篇文章由局的负责人帮我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刊登在这本纪念册上，可能在苏联还会找到。

在远东工作期间，领导上对我的工作有相当的好评。事实也是这样，那里华侨倒不少，但大部分是农民，没有文化，讲的俄语是“洋泾浜”，又象中国话，又象俄国话，而我们经过了专门学习和翻译工作的锻炼，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又积极肯干，所以很自然地就得到了领导上的欣赏。我那时还是共青团员，知道在苏联入党相当困难，想回国以后再解决，所以一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有个传统的习惯，即每当重要的纪念日，都要吸收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入党，也就是在那次纪念活动中，我所在的共青团组织主动找我，积极地推荐我入党。那一次共推荐了五个团员，其中一个是中国籍，就是我。后来我忘了我的介绍人是三个还是五个，“文化大革命”审查时竟成为一

个问题，其实查一查当时的苏共党章就知道了。就我现在不准确的记忆，介绍人是五个。不过我确实是那次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的。我记得就在那次纪念大会上，曾经正式宣布：某某同志由团员转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我还被指定在会上作了几分钟的讲演，表示感谢团组织对我的培养，自己还要努力学习，更好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工作。会后由本人亲自到伯力市党的机关去领取党证。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苏联共产党（布）的一名候补党员。后来我党中央有个决定，凡是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还是候补党员的，回国后即自动转为正式党员，所以我的党龄也就从这时算起了。

由于我的工作得到好评，我的职务也由见习员改为翻译，按俄文的意思就是翻译官。当时苏联很重视翻译工作，待遇也比较高。除了薪金收入，我还在业余时间将苏联报刊上的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由苏联同志印成小册子，给当地的华侨看。有时利用一个星期天翻译上万字，得到不少稿费。所以我那时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常有同志敲我的竹杠，要我请他们下饭馆，吃羊肉串。那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活还很困难，鸡蛋很缺，肉很少，只有午餐的牛肉白菜汤，才可吃上一块牛肉。有的华侨到乡下收购鸡蛋到伯力市上高价出售。

伯力市附近有个中国屯，那里有家专门演中国京剧的戏院，颇受群众欢迎，还有个俱乐部，负责的也是从莫斯科去的中国学员。俱乐部主任叫宋发明，副主任是刘凤翔（女），她是一九二七年到苏联的。她的爱人王一飞，是黄

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也是风云人物，到苏联后在远东苏军司令部工作。那时我们常到俱乐部去。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此被斗得很惨，王一飞病故了，刘凤翔被开除党籍，降低了级别，换了一间潮湿的小房子，生活十分困苦，谈起来令人心酸。粉碎“四人帮”后，她来找我，我把她写的材料转到中央组织部的老干部局，那里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刘凤翔，并对她说：“你不仅是老干部，还是老老干部中的女老干部呵！”仅这么一句话，使她在党组织——母亲的面前不停地流着热泪。好了，雨过天晴，现在她的各种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种种迫害，身体衰弱，总算能过一个安静的晚年了。

在远东工作时，我还经常参加星期六的义务劳动。夏天，青年团组织到郊区的集体农庄去参加收割庄稼。一九三〇年，苏联集体农庄已经有一些大型农业机械，什么脱粒机、收割机等等，我过去都没见过，看了以后真是不胜羡慕，我们中国什么时间也能这样呢？晚上，我们就睡在麦草地铺上，遥想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限感慨！同年冬天，我们还曾到车站装运木材，这是机关组织全体人员参加的，人人动手，齐心协力，一根一根的大木头被装上火车。困难吓不倒奋发的战士，真是一派革命气氛，这类活动我每次都是积极参加的。



## 四、回国前后

(1931年夏)

一九三一年，我在苏联已经五年多了，这个时期，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游击战发展的消息。我那时刚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革命精神旺盛的时候，不安心于苏联的舒适生活，反复提出要求，希望回国工作。领导上不断做我的工作，说我们是讲国际主义的，在哪里工作都是为着世界革命的需要，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工作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回国，组织上说当地机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才行。领导上也很通情达理，过了五一节，我就真去莫斯科了。我所以能走得这样顺利，其中有个插曲：我说我有个女朋友到了莫斯科，想去看看她，见了她以后再回来工作或者同她一同来。按俄罗斯的民族习惯，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很关心、重视的。所以，我们的领导当时听了还很高兴，马上帮我买好车票，还给我安排好了在莫斯科的住处，对我的此行照顾得非常周到，根本想不到这是我的“金蝉脱壳”之计。我拿了介绍信，到莫斯科就住在苏联国家保卫局（就是现在的“克格勃”）招待所。我找到那招待所，他们对我很客气，我有了吃住的地方，就去办自己的事情了。

我先找到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说明了自己的愿望，说国内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干部，我又是学军事的，要求回国参加斗争。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很支持，但我已经是

苏共党员，还要同苏共中央组织部去谈，就给我写了介绍信，盖了中共代表团的公章，让我去找苏共中央组织部。那里的领导马上接见了，同我接谈的可能是个副部长，起码是个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十分健壮的女同志。她的办公室很讲究，临街一面放着她的大办公桌，另一面有圆桌，大小沙发等等。她对我很客气，看了我带的共产国际的介绍信，听我俄语讲得很好，谈吐有条有理，态度也是温文尔雅的。我说了自己要求回国工作的愿望，因为我已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特地来征求苏共中央的意见。她很欣赏我的一番讲话，并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支持你的意见，马上写了个便条盖上章，让我再到共产国际去。我拿了她的信又找到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那里的同志说这很好，同意派我回国。我问是否回远东我的原机关去交待一下，他们说不必了，一切由他们去办，我可以直接回国去。他们很快给我办了手续，给我开了回国的介绍信。不久，我就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我先到赤塔的党的秘密联络站，由他们安排我回国。那里有不少中国同志，都是准备回国的。联络站组织我们分批离苏，陪我的是一位东北同志，苏联名字叫库图佐夫。我们那时都有俄文姓名，我叫皮达可夫。就为我用过皮达可夫这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就信口胡咬道：伍修权是不是托派？他不是《真理报》上发表过反党文章吗！是的，当时苏联是有个托派叫皮达可夫，他是苏共中央委员，国家银行的行长，他也确实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反党文章，我也读过，因为与我同一个俄文的姓氏，

所以引起注意过。但我那时才是个青年学生，怎么能同他联系起来呢？康生应该是熟悉当时苏联情况的，他这样千方百计地给人罗织罪名，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当然绝不是出于无知。

这年六月，我和库图佐夫由赤塔又乘火车到中苏边境，找到那里的秘密交通站。黄昏时候，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已有几个俄国人，叫我们也坐在车上面，混在他们中间。那时是夏天，我们穿了一身黑色的单衣，用一块围布把发给我们当路费的五十（或是一百）元美金和少量的中国票子包在一起，当做腰带捆在腰里，还准备好应付盘问的话。因为边界上两边的居民经常来往，有的人家住在这一边，种地却在另一边，还有来回跑做工的，我们就只说自己是伐木工人，别的什么也不能承认。

不久我们通过了边界。过边界的那一瞬间我记得很清楚，马车右前方有个小土岗，上面有个中国哨所，过界时哨兵问马车上是什么人，赶车的俄国人只答了三个字：“老毛子！”就没有人再问了。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边界，真是幸运！到离满洲里一公里处，又有个俄侨的秘密联络点，我们被接待在他家客厅的地毯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交通站的负责人派了一个只有十多岁的俄国小姑娘，带我们到满洲里火车站去，她离我们五十多米，一声不响地领我们走，一到车站，她就算完成了任务，自己回去了。我们就开始在中国境内独立活动了。

那时车站上人很多，有不少警察。对我们来说，关键是沉着二字，在那种情况下，一点也不能惊慌，不能躲



闪，要大大方方地在人群里和警察面前穿来穿去，如果缩手缩脚，畏首畏尾，那是很容易出事的。我们堂而皇之地买票，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到了哈尔滨，我们第一件事，是去银行把我们带的一部分美金换成中国票子，顺利地换了钱，就到估衣店买了中国衣服，给自己换了装，就同所有人一样，都是长袍大褂，布衣布鞋。我们住到一家小旅馆里，进去后，那旅馆的经理跟我拉话，盘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因为口音不对，就装哑巴，全由我那东北人的同伴“库图佐夫”答话。他说我们是出来找朋友谋事做的，因为没有找到，就准备回大连去了。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很快离开了这里，马上买了当天晚上去大连的火车票。火车开到沈阳后，不知大连出了什么事，车不去大连而改道到了营口，我们就由营口坐船到青岛，上岸后立即又买票去了上海，一路平安无事。到达上海后，找到预先指定的旅馆，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里，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

按照当时的规定，由苏联回国的人员，本人身上都不带任何证明文件，只由共产国际发电报到我党中央，介绍回国人员，商定接头地点和方法。我们按照规定，找到地方住下后，就在门房挂上自己的姓名（代名）和房号的牌子，等待到时就有人来找我们。可是当时党中央因为顾顺章叛变事件，机关受到破坏，我们在那里等了一天又一天，住了近一个月，一直没有人来找，我们有点着慌了。正好有天晚上出去逛街，在先施公司附近碰到一个同志，他叫张振亚，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一九三〇年在伯力远

东保卫局做过情报工作，经常来往于伯力和我国东北之间，我就是那时认识他的。他搞情报工作很有一套，以前还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比我大十岁，很有经验。他一看到我就说：“小老弟，你也回来了！”我说：“是”。他又问我找到党的关系没有？我那时顾不得考虑什么，忙说还没有接上，问他能不能帮我接关系？他让我告知住处，叫我过几天听消息。我知道这是冒险，但在那时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办。

过了几天，果然来人了，来的是吴德峰同志，他是湖北人，早年也在武汉从事过党的工作，解放后任第一任武汉市市长。他那时在中央管秘密交通。找到我们后，分别和我们两人谈了话，我和“库图佐夫”互相都不知道谈话的内容。吴德峰同志对我说，组织上打算派我回武汉去做地下工作，因为不久之前派了一个叫程启科的同志去武汉，他原是黄埔学生，后来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与刘伯承同志同学，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去了不久就不幸被捕了。现在武汉党的组织涣散，需要马上去人恢复工作。我考虑了一下说，自己是武汉土生土长的，那里的人们都认识我，去了以后很难立足，同时我回国来就是想搞军事工作，还是希望到苏区去。他说可以考虑。几天以后，组织上同意了我的意见，批准我去苏区搞军事工作。和我同行的“库图佐夫”，被分到别的地方去作地下工作了，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他的消息。

## 五、在中央苏区

(1931—1934)

### 进 入 苏 区

我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一个多月与中央接上关系，被分配去苏区搞军事。几天后，吴德峰同志领来一个同志（一九六五年我在大连见过他，叫郑重，是江浙人，他当时在上海已工作很久）。吴德峰同志说，组织上考虑到我刚回国，不了解国内情况，安排他陪我同行。我们买了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一同上船到达香港。郑重同志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派了一个交通员（广东人），领我们再坐船去汕头，又乘潮汕铁路的火车到达终点站——邻近福建的大埔。

下车时我提了个小箱子，里头除了一些零用的东西，还有几块手帕，其中有一块就是我的秘密介绍信。我在介绍信上做了个记号，同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混在一起，一点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埔车站的国民党警察检查时，我也就靠了沉着两个字，大大方方地打开小箱子随便他们检查。警察看到只是一些日用品和几块手帕，没有什么特别的東西，就让我们顺利通过了。大埔有条小河，看来一路上党组织早已布置好了，我们走了一段路，有只小船早就在河边等我们。交通员领我们上了船，划了好几个小时，黄昏时候到达闽粤交界地区的青溪，那里有中央的联络



站。他们安排我们先争取时间休息一下，还说我的箱子不能带了，只能把最必要的东西，用个小包袱包着，收拾好后马上接着赶路。当时已是黑夜，天上又没有月光，幸好交通员对路途特别熟，每条沟坎，每道小桥，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走在前头，每逢跨沟过桥，都预先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跟在他后面，紧张地走了一夜，天亮时才走到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地区。我们为了绕过赤白交界处的国民党保卫团的哨位，专门找没有人走的山路前进。路过一个小村子，见有茶水和很普通的点心卖。我们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继续赶路，中间只稍稍休息了几次。一共走了一个通宵和一个整天，终于绕过了敌人保卫团的哨所，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虎岗。

那时，红日西沉，天气晴朗，翻上山顶，就看到了一片令人兴奋的景象。山下的平地上有许多儿童团员在下操，队列整齐，很有精神，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长期的紧张情绪，一下子轻松了，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那么清新，那么香甜，感到自己终于进入苏区新天地了。我们下山找到闽粤赣边区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卢德光同志，他们先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工作人员带我们去见省委秘书长肖向荣同志。我把用手帕密写的介绍信交给他，他当即用碘酒一洗，原来用米汤写的字就一一显示出来了。我又向他口头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让我先在招待所住几天，听候省委分配工作。几天后他通知我说，省委分配我去闽粤赣军区工作。我拿了介绍信去军区，肖劲光同志当时是闽粤赣军区参谋长。他和我谈了话，说：

好嘛，就到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当参谋去！我当然听从分配。作战科长叫杨英，本来是师长，作战负伤了，来机关当科长，一边工作，一边治伤。下边也没有人，我去了就我们两个人，相互谈得很投机。他了解到我对兵器，特别是对马克沁重机枪很熟悉，就派我去司令部直属的机枪连当教员，负责教会连队怎样使用、拆卸和排除故障。这一套我在苏联步兵学校时学得很熟，于是就很高兴地去执行了这一个教学和训练任务。

### 首 次 参 战

这个期间，闽粤赣军区为了配合江西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战役。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地方军钟绍奎的部队，号称一个旅，实有二千多人。战区在上杭东南的芦丰。我军参战主力是“彭杨军事学校”和闽粤赣军区直属部队，包括我所在的机枪连，受肖劲光同志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布置后，经过一夜行军到达作战地区，拂晓向敌人发起攻击。我是第一次参加作战，在行军中，肖劲光同志特别叮嘱我千万要注意保持联络，一路纵队行军，一旦同前头的人失去联系再要赶上很困难，所以我就一步不松地紧跟着前面的同志。天亮时，战斗打响了，我们机枪连的四挺重机枪，全部占领了阵地。我一面参加战斗，一面在实战中继续教战士怎么打。有的机枪打不响了，我马上帮他们排除故障，修理好继续打。从拂晓打到傍晚，机枪连起了很大的作用，掩护了指挥阵地，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打得特别激烈时，我亲自握着重机

枪打，亲眼看到敌人被打得一排排倒下，心里感到十分痛快。我自己打了一阵，又教战士们继续打，指挥他们作战。战士们一边打一边学，学到的技术很管用。到了下午，有一回，我正转头向战士发布命令，就在我张大嘴喊话时，突然从侧面射来一颗子弹，击中我左耳下边的腮帮上。那股力量很大，一下把我猛地撞倒地上，约有一分多钟完全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才隐隐有点感觉。开始自己还莫名其妙，混身上下摸来摸去没有发现有什么伤，后来摸到脸上，湿漉漉，粘乎乎。看看一手血，才知道自己负伤了。可是马上又想到，自己第一次打仗虽然负伤，却没有被打死，还能够继续战斗，不由又暗自庆幸起来。

### 住院治伤，结识傅连璋

两个战士扶着我慢慢离开阵地。经过指挥所时，正在指挥的肖劲光同志见我负伤了，交待战士们把我送到后方包扎所去。在包扎所遇到了陈志方同志，他当时是卫生部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瑞士和驻越南大使），他叫护士帮我洗净伤口，用棉花和纱布把脸包好，又让我骑上他的马，再到后方的卫生所去。到后方以后，我们伤员都分散住在当地群众家。乡亲们对我们很好，送来稀饭喂重伤员吃，还帮助部队护士护理我们。这时，前面的部队已经撤退下来。这次战斗只给了敌人一次打击，没有能消灭敌人，我们自己却伤亡较大。亲自督战的“彭杨军事学校”校长、留法学生李林同志也牺牲了。在部队都奉命后撤的同时，伤员便向较巩固的地区才溪转移。当伤员用担架后撤时，有



意思的是因为我的块头比别的伤员大，老乡们嫌我太重，先拣小个子的抬，最后把别人都抬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很狼狈了。还是地方干部负责任，动员了四个人来轮换着抬我(别的伤员都是两个人抬)，才把我送到了才溪后方医院。

到了后方医院，生活和情绪都比较安定了。医院里伤员也不少，管理得很有条理。院长对我们很客气，亲自检查我的伤，不几天伤口化脓了，只好每天用消毒药水洗。这位院长知道我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一定要我到群众大会上讲国际形势。经他再三动员，我觉得盛情难却，就真去大讲了一番。不大的镇子，好不容易地集合了上千人，有军队，也有群众。记得我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经济大危机，这大大有利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现在革命斗争形势很好。讲的时候也没有稿子，当着上千人的面就信口开河，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动脑子，这些问题我平时还是思考过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有意思。那时一面讲话，一面伤口还在流脓，脓都流到了嘴边，也顾不上擦一擦，那时候年纪很轻，觉得没什么，满腔兴奋的心情支持着这样做。

在这个医院住了几天，来了通知要将几个主要伤员送到汀州去，因为那里条件较好，根据地也更巩固。我是和几个营一级的干部一同去的，到那里见到了傅连璋同志。他原来是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红军到后，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将他的医院完全用来为红军服务。在整个苏区里，他那里算是家大医院了。因为周围没有别的房子，我去后

也觉得这个医院真是大得很。我同傅连璋同志相识后，相互交谈得很融洽。他对我很好，亲自为我治伤，治疗护理特别尽心。我开始去时伤口还流脓，在傅连璋同志的细心治疗下，伤口逐步有了好转。那年八月中秋，傅连璋同志还自己买了月饼和水果来慰劳我们，和我们一起坐在病房外头的走廊上，边赏月边谈天。他平时照顾我们也很周到。从那以后，我和傅连璋同志的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我们也常来常往，我也得到过他许多帮助。

### 到红军学校

中秋节以后，我在医院又住了一段时间。中央决定，由王稼祥同志带领总政治部一部分人从汀州向瑞金转移，通知我随他们一起行动，去瑞金后另行分配工作。长汀到瑞金，由东向西有八十里路，经过一天长途行军，我虽然还是伤病号，仍然坚持步行走完全程。到达目的地瑞金后，我被分配到正在筹建的红军学校，校址就在瑞金城东靠城墙的谢氏祠堂里。我到学校去报到时，校长叶剑英同志找我谈了话，问我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和个人经历，我一一和他讲了。这是我同叶剑英同志的第一次接触，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谦虚和蔼，了解干部很细心。他详细地询问我在莫斯科是怎么学习的，对哪些课程有兴趣？我说对兵器学和射击学有兴趣。他说：“好好！就让你在红军学校当射击学教员，负责讲授射击原理”。当时我讲的瞄准线、射击线及偏差度等等道理，对一般红军干部还是很新鲜的。我在一九三一年第一次同叶帅见面，就觉得他待人诚恳，这个

印象一直没有改变。以后我们又长期共事，相互十分了解，直到一九七五年他推荐我回到总参工作，说明他对我的态度也一直没有变。他能用人之所长，这是他几十年的老作风了。

当时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办红军学校，除了调来叶剑英同志担任校长，还调了何长工、邓萍两位军长和好几名师长到学校工作。何长工同志主管全校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邓萍同志任教育长，校务部长是杨至成同志。第一期编为四个连，各连的干部都由新调来的师长或师级干部担任，他们是：一连连长龙云（与云南民主人士龙云同名），指导员张华；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他原来是师政委；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萍；四连连长林野，他原来的职务是红十二军参谋长，我被任命为四连指导员。同别的同志相比，我感到他们的工作能力都比我强，让担任他们同样的职务，多少有点“滥竽充数”。好在我们当时都年轻、好学、又敢干，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年冬天，红军学校正式成立，从前方选调了优秀的班、排长和战士来学习，每一期四个月，先后办了许多期。后来刘伯承同志也来担任过校长。一九三三年红校又改编为红军大学，由何长工同志担任了校长。

红军学校训练很紧张，每天很早起床，披星戴月地跑步、出操，进行基本训练。政治工作的任务是随时了解学员的思想动向，鼓励和保证大家好好学习，克服不正确思想。第一期学习四个月结束，学员分回前方，又调来第二批。第二期形势有所发展，学校扩大了，成立了一个步兵



团，又增加了一个政治营，营长郭耀山，是上海工人出身，调我去当教导员。当时各个连的学习重点是步兵战术，政治营的重点是做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四个月结业。第三期，学校继续扩大，新成立了一个特科营，并继续征招了一个团的学员，这一期的团长是张经武，政委何长工，我当教育主任，主管军事教育。除我们这三个人，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杨梅生，他当管理处长，管生活。我们那时相处很好，工作都很认真负责，生活虽然艰苦，都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一心一意教好学员，大家都是这一目标。

红军学校外头有一个广场，由广场向南有一条江，我们常走过江上的木桥到乡下进行训练。广场向西穿过弄堂就是大街，有几家商店和饭馆。当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每逢有刚从白区来的同志，我们就去“打土豪”，因为他们才到苏区，身上还有钱，我们就拉他们请客，上上小馆。记得被我们打过的“土豪”有吴亮平、朱瑞和王智涛等同志，他们是刚从国民党区来到苏区的。在红军学校我呆了整整一年，参加训练了第三批学员。

也是在红军学校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我那时才二十多岁，很年轻，毛主席已三十多岁，长我们十多岁，按当时的眼光，他已经是长辈了。有一次毛主席到红军学校讲话，我回忆讲话的内容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记得他在讲帝国主义侵入，造成中国手工业经济破产时，举了个例子说：中国过去的木盆都用竹子箍，现在从外国来了铁丝，中国

的竹箍只得取消，竹箍工人就失业了。他的讲话有许多这样深入浅出的比喻，因而明白易懂。他在中国旧社会里受过锻炼，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对他是非常敬仰的。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底到苏区以后，也向干部讲过话。他讲话时不要提纲，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半天。他知识渊博，通晓英文、日文、法文和德文，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经历过大革命，经验丰富，我对他也是肃然起敬的。朱总司令那时在前方指挥作战，但是康克清同志在后方学习，有时住在红军学校，所以朱总也常来红军学校，我们常常见到他。

### 在模范团和红三师

一九三三年春，红军学校第四期时，我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动。中央成立了一个模范团，从各部队抽调优秀战士来训练，培训为部队的基层干部。团长是原来的红七军军长龚楚，当时很有名，调他来当团长，可见对模范团的重视。我被任命为这个团的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是庄田，他原来叫庄振凤，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海南岛坚持斗争，后来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现在当顾问了。我们的部队驻在瑞金南边四十里外的武阳围。训练的内容军、政都有。训练期间，中央组织了清流作战，由叶剑英同志统一指挥，独立师和我们模范团参加了战斗。这次作战是配合主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钳制行动。我团一个营打到敌人阵地前一百米左右，再也攻不上去了。敌人火力很强，我

们那个营趴在地上，不断向后面要求增援，我们觉得如果增援只会增加伤亡，就将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同志。他看到从早上打到中午，局势已经很明显，不能再打下去了，就命令部队坚守原有阵地，等到黄昏时，开始有计划有掩护地撤退下来，回到汀州休整。

又过了一个季度，一九三三年春夏之交，部队又进行整编，以模范团为基干，调来两个独立师，各整编为一个团，这样一共三个团，成立为第三师。龚楚还当团长，周昆为师长，我调任师政委，庄田当政治部主任。当时十九路军驻守在苏区边沿的三个点是连城、朋口和新泉。我们研究了情况，向军委报告，建议在三点之中拔除中间的朋口。当时侦察到的情况说朋口敌人只有一个团兵力，军委同意了。我们先派一个团进攻，战斗展开后，部队上去同敌人一接触，发现敌人已占据了朋口外的山头，构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火力很强，工事火力配合很好。许多情况事先没有侦察清楚，事实证明守敌不是一个普通团，而是个加强团。我们部队又没有炮，解决不了山上的工事，朋口镇虽然不大，我们却打不进去。虽然我当时作战经验不多，打了大半天，我和师长研究，认为我们开始对敌情判断不准确，打了个盲目仗，再这么盲目干不行，不能继续打了，便留下少数人监视敌人，其余部队黄昏时开始撤退。敌人也不敢出击，我们部队的伤亡不大，撤到根据地内休息整顿。



## 从汀连分区到红军学校

一九三三年盛夏时，我的工作又调动了。那时调动很频繁，接到命令到汀(州)连(城)分区当司令员，原司令员李韶九同志据说调到赣东北去工作了。汀连军分区的机构很简单：司令部就是两个参谋，一个文书；政治部有一个主任加两个干事，一个管党的工作，一个管青年团；还有一个管理科长、两个管理员，加一个通信班和一个警卫班，指挥着一个独立师和不到一百人的一支游击队。独立师拉的是师的架子，其实人很少，组织很松散。我把他们整编为四个充实的连队，独立师名称不改，由师部直接指挥四个连，这样就比较有战斗力了。我亲自带着独立师向连城方向侦察，到达汀州，连城中间的一个小镇叫童坊，是赤白交界处。老百姓中的多数人逃跑了，留下的人很少，又非常之穷，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从童坊到连城中间隔着一座标高一千几百公尺的虎虻岭(当地叫“虎麻砾”)，我派部队向前侦察，并亲自用望远镜观察，看到敌人利用山地做了大量工事，防守严密，我们部队无法通过敌人的防线，很难继续向连城前进，呆下去又没有粮食，不得不撤到有粮食的后方，部队在那里整训和监视敌人。我带几个人到汀州，派出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游击队，深入到清流、宁化一带白区去打土豪，希望能够筹点款。游击队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勇敢大胆地深入白区，但是只弄来一点有限的钱，出去了三次，除了自己维持生活以外，别的就提供不出什么来，不能有大的作为。

当时，福建军区司令员是周子昆，政委是谭震林，司令部驻在汀州南面四十里的河田。我曾就我们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方案，去军区请示汇报。可是那时由于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已经在苏区贯彻，通过所谓反“罗明路线”打击了许多干部，福建的同志受害最重，军区的处境也异常困难，工作很难开展，在那种不正常的气氛下，也很难对我们提出什么明确有效的指示。

几个月后，军委下命令调我回红军学校。离任之时，我一直有一种自责的心情，至今提起也还感到惭愧。我在汀连分区的几个月，没有迅速打开工作局面，也算是失职吧，当然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没有讲的必要了。后来接替我工作的周碧泉同志也没有能打开局面，这说明大局决定了小局，小局改变不了大局。这时红军学校已办到第五期，有一个团部队，还有一个政治大队，训练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任命我为红军学校第五期的团政委，可见党还是信任我的。团长钟伟剑，他是黄埔学生，老党员，进苏区以前曾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我在那里主要教政治课，也向政治大队讲课，主要讲中国革命问题，中心内容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时觉得自己很行，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其实理论修养很差，但是当时没有人，只好再次滥竽充数，只是尽了自己之所能，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工作。

在红军学校工作期间，我又和刘伯承同志共事相当长时间，他也曾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就认识他。当时他在南昌起义部

队失败后，来到苏联莫斯科陆军大学。我在步校时每月有三十卢布津贴，我不抽烟，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国饭馆，也就在那里碰到刘伯承同志几次。记得我们那时特别爱吃辣子鸡丁、炒肉片，都是中国风味。开饭馆的中国人真有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到农村去搞到鸡、肉、蛋和大米。我们在饭馆认识了刘伯承同志，他比我大十五岁，我们知道他早已是川军的将领，是把他当作长辈看待的。到苏区红军学校时，我们直接接触不少。他对工作抓得很紧，亲自听取每个连队和各个部门的汇报，态度严肃，一丝不苟，把汇报的问题一一记下，然后做结论，什么问题该怎样解决，有条不紊。他又特别好学，当校长时比我们还用功。军阀内战时他有一只眼睛被打坏了，但是身体健康得很。他对我国的军队建设是作出了特殊贡献的，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都是由他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参加过校订工作。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等等，也都由他定的。他把过去旧军队称呼的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称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伙伕改为炊事员，马伕改为饲养员，挑伕改为运输员，把旧军队的一套称呼全改了，直到现在用的一套都是当初由他定下来的，这对我军建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解放后军事学院曾经批判他的“军事教条主义”，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实际上他对我军建设确是有重大贡献的。



## 六、为李德作翻译

(1933.10—1935.1)

### 李德到苏区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在红军学校第五期任团政委。正当这一期快毕业时，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通知红军学校，说要调动我的工作，这次调动去的地方是秘密的，去了以后还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那时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调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不问职务高低，说走就走，几乎听不到有讲价钱的事。我得到调动的通知后，二话没说，马上就把背包一打，几件衬衣一夹，反正一个人简单得很，很快到军委找刘伯承同志报了到。

刘总参谋长告诉我，共产国际派到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到了瑞金。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作翻译。刘总参谋长鼓励说我的俄文比较好，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他对工作又作了具体的交待，在保密问题上当时说得很严格，其实以后要求并没有那么严。当地军民群众都知道李德，我们也可以和别人接触。刘伯承同志向我交待后，又亲自领我和李德见了面，为我作了引见和介绍。这时李德已换上了我们的红军服装，样子很严肃。因此开始对他还是很尊敬的。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帮助我们革命，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听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他当过兵和军士，有作战经验，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在学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又官运亨通，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一九三二年秋，李德到达上海，当时我党临时中央还在上海。他在那里大体先了解了我国和苏区的情况，经常和他接触的是博古和张闻天等同志，他们都是苏联回来的，可以直接用俄语同李德交谈，不用翻译。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也在同年十月，被秘密护送到中央苏区。据说，他进苏区时是拿着德国护照，作为旅行者从上海乘船到汕头又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白区边沿地带，由我党秘密联络点弄了条小船，利用夜晚划到苏区边缘，上岸后让他装成病人躺着，再用手巾捂住他的高鼻子，以免外人看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接到了瑞金。

后来有人说，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另外还有一名总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经说，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一

直把李德当作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看待。

我到李德处工作后不久，中央又调来王智涛同志作李德的军事翻译。凡是李德为红军干部讲军事课时，都由王智涛同志担任翻译，我则负责作战方面的翻译。王智涛同志在二十年代，同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共过事，他的俄文也很好，我们互相也比较熟悉和了解。

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他大权在手，刚来到就处理了一个问题。敌人围剿开始时，肖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七十来人的警卫连，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肖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了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要对肖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他五年徒刑。

肖劲光是位老同志，曾两次去苏联：一九二一年与刘少奇同志同去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被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之一的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回国后又屡建战功，这次却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处分。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正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将肖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保护了他。

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很简单粗暴的。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还相当尊重，生活上对他也很照顾，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



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那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地图，东首一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首一间是我和王智涛同志的住处。警卫员叫黄英夫，还配备了炊事员、饲养员等。此处“独立房子”位于军委驻地沙州坝附近二华里处，前门对着总政治部的小村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有田间小路可通。“独立房子”离党中央、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李德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同警卫员、我或王智涛同志一起纵马出游。有时还打打扑克作为娱乐，常参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涛同志外，还有博古，他同李德特别亲近。当时根据地的经济不富裕，尤其是党政机关的生活，比野战部队和群众更艰苦。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只有十四两粮食（一斤为十六两），分成两顿吃，用小草袋装着，一人一小包，等于现在三两多，管你饭量大小，都是这么多，根本吃不饱，吃菜不仅没有油，常常连盐都没有，只能把青菜沤酸了用白水煮了吃。但是组织上对李德却额外照顾，他的吃穿都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四局（即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到长征时，组织上还给他一人配了两匹骡子，一匹给他骑，一匹专门为他驮东西。

### 李德是怎样“指挥”的？

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

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军委去参加会议。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密切。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但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

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的这种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都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都是按李德那一套进行的，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等，完全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西克特等人策划下，吸取了他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企图逐步蚕食苏区，最后吃掉我们。部队每推进一步，马上筑好堡垒驻守，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往前推进三、五公里，再停下构筑堡垒，就这样一步一步向我逼近，迫使苏区一点一点缩小。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建议，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的福建事变时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以粉



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按照这个打法，本来可以甩开正面敌人，从侧后打击蒋军。但是王明的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仍然坚持李德的打法，反对游击战，硬打正规战。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指挥下，部队只得同正面的强大敌人硬顶。当时发生的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事件，更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有一回李德曾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那时，我们本来应该将部队向闽北开动，威胁蒋介石的侧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蒋介石围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却反而指挥红军向西去，不打蒋介石的侧后，不支援蔡廷锴，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反转过来集中了全部力量向中央苏区进攻，使红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高虎垅，利用有利地形打了个胜仗。这次战斗是三军团彭德怀同志指挥的，打得很顽强，给了敌人很大打击。当时曾把这次战斗当成胜利的例子广为宣扬，文艺工作者还编了支歌子，唱着“高虎垅战斗，我们胜利了！”但是局部的胜利改变不了整个的不利形势，当时进行的广昌战斗，却没有成功。战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经到前线视察，战斗失利后，彭德怀同志见到李德，对他的瞎指挥很不满，当面说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说李德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又痛斥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我开始没听

清，杨尚昆同志给解释了一下，我才弄明白这是一句湖南俗语，批评李德造成了红军的不应有损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李德听了，他大为恼火，连声骂彭老总总是封建脑筋，但是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也只得听着。

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不一样。李德到一军团时，林彪专门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请李德讲课，李德特为讲了“短促突击”。他讲完后，林彪马上说李德讲了很好的一课，大家要很好的学习、研究和贯彻，以后他又亲自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深得李德赏识。不过我当时对林彪的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善于打运动战，而彭德怀同志善于打阵地战。事实上中央当时也是这么使用这两个军团的。高虎垌的阵地战，在福建沙县的攻城作战就是彭总指挥的。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李德被免职无权了，他还是对林彪有兴趣，主动要求随一军团行动，只是林彪已不大接近他了。

## 长 征 的 准 备

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眼看苏区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坏。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

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苏区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又为错误路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当时苏区有个小兵工厂，能自己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在试验新造出的手榴弹时，李德曾经和我一起去看试验，好的手榴弹炸得很碎，杀伤力大，有的一崩两半，就没有威力了。后来转移时这些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甚至还有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只有军粮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法带，别的东西都想带走。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原根据地，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

大转移——也就是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还有个三十四师。为了转移，又成立了一个中央机关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由邓发同志任司令员，董老、徐老等老同志都编入了中央纵队行动。整个部队我记得共约八万多人，号称十万大军。

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



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但是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不仅根本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零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从这一方面看，毛主席的作用和历史性的功绩确是伟大的。

## 长 征 初 期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了。这个日子很好记，出发的日期我的印象是十日，正是“双十节”。那时我们和警卫员等养了几只小鸭子，它们天天钻在“独立房子”周围的水稻田里，吃的是青蛙，长得特别快。出发的前几天，我们就赶紧吃鸭子，总部出动的那一天，还吃了最后的一只。在此同时，驻扎在江西零都

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的红军部队，也先后分别出动。所以，这些地方和瑞金一样，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长征开始的时间，则从军委总部出发的日子算起。

出发以后，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真是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象叫化子打狗似的，边打边走。这样好不容易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部队处处挨打，损伤惨重，大的笨重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只好把千辛万苦从苏区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机、蓄电池和X光机、印刷机和几门小山炮等等，都忍痛埋掉了。有的运输员来的时候思想上就是不大通的，这时就把东西一扔自动跑回家去了。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过湘江以后只剩了三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那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狼狈相，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子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

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打散拖垮了。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找来，将他痛骂了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给带垮了，把老婆倒带着。实际情况是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同志，红军长征时本来让她留在苏区，她不愿留下，自己拚着命跟部队走，丈夫又顾不了她，吃了许多苦。可是李德却为此大训她的丈夫周子昆，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军覆灭之灾。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部队就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接着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这已经是毛主席的思想在起作用了，具体指挥的则是周恩来同志。



这是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以前的情况。这个期间，我们每日接触李德，不断领教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心情很不愉快。有一次我对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作翻译工作的。”事实也是如此，他经常训斥甚至辱骂干部，很不讲理。上自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下到我们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他几乎没有一个瞧得起的，有一回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我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给他照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懂俄语，事后他对我说：“你是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有翻译。”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利于团结的话我照样翻译，凡是李德骂人的话，我就不给他照原话全翻出来，何必让这些同志多受他的气呢？(未完，待续。)

#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

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存在不久,于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解散。现在,很多人对它已经不清楚了,深知其错误影响的,只有一九二五年以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学习的留苏学生。现在在世的,据我所知有:邓小平、傅钟、乌兰夫、伍修权、吴亮平、李培之、孙冶方(以上中大)和刘鼎(东大)等几个人了。

现在看来,旅莫支部有两个最重要的错误倾向。这两个倾向在我们党内很久没有消除,所以党史上值得一提。第一是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旅莫支部非但不督促在校学生党员安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且把用功研读马列的党员都视为“学院派”。旅莫支部领导更反对学俄文,认为我们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去要做革命实际工作,学俄文是学者们或“学院派”的任务。一九四一年,华中局派我去党校工作之前,少奇同志亲自和我谈了一次话。他特别交代过,讲课时只能照马列著作讲,如果要联系中国革命实践作什么发挥,必须向华中局请示。我在华中党校教马列主义的时候,讲到俄国党史上也有一种否定理论重要

性的经验主义派，因此联想到旅莫支部这种经验主义错误倾向，是不是反映了陈独秀领导中国党时的思想倾向。于是我写一封信向少奇同志请示。少奇同志写了《答宋亮同志》（当时我用宋亮名字），对我的意见作了肯定的答复。（《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编者注。）华东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初版曾把我的信作为附录编进去。四十年以前我的记忆力比现在好，在我的那封信里对旅莫支部的错误倾向可能有详细的描述。

旅莫支部另一个错误倾向是，家长制作风和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谈思想政治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并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内容就是互相揭发。记得在旅莫支部成立之初，发过一个叫做“军事训练”的计划或提纲。这个“军事训练”的内容，除了早晨上早操和上下午几节课以外，就是过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其内容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现在也提倡的好作风，也是某些党员所缺乏的。可惜的是旅莫支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内容全是生活琐事。例如某同学吃饭把面包皮丢了不吃，影响不好；某同志课间休息时蹦蹦跳跳不严肃等等。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个群众造反组织也搞这种生活细节的互相揭发和打小报告。周总理说这是从莫斯科传来的，他指的不是联共而是指旅莫支部。

旅莫支部先在东大成立。一九二五年中大开办后也成立了旅莫支部。这是从西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学来的。旅莫支部对第三国际和联共没有正式联



系，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开的，但不是不知道，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中国党员的党籍联共也不承认，认为中国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也无不可。后来发现中国学生在课余复习时很不用功，特别是不学俄文，例如我在旅莫支部统治的半年时间，就没有学俄文。但会议很多，生活很紧张，有的在小组会上挨了批评的同志往往垂头丧气，甚至有哭泣的、不吃饭的。学校的苏联领导人在了解情况以后，大概经过向联共和第三国际的请示报告之后，就下令解散了旅莫支部。中大的中共党员不论是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新党员或老党员，甚至象俞秀松这样中共发起人，都成了苏共中大支部的一个分支部的候补党员，都只发给了一张苏共候补党员证。可见斯大林时期的联共就把中共看作是低一等的党，是“儿子党”。当时解散旅莫支部的理由，除了批评旅莫支部不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错误以外，还根据第三国际的一条组织原则：凡是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就参加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和所在国的工人运动，不得另外成立小组织。这条原则好象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代就成文地或不成文地存在的。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或许除旅莫支部的少数领导人以外）听了学校苏联领导人的报告，特别是听了对旅莫支部轻视学习马列理论的批评以后，都同意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从此我们就努力学习马列理论，学俄文。我们中大第一期学生，绝大多数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前后到校的，大概在十二月开学。一九二七年暑假毕业（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如小平同

志等，因国内工作需要，没有等毕业就提前回国)。实际只有一年半时间，其中又被旅莫支部耽误了半年左右，真正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

末了，补充说一下旅莫支部的领导组织。这是一个三人小组。其中一人就是任卓宣，即后来成了叛徒的叶青。他负责领导中大旅莫支部。另两人，一个好象叫刘伯坚，他回国后好象是先在白区工作，后来到了根据地，很早就去世了。一人好象姓王，广东人，好象是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只知道他就义时很英勇。他二人负责领导东大旅莫支部。他们大概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就到苏联学习了。关于他们二人的情况，三机部刘鼎同志应该比较清楚，因他当时也参加中大工作。任卓宣同我们中大第一期大多数同学一样，是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的，他也是没有毕业就提前回国的。他们三人都是转到苏联学习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关于中大旅莫支部情况，我记忆不全，甚至有记错的，请伍修权、吴亮平同志补充。

旅莫支部存在时间很短，取消以后也不曾有什么后遗症。但这种轻视理论学习和不重视思想政治修养，而纠缠个人生活细节的风气，正如少奇同志所说，中国党自陈独秀时期起曾长期存在过。但旅莫支部把这种偏向发展到了极端，成了一种典型，所以很值得注意。

# 一九三五年前后 北方局的情况

高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上海党组织被破坏，敌人到处抓人，我们在上海呆不住了。这年的九、十月间，党组织通知我转移到河北省委（在天津），我们全家来到天津。

当时，北方局也在天津，书记是孔原同志，他是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他管辖的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北、东北、绥远等地。孔原同志有一个班子，我记得有罗根（中央派来的，负责职工工作，现在广东，已七十多岁），毕根（负责青年工作，现在天津搞计划工作），小莲（柯庆施爱人），还有姚蓬子（姚文元父亲），我到天津时，姚已被捕。

我到天津后，经王林同志联系，见到了孔原同志，他让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河北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同志，成员有聂洪钧（由上海来），王林（省委秘书，负责跟外地联系，现电力部副部长），大莲（王林爱人），鲁笨（现民政部政治部主任，安建平同志爱人）等同志。

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孔原同志拟定朱理治同志去陕北。朱收集情况，写出了《目前的形势》等文件



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春节后）到了陕北。朱走后，我就接替了他，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职务。不久，聂洪钧同志也去了陕北。这年三月，河北省主要成员又增进了柯庆施、李大章两同志。

那时，河北省党的力量是很强的，共有一千多名党员。党的主要干部大都是由保定师范和濮阳师范出来的学生。党组织的建设也比较严密。省委下设许多特委（相当现在的地区）。我记得有北京市委，天津市委，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现司法部副部长；组织部长李一夫，现外贸部顾问），冀南特委（书记刘子厚），冀中特委（书记已忘记），沧州特委（书记王任重），盐区特委（书记张霖之），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现农机部顾问），鲁西特委（由冠县县委发展而来的，书记黎玉兼任），石家庄特委（书记是王从吾的侄子王作玉，组织部长郭森，现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一位姓杨的），还有白洋淀特委，后来发展为保定特委（书记已忘记）。各特委下边一般都设了县委，没设县委的也有县支部。有的特委还按片设立了中心县委（管辖几个县）。

这些特委中，黎玉同志领导的冀鲁豫边区特委管辖的范围最广，组织基础也比较好。陈少敏大姐是这个特委的组织部长，王从吾是这个特委的宣传部长。他们俩以“假夫妻”的身份进行工作。王从吾负责的滑县（书记赵毅敏，现中纪委副书记）和磁县（书记王维纲，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组织基础最好，有一套对敌斗争经验。王维纲曾被捕过，他从几层楼上跳到停放汽车的棚子上，逃了出来。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调孔原同志去上海。孔原同志的爱人张越霞同志在孔原走以前去了上海，不久就被捕了。

孔原同志临走前，把我、柯庆施、李大章、王林、罗根找到一起，商议他走以后北方局的工作如何安排。他提出个方案：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当时叫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指导北方局所属地区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决定我、柯庆施、李大章三同志为主要负责人。

孔原同志交待完了工作，并写出了《关于北方局的情况》等文件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离开天津。他走以后。我们三人分了工：我是书记，负责农村工作，主管河北省的工作和冀中、冀南、冀鲁豫、鲁西等特委；柯庆施负责军事、组织工作，主管冀东特委和北平市委（市委书记赵升阳，即李葆华同志）；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和联系外地的工作，主管山东、山西和天津工作，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工作的还有彭真同志、王鹤寿同志等。

孔原同志走后，他跟我们没有领导关系了。我们跟中央就失掉联系，发生了经费困难的问题。跟中央失去联系的广东、广西等地的党组织，也跑到北方局来联系经费问题。那年正是华北大旱。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一方面派鲁笨同志去陕北，通过朱理治同志跟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紧缩机关，下乡斗地主，搞粮食，并由王林、赵升阳同志在北平、天津发起募捐，但经费仍然很紧张。我爱人贾

琏同志当时在省委负责经济工作，眼看着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一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五十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林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五十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这孩子卖给了王林哥哥的一个同事的姐姐。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国民党旅长，讨了小老婆就不要她了。她买了我的男孩，还买了个女孩。解放后，王林同志帮我找过，据说这孩子十三岁时得病死了，那女人和女孩也死了。后来我也找河北省公安厅帮忙查找过，他们也说孩子已死了。如果这孩子还在的话，已四十五岁。

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冀东二十二个县伪化，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天津的学生纷纷起来反对，还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长是李昌（当时不是党员，现在科学院）。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学生、教员、教授等知识分子。

那时，各特委的对敌斗争也很激烈。就拿盐区特委来说吧，盐区的盐民都是私自熬盐。国民党政府有个“盐税团”，经常敲诈勒索，欺压剥削盐民。我们派张霖之同志去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部分武装，有一百多支枪，跟



“盐税团”展开了斗争。

鲁笨同志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去陕北的。鲁笨跟朱理治是老乡，都是陕北人。鲁笨很快就找到陕北特委朱理治等人。当时，党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到今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进入陕北。毛主席批评了朱理治（书记）、聂洪钧（负责保卫工作）等同志搞的“肃反”扩大化。那时，我们北方局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北方党组织受我们的影响很大。据说，陕北的肃反扩大化把地方的同志整得很厉害，关押了刘志丹等二百多同志，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毛主席为了纠正北方局的左倾路线，派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少奇同志是一九三六年四月来天津的。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批评了“一二·九”运动后期发生的“三·三一”事件（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抬棺游行”）。

少奇同志来北方局以后，纠正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端正了北方党组织的思想。少奇同志重新组建了北方局，书记是少奇同志，组织部长是彭真同志，宣传部长是陈伯达，秘书长林枫同志。还有王鹤寿同志。

#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刘培植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神圣的中华国土，东北三省沦陷。国民党蒋介石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疯狂“围剿”我工农红军，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高双城的二十二军、高桂滋的十七军、邓宝珊的新一军、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从北面来；马家军从西面来；阎锡山所属陈长捷的六十一军，王定国的十九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赵承绶的骑兵军从东面来；西北军从西南面来，形成包围圈。当时的东北军是奉命参加围剿的主力军，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的就有七个师，分两路进攻，气焰嚣张。我红十五军团声东击西，突然围攻甘泉守敌，调动延安的东北军出来增援，使援敌在劳山中我埋伏，一举全歼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俘敌三千七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甘泉境内的榆林桥，又消灭了一〇七师的四个营，团长高

福源被俘。这个团是一〇七师的主力，团长高福源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的营长。打了这两次胜仗后不久，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十五军团会师，联合作战，又在直罗镇和黑水寺消灭了东北军的一〇九师，打死师长牛元峰，并击溃了一〇六师。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陕甘苏区奠定了基础，使东北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东北军虽然在政治上有过反动的历史，在鄂豫皖苏区“围剿”过红军，之后又尾追北上红军，充当蒋介石对陕北红军实行第三次“围剿”的急先锋。但是，东北军是“杂牌军”，深受歧视，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更主要的是东北军的官兵多系东北人，“九一八”以后流亡关内，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因而有争取东北军和我们共同抗日的可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挫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我们党决定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

## 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兼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同志协助工作。

周副主席对于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非常重视，在他的亲



自指导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与此同时，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即“白军军官连”）。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课。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中讲了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博古同志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的形势。邓颖超同志在讲课中，驳斥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同志在讲课中，揭露了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卖国阴谋。学习期间让他们观看了红军和赤卫队的阅兵式。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不歧视他们，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待，在吃的穿的方面他们都比红军官兵要好。通过教育，俘虏军官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对我党我军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他们表示：再不能打共产党了，只有联合才是出路，并纷纷加入“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给他们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到东北军去。东北军骑兵六师十七团被我红军全歼，经教育后，将该团人马枪支全部送还给东北军。对此，蒋介石十分恐惧。被俘团长董道源回到西安后，蒋迫令张学良把董枪杀了。但这也消除不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周副主席、彭总还亲自找高福源（被俘后已成为我党党员）谈话，交给任务，派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重要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周副主席又指示在党的活动分子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秘密派往

东北军的所属部队，做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当时中央和苏区地方党政军都十分重视争取东北军工作，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据我所知，苏区直接间接参加这一工作的有李克农、朱理治、欧阳钦、曹力如、肖劲光、朱瑞、白坚、聂洪钧、潘振武、肖向荣、周桓等领导同志。同时，白区党包括上海党组织、北方局、东工委都作了大量工作，刘澜波、刘鼎、宋黎、苗渤然、高崇民、孙达生、郭维城等同志，都为争取东北军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当时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兼红二十九军政治部工作，也被派去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在争取东北军的过程中，周副主席总是不断地鼓励和指导我们，使我们在环境险恶，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充满信心和勇气。一九三六年春，陕甘晋省委派我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除总书记洛甫同志接谈外，周副主席在军委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张云逸同志也在座。当时军情紧急，敌人包围苏区，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占领我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我们党为了争取东北军，准备有计划地让出一些地方（包括党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在内），让东北军来占领（后来占领瓦窑堡的不是东北军，而是被高双成的二十二军抢占去了），给东北军“立功”留面子的机会，使其好向蒋介石交差。这对于我们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有利的。敌人已经逼近瓦窑堡，中央正准备撤离，周副主席的马也备好鞍，邓大姐在门口等着。周副主席仍然镇定自若，取出地图来挂在墙上，面对地图给我分析敌我形势，

亲自给我部署了三项任务。第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洛河川撤退不算退却逃跑（因洛河川撤退曾引起省委内部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是逃跑，向中央告状），但仍要坚持洛河川的游击战争。第二，省委内部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把二十万东北军争取过来，克服动摇思想；不要以为敌人一进攻，东北军就不可能争取过来了。当时，确实有人因敌军的不断进攻而动摇了争取东北军的信心。周副主席的指示给我们拨开疑云，坚定了信心。周副主席还就如何进一步争取东北军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要我们在苏区周围设立二十个办事处，动员苏区地方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积极主动地有计划地做工作。如：不失时机地组织火线喊话，与东北军交朋友、认老乡，建立感情。

我曾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在两军对峙的战场上，通过喊话，使局部地区的东北军部队停止了向我们的进攻。利用东北军的俘虏喊话，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周副主席派我去甘泉城内，做东北军一〇七师刘翰东师长的的工作，打通了关系，获得了成功。该师在榆林桥被红军消灭一个团另一个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军心涣散，不敢再轻举妄动。广大官兵响应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由下而上地推动上层人物转变思想，改变了对我的敌对态度。刘翰东师是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不主动进攻我们，我们出入白区还给予方便。我几次都从甘泉师部和哨兵阵地穿过，并经常使用他们的汽车送人和运送大批军用物资。



接着，我被派到郿县东北军一二九师做周福成师长的工作。此人顽固不化，扣押我一个星期，没做出有效成果。紧接着，我又被派去洛川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中将和一〇五师（军的编制，后改为四十九军）师长刘多荃中将的工作。刘多荃代表王以哲在洛川县飞机场秘密接见我，答应了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停止对红军进攻，万一进攻枪口朝天上放；二是万一蒋介石命令要进攻时，进攻前要先通消息；三是互派代表来往，建立联系，苏区被封锁，物资困难，设法替红军从西安购买补给一批军用物资。条件谈妥后，刘多荃当夜派特务连长用大卡车从洛川护送我回苏区。我立即向陕甘省委和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因完成了任务他很高兴。我回到苏区后不久，王以哲、刘多荃信守诺言，在敌人封锁特严的情况下，从西安给我军买运了四十辆大卡车的军用物资，为我红军解决了全军冬装困难问题。我深深感到，周副主席对东北军兵运工作的指导既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掌握斗争大方向，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同时又能洞察入微，细致周到，令人惊叹不已！

兵运工作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众目睽睽，极其艰苦困难，甚至有牺牲的危险。我在五十一军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公开的身份是该军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的传令兵。因军官身份不便掩护，传令兵很自由，可以到处与党组织联系，并且安全。我随身挂着“小黄包”，党的文件也装在里边，坐火车不要票，过关口不受检查。有一次，我去开党的会，两天未回来，传达长得知后很愤怒，以不请

假外出问罪，罚我下跪，当着官兵的面，狠狠打我五十军棍，打得我疼痛难忍，皮开肉绽。团长贾陶（党员）看到我遭毒打，又不便阻止，十分难过。事后，他含着眼泪对我说：“你受苦了，我无能，对不起你”。我安慰他说：“这不怨你，不要难过，挨打也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公开场合贾陶是我的上级，背地里我是他的上级。

一九三六年春，周副主席派我去洛川进一步做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和几个旅长的工作。临行前，我化装成军官，换上东北军军服，佩上“67A”臂章“107D”胸章，去到一〇五师（张学良的卫队师）。我持周副主席的信到师部，一位副官长接见了。我当时不熟悉国民党军队里下级见长官的礼节，见副官长没有立正，引起怀疑。他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从头到脚打量我，并当即撕开信一看，大声吼叫说：“你是共匪代表。”我亮明身份。敌副官长暗中通知政训处主任密报蒋介石。这时王以哲、刘多荃不敢接见我。我被看押起来。先关在洛川城的一家布店里，后转移到飞机场附近，情况紧张，我下决心同他们作斗争。在扣压期间（二十一天），几个敌旅长威胁我，放肆地攻击苏联和我们党，我严词反驳。敌旅长高云鹏说：“你们共产党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说：“这是你们的老调！苏区的房子被烧，军民被杀，杀人放火的不正是你们吗？共产党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你们刮国民党实行多妻制，蒋鼎文不就有九个小老婆吗？”他们的舌战失败了，进而以死相威胁：“枪毙你怕不怕？”我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来得光明正大，死了光荣。”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秘密关押。这

时也有秘密来看我，表示同情我党主张的人，如王甲昌。敌连长武文祥、排长唐玉峰、葛宜芳、丁毅等四人负责看守着我，防我逃跑和别人接近。三个排长朝夕看守，正是我做工作的好机会，我给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一天夜里，三个排长悄悄地要保护我逃跑，我谢绝说：“来得光明，去得正大，死了光荣，我不能逃走，我不能给红军丢脸。万一我在这里牺牲了，请你们给红军捎个信。”不料，这几句话使这三位排长大受感动，他们向我郑重地提出入党要求（以后经过培养考察，这三位排长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了我们的党）。一天半夜三更，看守连长突然叫起我来，说是要请我吃饭。按照旧社会的习惯，杀人前吃一顿“禄粮”是断头的信号。我气愤地说：“要杀便杀，别来这一套，不要糟塌人民的粮食。”连长笑道：“你别介意，没别的意思，今夜师长要见你。”原来如此！师长总算知道我在这里。刘多荃师长来到飞机场看押我的地方，一见面就歉然道：“刘老弟，对不起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被扣，不是王以哲和刘多荃的本意，因为副官长被国民党收买了，他通知政训处主任，并密告蒋介石。蒋下令枪毙我。张学良知道后，一面对上级说已把我枪毙了，一面暗中营救，给王以哲、刘多荃打电报说：“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则因小失大。”我当夜脱离虎口，到甘泉见到了敌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他很友好地对我说：“你在洛川遇难，消息不好打听，现在回来了就放心了，我好向红军交代。”



## 深入作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夏秋间，正当我东征红军胜利回师，西进甘、宁，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会合之计，卖国贼蒋介石飞抵西安，下了消灭我军的反动命令，并要把东北军全部从陕北苏区南撤，开往甘、宁省境以南，阻拦我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由于形势的变化，周副主席指令我随东北军六十七军和一〇五师南下，然后再去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当中央的联络员。

我刚出苏区，在甘泉县的城门附近，碰上叛徒李金堂。李表面上应付我，然后狗一样尾随着我，一同进城时，叛徒给城门口的卫兵使了个眼色，通风报信去了。进城后，找不到躲藏的地方，我就藏在一位老妈妈家的磨盘后面，销毁了我带的党内文件。入夜，全城戒严。半夜，敌营长武敬三带许多敌兵破门而入，当即把我捆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一〇五师情报队的。敌人不信，咬定我是“共匪”。我要求打电话给刘师长，问一问有没有我这个人，敌人撒谎说：“电话线断了”。我说：“电话线断了，我的命也断了，随你们的便吧！”随后搜身，搜出我在日记本上写的两句骂蒋介石的话：“要抗日必须反蒋，不反蒋抗日不能胜利。”敌人审问，我坚持不招认真情，说这是我去苏区侦察时用的护身符，万一抓住了好脱身。敌人不信，因为叛徒李金堂在身边，我的身份暴露了。敌人把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以死来威胁。一直关了十几天也未从我嘴里

掏出什么口供。

一天，敌旅长高鹏云出现了。他和三旅从延安开拔路过甘泉县来见我，此人与我打过交道。一见面就开玩笑说：“小共匪又来了！你什么任务？”我说：“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要实现西北大联合，一起抗日，望你认清形势。”高鹏云摇摇头，将信将疑，不表什么态，最后说：“刘老弟，给你一匹马，一同行军到洛川县军部再向甘、宁进军！”我飞马去洛川见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但王军长当时有些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以为红军真的不行了，可能被“一网打尽”，所以态度动摇，对建立统一战线信心不足。对此，我给他做工作，要他们相信红军是有力量的，不可战胜的，要坚定西北大联合的信心，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尽管王以哲动摇不定，但对红军仍持友好态度。他和刘多荃认为有人已知道我是红军，和他们一起行军不便，目标太大，先派车送我去西安他们的办事处，等他们到平凉驻防后再电告我去。

在西安，我住在西安市南广济街门牌45号一〇五师的印刷所。这时，我常和所里的印刷工人接触谈心，宣传抗日。印刷所负责人是个军需官，叫颜广汉。他发觉我常和工人接触，对我很反感，于是，我转移到远东大旅社住，因为找不到组织关系，又没钱，两天多没吃一顿饭，幸好在西安街头巧遇朱理治同志。我们秘密地去珍珠泉洗澡吃饭，朱理治把他身上仅有的三块钱给了我，我用它度日，每天只吃一块“锅盔”。好不容易才盼到刘多荃来电报，要我去平凉他们的军、师部，并安排我坐政训处的

车。车过彬州，突然车翻人伤，许多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趁此机会从地上拾到一枚政训员的证章，以备不时之需。

到平凉后，我住在恒顺成大布店，见到了刘多荃，向他宣传西北大联合的趋势，劝他识时务。第二天，我去七团团部见王甲昌，此人原是一〇五师的一个营长，我在洛川被捕时他来看过我，表示进步。在西安时朱理治同志说王甲昌表现不错，可以入党，因此我去找他，作他的工作。见面时，王开始还应付我，桌上摆着鲜桃要我吃。我试探性地和他谈话：“王团长，祝贺你高升了！我在洛川被扣押时感谢你的同情关切。”不料我的话引起他的恐慌，马上翻脸，严声厉色地说：“刘先生，你来干什么？你来对我的地位有影响。”我也马上改变态度：“我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又不抢你团长的饭碗。”王甲昌翻脸嚷道：“你是共匪！”我镇定而严厉地回敬他说：“现在红军三个方面军几十万人要大会合，东北军和我们关系很好，你不要破坏团结。”他继续狂叫。我说：“别吓唬人。”王甲昌想拿我请功，叫来两个政训员和一个排长带两个士兵将我捆绑，进行搜身，搜出政训处的证章。政训员厉害起来：“你不是政训处的人，证章是从那里来的？你偷证章，要搞什么鬼？”王甲昌立即要把我解往政训处。从平凉东关一直走到西关，约五里路，我以为要暗杀我，心里着急，因为周副主席要我去彭总身边工作，现在还未见到彭总怎么就可以这样牺牲呢！于是，急中生智，我站住不走，对押送的人说：“我是一〇五师情报队的，要去师部。”他不让，我说恒顺成大布



店就是我们的机关，他信以为真。进大布店后，由情报班的负责人高某证明说：“刘先生是我们师长的朋友，你们要干什么？”骂了押送的人。押送的人莫名其妙，只好把我放了。后来，刘多荃责怪我说：“刘老弟，你怎么随便去活动我们的人呢？”我否认说：“我在洛川被扣押时他来看过我，今天在路上巧遇，一见面就把我扣起来。”刘多荃还打电话骂了王甲昌……。

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豫旺、固原两县交界处七营子对面的一个土围子里。彭总住在一个窑洞里，土炕上放着门板，这就是彭总睡觉的地方。我来到彭总身边，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亲亲热热。彭总说：“小刘，你就住在我这里！”他亲自为我搭床，让我读中央文件，传达中央如何争取和联络东北军的指示，分配我在政治部工作。我在彭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除继续做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的工作外，还去做敌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骑六师师长白凤翔的工作，并和这些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同志周泽民、王敏球、丁毅等取得联系。

奉彭总指示，我曾去平凉市约请王以哲、刘多荃与固原县骑兵军部的何柱国，同车到豫旺县七营子唐君尧二旅旅部，商量停战事宜。因为马鸿逵的白团两个步兵营被我军团团围困在豫旺堡，马家骑兵也遭到我红军的不断打击，损兵折将。马家兄弟跪在蒋介石面前哭诉，恳求营救解围。蒋介石令东北军（刘多荃指挥）解救，借以考验东北军的行动。当然，东北军感到左右为难，解救么；要与红军打仗，心里不愿意，也打不赢，要损兵折将；不解救

么，又不好向蒋介石交代。抓住这个矛盾心理，我对刘多荃和唐君尧说：“白团我们围住了，但不准备打，马家军我们也要争取，我们围而不打，你们也打不进去。为了给你们留面子，好交差，我们准备让开一条路，你们去把白团接走。”举棋不定的东北军当然高兴，双方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打假仗的君子协定。刘任指挥，我作为红军督战代表在围子上面观战。打仗那天，刘澜波同志也从西安赶来观战。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东北军官兵从上到下都知道是打假仗。我方主动让开去豫旺堡的大路，放敌人出来，让东北军把白团接走。我看见敌炮向右前方彭总住的寨子上射击，立即要刘多荃制止。刘命令转移目标向正前方射击，避实就虚，后来炮弹都落在空地上，当时，还有敌机五架向空地上猛烈扫射。白团走了以后，我们在大路两旁贴标语，送开水，唱歌演戏，夹道欢迎东北军，对东北军表示友好，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和争取工作。事后，西安国民党报瞎吹他们的“战功”，说是消灭了“共匪”多少人，胜利突围，真令人好笑。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坐镇西安，调兵遣将，分五路向我进攻，妄图把红军“一网打尽”。打头的是东北军。我红军总部未及撤退被敌包围，彭总急令我设法阻止敌军前进。我衣服也来不及换就出发了。跑不多远碰上敌人的尖兵，将我抓住，说我是红军探子，乱打耳光。我说不是探子，是一〇五师情报队的。敌人说：“你不是红军的探子，为什么穿红军服？”我说：“红军服是我的护身符，我不穿红军服怎么到红军那边去探听情报？我刚从

苏区刺探军情回来，红军满山遍野都设下了埋伏，赶快往后转，不要冒进”。敌人多次中过红军的埋伏，信以为真，不敢再前进一步。于是停滞了两个多小时，我红军总部得以安全转移。

以后，我回到平凉，住在一〇五师。一天，张学良来电报让刘多荃和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急赴西安，我预料要出什么事情。果然，当天晚上，东北军、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抓起来了。消息传到平凉，军民奔走相告，开庆祝大会。事变的第二天我就赶到西安。但是，匆忙而至，一时找不到组织，饿了好几天肚子，最后只好去到刘多荃的公馆。刘告诉我说，周副主席来西安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多想见到周副主席啊！刘陪我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由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带我见了周副主席。当周副主席知道我在饿饭时，便亲切地慰问我，并指示我参加西安东工委工作。临分手时，他对我说：“没时间细谈，留下地址，晚上有人找你！”当晚，我在远东大旅社静候。十点以后，周副主席派罗瑞卿同志给我送来三十元生活费，并给我介绍组织关系，要我移住西板坊门牌15号黄显声副军长的公馆，同东望小学一位女教师以姐弟关系住机关。我当时的任务是分管总部通讯大队、辎重大队、兵工团、总部电台、军官差遣队等直属单位以及一一五师、一〇五师、抗日先锋队、骑二军、六十七军等单位中党的工作。以后，周副主席和朱理治、刘澜波同志还来看我，并在我住的地方开会。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这一段不寻常的斗争生活，周副主席对



我关怀备至的情景历历在目，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 随东北军东调

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当时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势很好。但是，蒋介石被释放后，蒋伴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并对西北的三位一体采取了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方针。汉奸、托派乘机挑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造谣说红军出卖了东北军。东北军内部，以孙铭久、应德田为首的一批少壮派中下级军官，认为当时代理张学良负责领导东北军的中将军长王以哲等人怀有异心，不积极设法营救张学良而将他们杀死，造成东北军内部的分裂。这时，守潼关的西北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投向国民党中央军，引中央军开进潼关，入驻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一片混乱。中央军从东门进，我乘马占山将军的汽车从西门出，随总部撤到彬州一带，在党的东北军工委领导下加紧进行工作，应付突然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进行限制、歧视、虐待，企图借日本侵略者的屠刀来消灭东北军。三位一体被拆散，西北大联合遭到破坏。形势骤然变坏，对我极为不利。

东北军东调后，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又不得不从公开转入秘密。过去设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撤销了，重新

以军为单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独立作战。工作重点是在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团结友军，抗战到底的教育，改造旧军队，壮大抗战力量。这是西安事变后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和欧阳钦同志到三源县云阳镇红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陕西省委和东北军工作，我把地方党（宜君县委）和东北军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剑英同志。他指示我暂时离开红军部队，随东北军东调去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参加由抗日先锋队改编的一一〇师和五十一军党的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伍石甫、贾陶、解方、王西萍、汪洋、张岗、王再天、徐瑞林等同志。我们遵照组织的指示，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项工作从一九三六年就开始了，如五十一军上自军、师、旅、团，下至营、连，逐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限制我党活动甚严，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五中全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施后，我们开展工作更为困难。在蒙城时，国民党特务瓦解由抗日先锋队改编的一一〇师，拉走了一个连投向国民党。敌人猖狂，许多人在政治上动摇不定，我们发展党员就很不容易，唯恐找错了对象而暴露党的组织。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同志一般都是当兵的，或者职务很低。当兵的发展当官的，下级发展上级，就更困难。为选准发展对象，我们细心地与发展对象接触，注意观察、分析他平时的言论是否有进步

性，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立场是否正确，是否倾向共产党。经过反复观察，确定好对象，再经组织批准，才去“捅窗户纸”。有一次，我们七、八个党员在麦地开党委会，被连长刘明显发现了，我们来不及躲避，虽然表面镇定若常，但心里有些紧张。我们当机立断，决定要末把他突击成党员，要末枪毙了他。他走到我们面前，神色自然，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天热，出来乘凉、散散步。”他笑笑说：“你们是共产党开会。”从他的话音里听得出来对我们不怀恶意，便没有对他采取武力手段，只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们很了解你，你原来是抗日先锋队的，很有爱国思想。”说罢便让他走了。事后，我们注意看他的动态，看他是否向上级告密。经我们调查，他没有告密，这说明他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后来经过教育培养，他被接纳为党员。

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绝对隐蔽，长期埋伏，提倡党员积极争取掌握兵权。党员和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党员间、组织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尽管发展工作很艰难，但由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和广大官兵中的威信很高，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在平时和战时又能起模范作用，使一些发展对象愿意暗中主动靠近我们，往往一拍即合。一一三师六七七团文书周怒涛同志职务并不高，他经常与团长王协一接近，以进步的思想诱导和影响自己的上司，结果王协一成了党员。之后，王协一和另一位同志又把一一三师三十四旅旅长张炳南发展成党员。除高级将领之外，还有一批营长、连长、排长都是相互发展或由战士发展成党员



的。东北军的五个军都分别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三个军即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四十九军建立了工委。党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在各军搞建党工作。我在五十一军任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是王西萍。五十七军党的工作由谷牧、伍志刚、王振乾、郭维城、赵志刚同志负责。在六十七军负责的是郑里坚同志。在四十九军负责的是邹鲁风、杨西光、赵天野同志。在五十三军工作的是吕正操同志。在骑兵二军工作的是周北峰同志。由于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在东北军中发展党员约近千人，其中五十一军发展的党员人数最多（数百名）。当年，五十一军中建立了秘密的组织系统：军一级成立了工委，师一级成立了特委，团一级成立总支，各营成立特支，各连成立支部。担任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伍志刚、张岗、汪洋、李震、范离、曲径、王学明、项鄂、李亚光、阎振兴、孙毅、张和如、张炳南、王协一、韩林英、张玉璞、张彬、张紧、刘放、林千、杨国治、赵久春、李长汉、王琳英、苑金勋、方树栋、于维哲、杨在田、苏恩启、丛芝发、丛树人、张鄂、任永安、毛真、张树华等同志。敌人监视严密，我们的地下工作小心翼翼。在五十七军工作的伍石甫同志以文书身份掩护自己，我是传令兵。我们经常接触，通过各种暗号在传达室、厕所、饭馆、麦地里接头，有时在野地里和海岛（青岛的薛家岛）上开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工委的几位同志（王西萍、王学明、敖北风、伍石甫等）在济南的一家旅馆被捕。我当时在青岛法海寺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旅部掩护，得知

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级党组织隐蔽转移，互相调动，改名换姓，准备口供，进行保卫党的教育。我把党员名单改写成新文字埋在法海寺和尚庙附近，脱下军装，换上平时准备好的一套便衣（长袍、礼帽、皮鞋），去军部掩护，不幸在高密县车站被军警督察处抓住。敌人搜遍我的全身，把鞋底都撕开了。先是没有搜出什么把柄，后来从我的衣角里搜出一个我党中央迎接对日抗战的指示，当即遭到毒打拷问。后来是二四二旅旅长李雨林（东北抗日将军李杜的弟弟）出面，说了好话，才放了我。但是总的说来，由于我们有群众基础，由于东北军官兵同情我们，耳目灵通，因而能化险为夷。五十一军的参谋长解方同志和王再天同志被叛徒告密，国民党要抓他们，军长于学忠知道后，立即告诉他们撤退。一一四师营长于维哲更是热心为我党工作，多次主动为我军送情报，并自己花钱买了十四间半房子，专门给我地下党开会。一九三九年春，我回到延安，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和我长时间谈话，为我们总结这段工作时，肯定过这个成绩。

二是争取东北军积极抗日，坚持抗战。东北军东调以后不到半年抗战就开始了。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韩复榘不抵抗就丢掉了全山东，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要把这支军队变成抗日的军队，使之在思想上愿意抗日，在行动上英勇作战，抗战到底。为此，我们利用合法的形式，在广大官兵中散发宣传品和进步书刊，进行抗战爱国的政治宣传。由吴琨、刘放、黄玉齐等同志负责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在

连、营、团、旅成立抗战室、救亡室和俱乐部。这些政治宣传活动，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官兵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们的抗战决心。表现最为活跃的是一一〇师，这支队伍是抗日先锋总队改编的新军。师长张政坊同情共产党，参谋长赵龙韬很进步，六二八团和六二九团的团长都是党员。这支队伍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官兵团结一致大唱救亡歌曲，走到哪里就宣传到那里，对淮河两岸人民很有影响。国民党蒋介石说这支军队“赤化”了，不给发饷。这也难不了他们，他们就自己打土豪，借钱借粮进行抗日。蒋介石恨之入骨，把这个师解散，分编到五十一军其他各师。蒋介石弄巧成拙，反倒把爱国抗日的种子撒遍全军，更有利于我们在全军开展争取工作。

东北军中有个学兵队，共二百余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地区南下请愿的流亡学生，多系进步爱国的青年。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的大部分成员被发展成共产党员。他们随东北军东调，被分配到各军、师、旅、团、营和连里，由于他们有文化，能说会写，在改造东北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对付政训处的特务，我们派一些同志分别打进去，掌握敌人的活动，使其阴谋破产。张树华同志（五十一军工委的秘密交通）打进政训处后，做了很多工作。他多才多艺，弹拉吹唱样样都会，又善于接近群众。他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与合法的手段，在敌人内部也组织了抗战室，进行政治宣传，并随时送回情报。军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地下党员则利用职务之便，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或方案，影



响军中的当权者，使之作出有利于革命的决定。

东北军在淮河大战、保卫武汉的大别山战斗、台儿庄会战中获胜后，向苏鲁敌后挺进。历次战斗中，我们的党员同志都表现得很勇敢。一九三八年四月，徐州大突围时，国民党指挥无能，部队溃不成军，秩序一片混乱，国民党军官扔下部队不管，自己化装穿便衣跑了。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我们的地下党员挺身而出，一一四师的副旅长贾陶同志、一一三师的旅长张炳南同志出来收容残部约万人，然后集中到河南整训，准备了向敌后挺进的力量。我们在大别山召开了军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向苏鲁敌后挺进，到山东和一一五师会合。我们的党员英勇抗战，以身作则，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在党的影响下，一般说来东北军的抗战是英勇的，不少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向苏鲁敌后挺进时，由我党力量强的一个营掩护全军挺进。日本鬼子两个旅团包围了我们的驻地——大店镇，房子被打平了。日本鬼子密集成环形冲杀过来，该营营长、共产党员张玉璞面对强敌，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我负重伤，突围而出，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

国民党蒋介石对东北军越来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消灭它，这一险恶目的部分地实现了。一九三七年冬天，六十七军（西安事变时和红军关系最好的一个军）在上海抗战失利。蒋介石借机要搞垮这个军，不补给、不增援。该军由于战场上损失惨重，剩余部队过江时不幸全军覆没。四十九军被东调西调，在江西会编缩编后也被吞灭了。在国民党顽固地推行消灭东北军的反动方针

和我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五十七军的一一一师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起义。师长常恩多把他的部队交给八路军，成立了山东滨海军区（解放战争初期改为一纵队）。五十三军的一部分人，在吕正操等同志的领导下，后来成立了冀中军区，坚持了平原抗战。

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我们党还派出一些同志去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其他友军和地方武装，壮大抗日队伍。例如，范离同志去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开辟工作；张何如同志去微山湖开辟根据地；伍志刚、王再天、邹鲁风等同志去高密县争取地方武装头子蔡晋原；我在东北军掩护下建立了宜君县委，并劫狱救出县苏维埃主席，我曾九次被捕被扣，虎口余生，险些丧命。

一九三九年，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凡是在友军中的党组织撤出，不再发展。这时，我已回到延安，在各友军中做工作的同志，潘纪文、韩立中、陈友三、邹大鹏、栗又文、李士原、谢仁杰等同志也陆续回到延安。回延安后通过总结工作，我们与总参谋部会编写出《中国军队概况》、《友军与友军工作》、《兵要地理》，还编写出国民党一百〇二个军和二百四十个师的系统材料，供中央和军委对敌斗争参考。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为争取东北军进行了极其艰苦的工作。争取东北军的成功，对于推动全民族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伟大胜利，也是我党兵运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 关于创办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经过

胡琦 何华生 许明修

四十一年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在延安成立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材的综合性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它没有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抗大和陕公那样历史长、规模大，但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它还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准备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这批骨干现在多数在中央科技部门、卫生系统或大专院校、大型企业中担任着负责的工作。历史证明，党中央当时决定成立自然科学学院，是有政治远见的正确的决策。

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建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后来变成了一个教学机构——自然科学学院，一九四〇年夏正式开学。一九四五年底迁到新解放的张家口，改成了华北大学的工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又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在自然科学学院存在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对怎样培养科技人材和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材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在当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培养大量科技人材的时期，回顾一下迄



今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创办经过，是有益的。

## 历史背景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武汉后，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转而采取“以华制华”策略，加之国际上的远东慕尼黑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卖国投降，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想用切断供应和贸易往来的办法，扼杀边区的生机。边区经济原来就很落后，工业更不发展，除了延长的石油和盐池的盐大宗出口外，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大多要靠输入，大至钢铁、棉花、纱布、纸张，小至火柴、肥皂都是如此。所以，国民党的停发经费和封锁经济，曾一度使边区的财政和生活发生很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党中央确定了发展自给经济的方针，发展边区自己的农工商业，这就给边区当时主要限于军工和医务方面的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一九三九年底，自然科学研究院召开了“自然科学讨论会”，边区工农业部门和自然科学研究院共万余人参加。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在党中央直接倡导和赞助下，边区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自然科学同人大会”，正式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加强科技研究工作，配合抗

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这是我们党组织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会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毛主席亲自到会讲了话，指出边区经济落后，但自然科学很有发展前途，并从哲学的高度说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得到自由。”他还强调：“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改造自然界。”陈云同志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是尊重的。”“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精神来进行自然科学事业。”不久，八路军留守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又召开了技术干部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再次强调技术工作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样就为建立自然科学学院奠定了思想基础。

那时在边区，中央直属的已有军事、政治、党务、马列主义理论、财经、艺术各方面的干部学校，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只有一座专业性的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一九四〇年夏天，从大后方输送去了一批青年学生，便正式分班开课，成为拥有大学本科和预科以及附中的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当时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不久，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返回边区，就由他接替了这个工作。

## 艰苦创业

在当时边区的物质条件下，要创办一所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困难是很大的。师资、教材、仪器、文具，无一不缺，而且要自己动手，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由于中央的重视，先已拨款雇民工打好了一批窑洞。所以，科学院的师生没有象抗大、陕公等学校开始时那样，由自己打窑洞。但整修道路、开辟场地、建造厕所等，基建活动也不算少，外加开荒。天冷没有煤火取暖，窑洞里墨水瓶也能冻裂，男同学就上山去烧炭，运回来，一个窑洞一天发一斤多，在地上刨个坑当火盆，几个人围着暖暖手脚。女同志则帮助解决冬装问题，没有棉衣，怎么办？正好从新疆调回一批老羊皮的军大衣，但不够分配，只好把下摆剪下来，两件大衣改成三件短外套。这东西倒挺暖和，逢下雪天，还可把毛里朝外，顶雨衣用。学员们在研究院上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把生活安排停当。

难以自己解决的还是教材和实验设备，赖有党中央的关怀，也终于得到解决。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这件事，搜集到了一批当时大学里作为典范的英文原版课本，谈明的《化学》、达夫的《物理学》和克兰威尔的《微积分》之类，还特地从国外搞回来几批理化仪器和化学药品。中央还拨出专款建造了一座教学楼，当时叫科学馆，除了一大间实验室，还有一间阶梯式课堂。这样的设施，在当时边区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李富春同志有一次对学员们讲话时，特别提到了中央如何关怀自然科学学院的工作，尽量设法提供教学所需要的教材和设备，他要大家充分认识科学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安下心来，发愤用功，掌握科学知识，为抗战建国服务。

徐老来校后，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从政治思想工作到后勤工作，都亲自过问、具体安排。他给教师、干部和同学讲政治理论课，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激励和教育我们年青一代。徐老还给我们讲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它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他鼓励大家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用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精神办好自然科学学院。

经过一番艰苦的创建活动，终于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有时粮食供应不足，不得不以黑豆之类补充；副食基本上是盐汤，飘着几点油花和一些萝卜片或土豆片。但是同志们凭着一股子革命的热情和决心，大家的学习情绪相当高，生活很活跃。除了上课，大多数同志都自觉抓紧时间自学。晚上没有电灯，连煤油灯或蜡烛也没有，每个窑洞只有一小盏油灯，五六个人就围着它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

文娱活动的条件尽管很差，但同学们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仍然十分活跃。自然科学学院只有在半山坡上开出来的一个排球场，一到休息的时候，排球场非常热闹。有些

爱好音乐的同志还组织起合唱团，经常演唱抗日和革命歌曲。

每周都有一次生活漫谈会，分组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都本着革命同志间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偶尔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争完就过去了，不存什么芥蒂。这种直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而使同志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墙报是同学们自己办的一个活跃的思想园地，各班都有，内容除了交流思想，也对教学和党的工作进行探讨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些活动，既严肃又活泼，反映了边区的民主生活和青年们的蓬勃朝气，这与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那种毫无民主，倍受压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近期和远期相兼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就校风来说，抗大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自然科学院也完全适用。但在办学上，则从教学方针、课程标准、科系设置、教材内容以至教学方法，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那时，党对办社会科学教育经验是丰富的，但对搞自然科学教育，尤其是高级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教育，还很少经验，自然科学院更是首创。所以尽管大家都同意要办，但对怎么办，却意见纷纭。这些争论，实际上涉及到科学与革命，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首先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办自然科学院的大学部。有一种悲观的论点，认为边区科学设备太差，学生和教员的水平不高，办不好大学。甚至认为我们培养不了科学技术干部，应当从大后方想办法。另外一种积极的意见认为，边区当时人材和物质条件虽不如大后方，但比起抗战开始的初创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的设备，也有了必要的师生人员。我们还有自己先进的方面：有党中央的重视和正确领导，有革命的学风，有创造性、斗争性、科学性，革命的教育事业不能向困难和落后投降。而且，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是抗战建国和当前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状态，因此，大学是应该办也是能够办的。当时，徐老提出：“科学家还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

学制终于确定下来了，既有大学部，也有中学部，但在课程标准和大学分系的问题上，还有争论，这是前一争论的继续。究竟怎样看待边区的落后和需要以及科学技术的任务，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争论点：一个是所谓“正规化”问题，是适应边区当前需要，办短期训练班培养专业干部，还是办成正规的大学，培养具有基础理论的专门人材。另一个是分系和课程应侧重理论，还是侧重应用。有两种极端的意见：一种认为边区经济落后，没有太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用不着高深的理论，根本无需办大学，更无须



正规化，有人甚至主张“学科学用带徒弟的办法”比办学还好。另一种则相反，认为既是大学，就应当完全正规化，也就是照搬大后方办大学的传统方法，甚至照搬外国的经验。

徐老提出：“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一方面肯定科技的中心任务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为着生产，解决抗战建国的物质问题。办大学要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就要求正规化，是不实际的。另一方面，强调科学是客观逻辑的主观化，是对自然的系统的了解，它基于经验、高于经验，搞科学建设首先要对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如果缺乏科学基础知识，想把科学推向前进是不可能的。要根本解决现代经济建设上的各种问题，还得依靠科学。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一度只搞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使科学降到最低水平，这种失败的经验，必须记取。徐老坚持要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主张加强基础科学知识教育，教给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他极力主张“发展科学必须有周密完整的计划”。他与各方面仔细商量，制定了一个既照顾历史，又照顾将来，既抓住中心，又抓住全面的发展科学的计划。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终于把自然科学学院这株幼苗培植成长起来，比较正规地顺利地开展了教育工作。

自然科学学院开始规定的学制是初中一年半、高中两年，中学偏重实用技术的学习，大学注重精研学理与实际技术相配合。三个月后就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大学三年。从中学到大学一年都是基础科学，实际问题列到大学

的后二年。大学的课本完全采用当时大后方正规大学的规范性教材，从外国购进仪器设备，建设教学楼，这些都体现了正规化的思想。大学部先分四个系，即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矿(冶)系，后来将物理和化学两个系的课程作了调整，改为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系，生物系、地矿系仍保留。

虽然前期教学上侧重于掌握科学的基本知识，但并没有忽视实习和应用，开课不久，就办起了机械和化工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厂配合边区经济建设，先后制成肥皂、火柴、砂糖、玻璃等产品供应需要。机械实习厂先后设立了金工、铸工、锻工和木工，除组织同学参加实习外，还有一部分固定职工为满足边区当时的急需，先后制造了医科手术器械，造纸厂用的容量达万斤的大蒸煮锅，纺织机械配件和日用生活品。组织理化系的同学到炼铁厂实习，生物系的同学参与了边区生物调查和实验农场的活动，地矿系的同学参加煤田地质的调查和测量。

整风运动以后，徐老已离开自然科学学院。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起，教学转而侧重于实用。在增添部分应用课程的同时，更多地着重了实习。大学部的同学到工厂参加了实际的生产劳动，切实丰富了实践经验。前一段时间基本知识的学习为后来有可能参与技术性较强的生产作了准备，后一段的实践又加深了对前一段基本理论学习的理解，并使之同生产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因此，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说，关于教学方针的讨论，通过实践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是：科

学首先要为生产建设服务，理论和实用不可偏废，近期和远期的需要应当兼顾。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延安自然科学院走出了我党自己搞科学教育的一条道路。

## 培养无产阶级化的技术人材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正如物质的武器一样，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可以为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所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但形成某种体系，掌握和运用它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也正如组成军队，掌握和使用它的人是有阶级性的一样。虽然资产阶级的科学人材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所用，但是，无产阶级想要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寄希望于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也就是没有改变阶级性的资产阶级人材，这里有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区别。正如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伟大创造，只有经过马克思的改造，把它的头脚倒转过来，赋予唯物主义的基础，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不是亚丹·斯密，也不是李嘉图，而只是马克思才揭示出资本增值的真正秘密，暴露其剥削的本质，把无产阶级推上自为的舞台。

因此，边区要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只仰赖大后方的现成人材，而必需培养自己的人材。培养自己的人材，不能只限于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还必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在学会掌握自然科学这一武器的同时，学会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正确运用。正是



这后一点，使无产阶级的人材区别于也优于资产阶级的人材，足以担当我们科学事业的骨干。

同边区所有的干部学校一样，自然科学院也是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学习双管齐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前面说过，我们的学习实际上是从劳动课开始的。开荒、烧炭、积肥、种地、纺线、织毛衣、编草鞋，加上各种实习，整个学习期间，劳动始终是一门主课。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断绝粮饷，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为克服困难，根本改善物资供应，在毛主席的发动下，掀起了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大部分同学都从翻地、下种到收割、打场，参加过粮食生产的全过程。这种生产劳动，对我们一些原先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来说，不仅是增加了全套的生产知识，磨炼了体格，更有根本意义的是从中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锻炼了革命的意志。

我们到科学院后不久，一场大雨使山洪爆发，科学院门前那条叫做杜甫川的小溪，河水猛涨，形成了一股宽阔的急流，从上游漂下来不少农作物和农家的用具。这时候，我们有几个年轻人很有兴致地到大门外去“看大水”，显然还不曾有同农民休戚相关的感情。一九四一年困难时期，每个人都得完成一定的口粮生产任务，有人还在溪边开出小块荒地，种上蔬菜。此时，大家对天气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出太阳还是下雨，首先想到的是对种的东西是否有利。种庄稼需要肥料，我们几个人到骡马店去挖厩肥，时值冬

季，天寒地冻，用镐刨时冰渣乱飞，但越往下挖肥越熟，色味都更浓，竟不觉其脏，反而干得更起劲了。毛主席说，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最干净的。原先我们对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领会。只有经过象挖肥这样的实践，才使我们得到深切的体验。当手上磨起泡，肩膀压得疼痛，腰酸得直不起来的时候，才能比较深切地领会到，为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劳动人民表现得更为坚定。

如果说生产劳动促进了感情上的变化，整风运动则是进一步促进了思想上的转变，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弄明白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解决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认识问题，如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领袖与群众、人性与阶级性、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等等。整风学习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使我们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能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要是没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基本上完成思想改造，使自己变成基本上算得是无产阶级化了的技术人材，是不大可能的。这两个运动虽然占去了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它的重要性是无可估量的。

## 历史经验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创办，为迎接抗战的胜利准备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日本侵略者一投降，科学院大学部的同

学大多数随干部大队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了把东北建设为一个重工业基地的各项工作，这个基地对支援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学部的小同学有不少被送到苏联学习，他们回国时，正好投入全国胜利后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自然科学院同学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担负了科技部门的负责工作。这些骨干，同其他科技人材团结协作、携手并进，继续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路子是走得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当然，时代变化了，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某些经验已只具有历史意义，不可照搬。但是，有许多好经验，在今天、以至在今后的长时期里，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有一些东西，今天甚至还需要重新强调，以便使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能够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四化”的需要，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科技大军。这些经验是：为革命而学习；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并重；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近期和长远的需要兼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严肃的空气和活跃的生活；师生之间的同志式关系；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先锋作用等等。正是这些优良的传统，使我们的科学教育事业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教育事业，而且将使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发展，在不太远的将来，进入世界先进的行列。



# 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 团史上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罗征敬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从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始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起，至今已经六十一年了。六十一年来，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一段光辉的、但又曲折的路程。既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发挥过先锋和桥梁作用的丰功伟绩，又有在党的错误路线影响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沉痛教训。为了教育青年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必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了解青年团创建的历史。在研究团的创建问题时，首先会涉及到团的创建人之一——俞秀松同志。

俞秀松同志又名寿松，字柏青，在苏联学习时名“纳利马诺夫”，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王寿成。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一九一六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并领导浙江省立一师的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底赴北京。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边劳动，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

七日回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据李达<sup>①</sup>、邵力子<sup>②</sup>、施存统<sup>③</sup>、陈公培<sup>④</sup>、杨之华<sup>⑤</sup>、董锄平<sup>⑥</sup>、包惠僧<sup>⑦</sup>等人的回忆，俞秀松同志是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据一九二七年军阀张作霖从北京苏联大使馆查获的俄人葛萨廖夫著《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sup>⑧</sup>、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抗大政治部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sup>⑨</sup>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延安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sup>⑩</sup>等书的记载，都说俞秀松同志是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之一。据陈望道<sup>⑪</sup>、李达<sup>⑫</sup>、施存统<sup>⑬</sup>、柯庆施<sup>⑭</sup>、包惠僧<sup>⑮</sup>、沈雁冰<sup>⑯</sup>、魏以新<sup>⑰</sup>等人的回忆，都认为俞秀松同志在当时党的发起人中，年纪最轻，陈独秀因此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担任书记。同时担任外国语学社秘书，在校攻读俄文。一九二一年三月，被党、团组织派遣，做为代表前往苏联参加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并联系派送学生留苏事宜。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及浙江的建党建团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为打倒军阀，先后到福州、泉州、广州帮助孙中山做军运工作，并任东路讨陈炯明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任教。一九三三年被联共党派往伯力，担任中国报《工人之路》副总编。一九三五年又被派往新疆，担任反帝总会秘书长，做盛世才统战工作，主编出版《反帝战线》。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八年遇害。

然而，这样一位在建党、建团工作上有卓越贡献的同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却默默无闻；在团的历史上也不敢触

及；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中，也没有一席之地；中央组织部的档案里，也没有丝毫记载。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俞秀松同志存在两个困惑不解的疑问：一、是否托派；二、是怎样牺牲的？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却发给俞秀松同志的家属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简称烈士证），上面有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字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托派，为什么发给烈士证？是烈士，政治上为什么得到如此冷遇？

为此，我们花了十三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一大纪念馆等单位，也从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的资料中得到一些材料，并走访了五十七位同志，对俞秀松同志的一生做了初步调查。现将调查结果简述如下。

## 一、关于托派的问题

说俞秀松同志是托派，不仅出现在解放前，在解放后，甚至在近两年也一再出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十六期发表的郭雄、高荣光合写的《中国托派历史情况简介》一文后，附有中国托派名单，在上海地区一栏中出现有“俞秀松”的名字。一九八〇年六月五日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十一期，任武雄《关于俞秀松》一文也提到：“有一些同志说俞秀松后来是‘托派’。有的书刊上也这样记载。据译自《真理报》文章的《托洛茨基的国际活动》一书中说：‘在1925—



27年，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念书时，他们曾经在学生中组织反党的小组织。他们曾经借口组织‘同乡会’，实际上在当时孙大校长拉狄克领导之下……进行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并反对当时学校内党支部局的斗争。’ ‘在1928年至1932年春这个时期内，当周达文、董亦湘和俞松秀等在列宁学校念书和教书时，他们经常或明或暗地进行反党的斗争。当1930年夏秋，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了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时，在党内发生很大的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曾反映到当时的列宁学校。当时，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在学生中不讨论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不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1931年5月通过的）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在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反对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实行怠工，而仍旧反对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后更新领导的中央及其政治路线。’ 文章说，他们‘却故意说：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而只反对王明……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据上述文章所述，俞秀松主要是反对王明。”

以上这段文字可以归纳为：俞秀松等三人，一是组织“江浙同乡会”；二是反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三是反对王明……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这就是“托派”的根据。

我们在上海看到了俞秀松同志的二十封亲笔信，有力地说明了他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期间的经历。一九二一年四月六日的家信，谈到他被社会主义青年团推选为出席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以团的书记身份，

先行到苏联联系我党派遣一批青年赴苏学习的事宜。一九二六年八月二日给父母亲的信中，谈到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离上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是他第二次到苏联学习，信中热情赞扬苏联近年来的巨大变化：“我第一次到俄的生活是很苦的，但是此次到俄，情形与前大不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家信中说：“我于本月初旬考入国际大学，一切安好。”这里所说的国际大学，据当时留学苏联的同志讲，从他来信的地址看，就是列宁学院。

为了解俞秀松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我们访问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与俞秀松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同学或共事的同志。据傅钟<sup>⑧</sup>、吴亮平<sup>⑨</sup>同志回忆，一九二五年共有四批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而俞秀松同志是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并且担任中共旅莫支部支委。

杨放之<sup>⑩</sup>同志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俞秀松同志在中山大学的的情况。他说：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这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是参加中山大学教务处的工作的。当时俞秀松同志等虽是学生，但因苏联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校方也要依靠中国同志。俞秀松等同志在教务处工作中，组织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规定训练方针等，得到教务处主任阿郭尔的信任。但由于阿郭尔与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有矛盾，米夫极力排斥阿郭尔，势必形成王明与俞秀松等同志的对立。因为王明也看不起这些老同志。王明的俄语学得快，深得副校长兼这个班的列宁主义教员米

夫的赏识。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捏造罪名，“江浙同学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了。由此可见，“江浙同学会”的出现，其实质是王明宗派集团反对教务处的斗争。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由来，孙冶方同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情形如下：“在我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们中，除了回国工作的以外，大部分都升到别的学校学习，极少数的人留校工作，我和云泽（乌兰夫）同志以及一个后来成为托派分子的董树功被派到东方大学当翻译。继续学习的同学只发些津贴，有些到军校学习的，按红军士兵待遇，津贴特别少。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要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这天，除约好的几位军校的同学外，董亦湘也来了，军事学院的陈启科、左权同志也来了，挤了一屋子的人，把同房间住的乌兰夫同志都挤了出去。正当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大大学生公社（学生会）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呱啦啦讲得很热闹，象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其中陈启科、左权二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山大学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人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这年冬天，向忠发以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了莫斯科。王明、博古向他汇报留苏中国学生的情况时，硬说董亦湘等人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向忠发听信了片面之辞，不加调查，就在一次留苏学生大会讲话



时宣布：凡是在共产党内组织同乡会的都该枪毙。向忠发如此一讲，引起了留苏学生中极大的混乱……”。这就是组织“江浙同乡会”的经过。

所谓“江浙同乡会”后来怎样呢？孙冶方同志写道：“大约在一九二八年，第三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会审理了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审查委员会主席是联共监委书记耶拉斯拉夫斯基（他又是第三国际监委的负责人之一），中共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同志，团员是周恩来同志和后来做了叛徒的余飞。被审查的人到会的有：王长熙、我和董亦湘及发起敲竹杠的步兵学校的胡世杰，还有其他几个一起吃饭的人。”经过审查委员会的调查，最后的审查结论指出（大意）：“江浙同乡会”是莫须有的事，但是存在有部分同志间的感情结合，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sup>②1</sup>

就连王明的追随者、叛徒盛中亮也供认不讳：“流言说，他俩（指俞秀松和董亦湘）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而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手法可谓屡见不鲜。”<sup>②2</sup>

本来，由三个权威机关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已经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但是，王明等不仅仍然抓住不放，而且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升级，竟然造谣诬蔑俞秀松等同志是托派。

一九三三年与俞秀松同志在苏联远东伯力和一九三六年在新疆共过事的赵唯刚同志说：如果俞秀松同志是托派，联共党不可能把他派往伯力和新疆工作，而且担任报社的副总编。<sup>②③</sup>

我们还专门访问了刘仁静和郑超麟。刘仁静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曾与俞秀松同志同时在列宁学院学习。他坚决表示：俞秀松同志不是托派<sup>②④</sup>。郑超麟也否认俞秀松同志是托派。他说：俞秀松反对王明，所以王明和康生用托派名义杀害他。<sup>②⑤</sup>

此外，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与俞秀松同志在新疆共过事的包尔汉<sup>②⑥</sup>、王一<sup>②⑦</sup>、江泽民<sup>②⑧</sup>、张义吾<sup>②⑨</sup>等同志均一致肯定俞秀松同志不是托派。

既然这么多了解情况的同志否认俞秀松同志是托派，那末，将俞秀松同志说成托派又渊源于何处？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源头。除了王明在一九三七年底告诉盛世才说俞秀松同志是托派外，最早见诸于文字，把俞秀松同志打成托派的，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康生。康生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二十九和三十期上，公然毫无根据地把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同志诬陷为“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sup>③⑩</sup>随后苏联的《真理报》和巴黎的《救国时报》上，也随声附和诬蔑俞秀松等同志为“托派”。

那末，王明、康生为什么如此仇视俞秀松同志？吴亮平同志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和俞秀松同志以及王明同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说：当时王明既不是团员，更

不是党员。王明善于阿谀逢迎、投机钻营、吹牛拍马，所以得到副校长米夫的青睞。俞秀松同志对此十分反感、厌恶。而俞秀松同志是我党、我团的创建人之一，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同时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曾经领导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参加过军队工作，有比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作风正派，为人忠实，刚直不阿，受到广大中国同学的爱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俞秀松同志都比王明更胜一筹。据嵇直<sup>⑩</sup>同志反映：王明早期在中国党内没有地位，是到苏联以后才加入团，后入党的。王明要出头，就必须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把俞秀松等同志搞掉。而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必须拉拢一班人。在这种形势下，王明与米夫就勾结起来，形成个宗派集团。列宁学院校务长凯撒诺娃是第三国际苏共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她对中国党、对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非常尊敬，同时也对米夫与王明的宗派活动不满，支持俞秀松等同志向第三国际告发。因此，王明对俞秀松等同志视为寇仇。后来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宗派集团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强行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俞秀松等同志更加不满，并加以抵制。这就是王明为什么要把俞秀松同志打成托派的根本原因。王明宗派集团欲拔掉这个眼中钉，只有置俞秀松同志于死地而后快。王明对待反对他的人，便给戴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这样的人不计其数，吴亮平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



## 二、关于牺牲的问题

王明、康生诬陷俞秀松同志是托派，有关俞秀松同志的问题也就成了禁区，无人敢于过问。因此俞秀松同志的死也一直成了一个谜。据我们了解，对俞秀松同志的死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俞秀松是“蒋介石清党时牺牲的。”<sup>②</sup>

第二种说法，俞秀松是“被盛世才杀害的。”<sup>③</sup>

第三种说法，俞秀松是“在苏联被害的。”<sup>④</sup>

为了搞清这一事实，我们走访了俞秀松同志的爱人安志洁同志。她只是提出了盛世才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把俞秀松同志逮捕入狱，后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押送上飞机，至此音信杳无等情况。<sup>⑤</sup>

据赵云容、郑一俊<sup>⑥</sup>、王一、江泽民、张义吾、陈英等曾在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同时被联共党派往新疆、与俞秀松同志共事于反帝总会的同志们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曾见到盛世才。盛世才拿出一张被联共党派往新疆工作的二十五人的照片，问王明认识不认识这些人。王明说：这些人都是托派。于是，俞秀松、赵云容、郑一俊、江泽民、满苏尔、张逸凡等人先后被捕，其他人不久就释放了。而俞秀松和张逸凡两人又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机被押送去苏联，到莫斯科后，又同下监狱。据张逸凡一九五八年回国探亲时告诉赵云容、郑一俊、王一、江泽民等人说：他和俞秀松

在狱中同时受审。在审问张逸凡时，问他是否反对王明。张受刑不过，承认他反王明，但没在中共旅莫支部（因张较俞秀松同志晚一年到苏联）工作过。为此，他被流放到北冰洋万尔库他一个煤矿的劳改营里做苦工，十年后才平反，以后就留在苏联了。而俞秀松同志，在审问他时，直言不讳自己是反对王明的，而且在中共旅莫支部担任过领导工作。为此，就受到重刑。张逸凡说，开始还听见他受刑时的凄惨叫声，后来声音渐微，就再也听不到了。俞秀松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夏，在酷刑的折磨下，不幸牺牲在苏联监狱里的。

我们又从另一方面得到证实。据张义吾同志回忆，一九三七年他从新疆回苏联，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被派往外蒙，直到一九四七年回国。在一九四六年冬，他曾从乌兰巴托回苏述职。在苏联见到内务部的曾秀夫（又名王立祥，此人紧跟王明，专管中国人，由于工作卖力，后提升大校，并获列宁勋章），听他说，俞秀松同志已在苏联内务部监狱里。

据张锡俦<sup>②</sup>同志回忆，董亦湘、周达文两同志当时是在苏联远东伯力，与俞秀松同志同时被捕，也同时牺牲在监狱里。

王稼祥同志在一九七三年时的回忆更加证实俞秀松等同志是被王明、康生所杀害。一九三七年，王明、康生要从苏联回国，行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悉王稼祥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莫斯科治疗弹伤，也同时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接见时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接见过程中，

“这一次王明又居心不良，他利用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机会来报私仇。说周达文、俞秀松二人是坏人，并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指责马列学院的凯撒诺娃包庇他二位。这以前，王明苦于无机会整垮周达文、俞秀松二人；不久，周达文、俞秀松二人被捕，凯撒诺娃被撤了职。王明的丑恶灵魂随时随地都在害人。”<sup>③</sup>

综上所述，王明、康生为了消灭异己，除掉王明宗派集团的第一批反对者，假借盛世才之手，将俞秀松同志逮捕；又假借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之机，加以杀害。

我们访问了五十多位同志，大家异口同声赞颂俞秀松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我党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一颗被埋没的明珠。由于抵制、反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被王明、康生诬害致死。大家既愤怒又惋惜，甚至有的同志痛哭不止。

经过这次调查，可以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俞秀松同志是一位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重要贡献的同志，是我党最早的优秀青年工作者和青年领导者。他一生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为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在诬蔑、迫害面前坚贞不屈，在与王明、康生之流的斗争中，英勇奋战到最后一息。

今天，在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际，我们要为俞秀松同志伸张正义，推倒一切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让这颗被埋没了四十三年之久的明珠，在我们党史和团史上闪闪发光吧！



## 注 释

- ①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
- ② 邵力子：《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 ③ 施存统：《答复几个有关党成立时期的历史问题》（1956年12月）。
- ④ 陈公培先生访问记录。
- ⑤ 杨之华同志访问记录。
- ⑥ 董锄平：《党成立前的回忆》。
- ⑦ 包惠僧：《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79年5月19日）。
- ⑧ 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简史》。
- ⑨ 《中共小组的形成》，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抗大政治部1938年4月18日出版。
- ⑩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著1938年12月出版。
- ⑪ 陈望道同志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情况（1957年3月4日）。
- ⑫ 李达：《1920年至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1月）。
- ⑬ 施存统：《1920年至1923年期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1月）。
- ⑭ 柯庆施：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情况（1957年3月4日）。
- ⑮ 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1957年7月1日）。
- ⑯ 沈雁冰同志给安志洁同志的信（1979年11月27日）。
- ⑰ 魏以新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情况（1980年6月）。
- ⑱ 傅钟同志谈俞秀松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况（1980年11月3日）。
- ⑲ 吴亮平同志谈俞秀松同志和王明、康生斗争的情况（1980年9月18日）。
- ⑳ 杨放之同志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情况（1981年11月23日）。
- ㉑ 孙冶方同志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1980年1月20日）。
- ㉒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亲身经历）》。
- ㉓ 赵唯刚同志谈俞秀松同志情况（1981年6月29日）。
- ㉔ 刘仁静谈苏联列宁学院的中国托派情况（1980年10月27日）。
- ㉕ 郑超麟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情况（1981年3月12日）。
- ㉖ 包尔汉同志谈俞秀松同志的情况（1980年7月2日）。

- ②7 王一同志谈俞秀松同志牺牲的情况 (1980年9月9日)。
- ②8 江泽民同志谈俞秀松同志的情况 (1980年7月11日)。
- ②9 张义吾、陈英同志谈俞秀松同志牺牲情况 (1980年9月11日)。
- ③0 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1938年4月)。
- ③1 嵇直：《死于冤案的何止俞秀松一人》(1980年10月23日)。
- ③2 邵力子先生访问记录 (1956年7月)。
- ③3 张国焘：《我的回忆》。
- ③4 同①④
- ③5 安志洁同志谈俞秀松同志牺牲情况 (1980年6月20日)。
- ③6 赵云容、郑一俊同志谈在苏联学习及俞秀松同志牺牲情况 (1980年9月6日)。
- ③7 张锡传同志谈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同志的情况 (1981年11月14日)。
- ③8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73年)

## 参考资料摘登

# 刘仁静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编者按：刘仁静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以后在苏联学习期间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九年曾专程到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党籍。此后即长期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任职，现在是人民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此文是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间访问刘仁静的记录稿。记录者未查对历史文件和资料，也没有改动刘仁静本人的观点。现刊出供内部参考。〕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生于一九〇二年三月。曾经用过的名字和笔名有刘仁静、刘敬云、刘竞人、刘一字、刘亦宇、子云、澄宇、刘镜园等。

小时候，我在家乡的应城小学读书。大了一点就离开了家，到武昌进博文书院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由于这个学校的学费很贵，我只读了两年，就作为插班生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三年级，在那里读了两年毕业。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最初在物理系预



科学习。后来我感到学习物理有困难：第一、我的数学不好；第二、我不会做实验，对物理系预科学习感到没有多大兴趣。因此，在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进了哲学系。北大那时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自己的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当时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克鲁泡特金的书，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从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时我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读的都是英文译本，那时还没有中文版本。

一九一九年，我作为北大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经王光祈介绍，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入会后，我还担任过会计。后来，王光祈又介绍我去和胡适谈过一次话。我对胡适说，我想看很多的书。胡适知道了我的思想，认为我好高骛远，他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以后我长时期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一九二〇年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开的。有一次，我们快开会时，有一个人揭开门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认为是包打听，我们应分散。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我们便于次日分别

去嘉兴，在船上开完了这次会就闭幕。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应确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在北大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时，其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据张国焘的回忆说，刘仁静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谈“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那是我受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在会上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在召开党的“一大”以前，我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一九二一年，我任华俄通讯社翻译，把北京报上的重要新闻译成英文，再由俄国人译成俄文发到莫斯科各报刊登。那时每月可得薪水八十元。一九二二年，我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周刊，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我办了三期。我在《先驱》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叫刘敬云。这一刊物后来由施存统主编，有好几期不得不改在上海出版。

一九二二年九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他去参加，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铁路工会派王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三个人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从北京动身，路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之后到

达莫斯科，随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说欧洲国家语言，就推我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在开会期间，我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开完共产国际“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我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一九二三年四月，与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一九二三年六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进团中央，并被推选为团的总书记。我担任了几个月总书记，犯了错误，受到上海团市委弹劾。以后我以回京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名，离开团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很有成绩。

我回北京后，就主编《政治生活》。我只办了三期，后由范鸿劼、赵世炎、李鸿一等主编，一直办到一九二六年。

## 拜访托洛茨基

一九二六年，党派我第二次到苏联，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到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



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的。

我在莫斯科学习了两年多以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我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都没有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在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柏林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德国当局出动了好多警察，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我没有参加“五一”节游行。

在柏林期间，我碰到了成仿吾。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次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做什么。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话，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我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到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放在他那里，

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这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托洛茨基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过他的名字。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中东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柏林，在一天的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乘渡轮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同他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他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事，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

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他活动的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他是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生的，一九二九年正是他诞生五十周年，他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要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这一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会



议，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太久。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时，他问我有没有路费，我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我离开土耳其时，托洛茨基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聂里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我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字。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由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碰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时大概是一九二九年的七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

## 回 国 以 后

我在回国途中走了一个多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恽代英，

他是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到一个小旅馆中见面的；另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黄浦公园谈过话。在谈到何孟雄的妻子缪伯英牺牲一事时，何孟雄还流了眼泪。对恽代英 and 何孟雄我都没有谈见到托洛茨基的事。所以，我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们查出来的。至于托洛茨基口授的那篇文章，我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我一起译出来了。

我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共产国际知道了，党中央也知道了。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怒。我回上海后，首先是党办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责问我说：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代出来，限你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你访问托洛茨基的情况。我当时没有觉悟到自己做得不对，就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代问题。共产党组织见我不交代问题，就把我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后来，托派组织有人说我是“议会迷”，也把我开除了。

回国后，我曾与托洛茨基通过信。我给托洛茨基的第一封信，内容是辩论国民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对派》通讯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给我的信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应直率的告诉您，您的方法是不对的，您的这些方法我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运动在中国发展。他的落款是：“紧紧握手，您的谢尔梯·托洛茨基。”我先后一共收到托洛茨基五封回信。这五封信交给了一九三一年成立的统一的托派组织。托派组织把我开除后，我

就不再写信给托洛茨基了。有一次，我在托派刊物上还见到这样一篇报道：一九三五年，有两个美国人在路过墨西哥时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我仍有好感，还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除了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投到美国托派组织《战士周刊》，报道了一些中国托派情况，这封信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过。这说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国通讯。

一九三〇年，托洛茨基已写成自传（上、下册），并寄了一套俄文本给我。我们还组织人进行翻译。王文元拿了这本书不还我了，我和几个人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上册，交神州国光社出版。

关于我到欧洲的情况，一九三〇年我写过一篇《欧游回忆录》，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月刊）上刊载过。神州国光社原来出版美术、碑帖书籍，后来由陈铭枢接盘，派其亲信王礼锡担任主编，把它变成政治、经济、文学出版社，我曾在该社翻译出版过一部《法国大革命史》。

## 中国的托派组织

我回国后，中国已有了托派组织。中国托派组织，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二九年初组织的，参加的成员多数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

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成立过四个托派组织：



第一个组织叫“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原是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办的一个刊物的名称。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有区芳（男，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由于贫病，在一九三〇年去世）、陈亦谋（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史唐（中山大学学生，浙江人）、张特（又叫张威，广西人，中山大学学生，一九三一年他到我家说，他要回广西，后即投奔桂系）、李血泪（大约是广西人，没有多久即病故）、梁干桥（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出席过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召开的托派“一大”会议，没有几天，觉得托派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前途，就去南京当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一九三九年他被调到西安任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还有陆渊，是上海人。这个组织出一周刊叫《我们的话》，是油印的，后改为石印，大约出了十多期。我看过几期，写得很生动，批评了斯大林。据说他们还与纱厂工人有些联系，但人数不多。

再一个组织叫“十月社”。一九二九年我回国后，随即进行了托派的组织活动，与一些从“我们的话”里分裂出来的留俄学生组织了“十月社”，负责人有王文元、董汝诚（即董建平）、宋逢春、段紫亮、陆梦衣和我，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我们这个组织办了个《十月》月刊，是铅印的，只出过一期。另外还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还有个托派组织叫“无产者”。这个组织由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湖北人，工人）等人组成，共有八十一人（根据他们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人数）。早在一九

二二年九月，陈独秀与我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在火车上他就对我说过：现在只有列宁、托洛茨基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还说朱执信也是很革命的。到了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看了托洛茨基写的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很佩服，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进行工作。他们出了个《无产者》月刊，并以“无产者”命名自己的组织。这个刊物是铅印的，大约出了几期就停刊了。“无产者”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它本身没有宣布是托派组织，但在思想上是赞成托派观点的。这个组织成立了几个月，马玉夫就叛变了，他把“无产者”派组织的情况向国民党告密，所以国民党就逮捕了一些人。被捕的有：王文元、宋逢春（“十月社”）、何资深（“无产者”）、郑超麟（“无产者”）、刘静真（郑超麟的爱人、“无产者”）、尹宽、彭述之。

另外一个托派组织叫“战斗”。这个组织是由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来的学生于一九二九年成立的，负责人有王平一、刘胤、赵济、徐乃达。他们出的刊物叫《战斗》，只出了一期。

一九二九年，我把上述情况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应把这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我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告给这四个组织的负责人，经过酝酿，大约在一九三一年，这四个组织同意成立统一的组织，由陈独秀当负责人，但没有统一的名称。托派组织统一没多久，因国民党逮捕了一些人，就停顿了。

中国托派组织的内部刊物叫《火花》，主要刊登托派内部争论的文章。我曾上面写文章批驳过陈独秀的观点。陈独秀写过一篇叫《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他说，红军是游民无产者组成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会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国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利用穷乡僻壤的农民搞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断章取义地引了恩格斯的话，把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完全加以否定。他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反对农民，反对苏维埃。他还提出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我写文章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没有可能。我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我对苏区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陈独秀到我家，说要办一个刊物，我当即表示赞成。这个刊物的名字叫《热潮》周刊，办了十几期，由陈独秀、彭述之和我主编。那时我看出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意见不一致，陈独秀瞧不起彭述之写的文章，他说，彭述之的文字象清朝人写的文章，平庸无奇，没有思想内容，只有他和我的文章还可以看。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以后，我与陈独秀失掉了联系，接着陈独秀就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刊物就停办了。

陈独秀曾给托洛茨基写过信，托洛茨基也回信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却对人说，他不是托派。一九三三年，我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被捕了，他是与彭述之一道被捕的，当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审判他时，他是反对国民党的（见报纸上登载的消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一



九三八年，把陈独秀、彭述之也释放了。彭述之出狱后，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了武汉。陶希圣随即和他联系，并送给他一百元，其实这些钱是汪精卫给的。后来，陶希圣在武昌出版《政论》，这个刊物是蒋介石出钱办的，陈独秀为这个刊物写过文章，陶希圣每月送他一百元或二百元。

我原来是属于“十月社”的，但“十月社”的多数人与我发生了冲突。王文元、宋逢春对我有意见，说我是“议会迷”，把我开除了。所以，几个托派组织成立统一组织时，我哪一派都不是。我是站在他们之外的游离分子，但我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的信仰。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的常委兼特务部长，其实不是。还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无产者”的成员，其实我是“十月社”的成员。我被开除后，托派组织的发展情况就不知道了。据说，在全国解放前，中国托派组织搬到了香港，大概是王文元、彭述之在那里负责。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时，与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有了联系，而且在工作上、思想上都没有意见分歧。当时他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美晚报》英文编辑。他爱人也在那里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很不安定，靠写稿为生，想找个固定的工作。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因为他认识一个美国人叫伊罗生的在北京。伊罗生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办的《中国论坛报》当过编辑，后来，他看到了托洛茨基写的文章，就信仰托洛茨基，不满意斯大林，因而离开了《中国论坛报》，同他的爱人到了北京，准备利用在中国搜

集到的江西苏区的材料写书，他要找人作他的助手，把苏区的材料翻译成英文。于是，经格拿斯的介绍，我就带家眷到了北京，替伊罗生当英文翻译，伊罗生每月给我八十元。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替伊罗生把材料翻译完后，准备带家属回湖北应城去。临走前，伊罗生对我说，你不要带煽动性的东西，他们要搜查的。我离开住所去火车站时，前后左右已有很多自行车跟着我们。因为我在伊罗生家工作，警察是知道的，但没有惊动我。一到西站，他们就对我进行检查，看到我的东西里面有一张打过英文的纸，就以此为理由，说我不能走。随即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王府井，关在派出所，后来，又把我送到警察厅。到了警察厅，他们要留俄学生认我的照片，认出我的真实姓名。他们认为，象我这样的案子他们不能解决，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把我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对我进行军法会审，判我两年半徒刑，送到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里比较自由，成立了“自治会”，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反省院院长叫刘云，指定我担任“自治会”主席。“自治会”主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同一些犯人散散步，放放风，有时组织犯人搞些娱乐活动。我在苏州反省院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节制资本刍议》，登在反省院半月刊上。当时，陈独秀在南京坐牢，他在反省院半月刊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托洛茨基派的愤怒，他们说反对托洛茨基，放弃了原来的立场，是叛徒，尤

其是陈独秀对这件事很恼火。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被江苏反省院释放出来，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说，你怎么离开上海的？我说，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他说，啊，没有吃的。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是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

我在武汉生活没有着落，很苦闷。那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九江，我在武昌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去找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他们协助我离开武汉。我通过黄季陆、康泽的关系，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并随他们租的船到了长沙。后来，又由长沙坐汽车到湘潭、衡阳、再坐湘桂路火车到桂林。在桂林停了一个多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找汽车把我从桂林经贵阳送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在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当科员，宣传处的处长是黄季陆。但那时我并没有履行入团手续，还不是三青团员。康泽知道我还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派人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很快就履行入团手续。其实，我心里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去找谭平山，他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我过去曾替谭平山写过文章，写出来后用他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他对我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在重庆家里住了一、两个月。这时，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黄季陆已任四川大学校长，他寄来一百元钱接济我。

我一家有五口人（夫妻、两个孩子、父亲）吃饭，生活仍很困难，还是想找工作。因此，我就写信给西安的梁



干乔，问他是否可到西安工作？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来是托派分子，后来他感到托派没有什么前途，参加了几天就溜了。由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到南京找黄埔军校的同学，做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政训处长。抗战后他担任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胡宗南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他给我写回信说，到西安可以找到工作。这样，我们就到了西安。后来，第十战区政治部撤销，梁干乔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把我介绍到西安西门外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战干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在那里教历史。过了一个时候，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桀免了我的职。我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介绍，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以前，即一九四〇年八月，我得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托洛茨基被害的消息，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打击，心里很难过。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部下有个秘书叫徐先麟，他在军队中募集到一笔款子，要在上海办个刊物，叫我去当这个刊物的总编辑，我表示愿意去，他们就把我家从西安迁到上海。到上海后，徐先麟给编辑的待遇不高。因此，我在那里只呆了一个短时间，就离开了，靠写稿和翻译维持生活。

到上海后，我还在上海的特务刊物《民主与统一》当过主编，但只办了几期就停办了。《民主与统一》是“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半月刊，主编原是郑学稼（福州人，托

派分子，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见到他，他见我没有什么工作，就把这个刊物交给我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社长和总经理叫刘伯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上海我还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当时他在美国）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前线日报》的总主笔是钱纳水，《时事新报晚刊》的总主笔是胡鄂公。胡鄂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

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京《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我，要我去南京给他帮忙。陶希圣是我在北大时的同学，他知道我是托派。我接到他的信，就借这个机会把《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的工作辞掉了。一九四八年七月来到南京，陶希圣把我安排在南京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当时，陶想让我写反共文章，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心里很苦闷，因为写托派观点的文章，他们不能接受，要写他们能接受的，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刚去时，我没有写什么文章。后来，我写了四篇反共文章，陶希圣认为我有所表现，把我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那里。邓文仪把我派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不久辞职回到上海，靠亲友的帮助维持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

（叶心瑜、颜广林根据访问记录整理）

##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摘译

美籍华人 郭成棠

〔编者按：美籍华人郭成棠，出生在中国，早年在国内受教育，五十年代中期赴美进修，曾获政治学硕士、图书学硕士、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和东亚研究室副教授。其所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七五年美国出版），是一部关于陈独秀的专著，其中谈到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以及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点。兹将这两方面的内容摘译如下，供分析研究。〕

### 一、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

从一九二四年国共开始合作时起，国民党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就是广州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强有力的支持下，他能够推动国民党逐渐向左转，促使中共发展壮大，并使军阀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



持，发展成为一支军事力量。但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鲍罗廷却使中共领导人，尤其是陈独秀，处于脆弱的地位。历时仅三年，国共合作就破裂了。鲍罗廷本人以至整个苏联顾问团，都被驱逐出国民党，中共被迫转入地下，甚至手握俄国武器的冯玉祥的军队，也掉转枪口对付共产党。

这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死非其时。但主要原因显然是在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派来的代表，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对国民党的认识完全错误。

孙中山能够使他的党员一致执行与俄国联合、与中共合作的政策，但他一死，国民党便分裂为左右两派。右派后来和得势的蒋介石站在一起，国共合作便改变了原来的性质。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广州国民政府还能在鲍罗廷、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之间维持三角均势，苏联的影响还占上风。这个均势为什么突然被打破？国共之间和中苏之间的合作为什么会破裂？研究一下莫斯科制定的政策同中国的实际状况之间出现过哪些连锁反应似的问题，便不难找到答案。

### **斯大林的中国纲领和蒋介石的崛起**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晚期莫斯科制定的中国政策，寻根究底，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有关。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后，二人便发生争论，这主要是谁来主

宰苏联和世界共运的个人之争，但也是两种对立的思想 and 革命战略、策略之间的斗争。

斯大林认为，近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苏联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是与此根本对立的。由于这种个人之间的斗争和理论上的分歧在苏联日趋发展，中国的事态发展便被用来在俄国的论战中作为攻击对方的炮弹。

斯大林主张把国共合作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手段，其根据是他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又是使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获得解放的革命。第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极其软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农民以至整个革命。斯大林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必须合作。<sup>①</sup>

可是托洛茨基认为，国共合作并非实现中国民族革命的途径。资产阶级革命和国民党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及其激进分子的支持下，不让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不让农民觉醒，并不惜牺牲群众和革命的利益来加强其本阶级的力量。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sup>②</sup>

在二人的论战中，斯大林逐渐在国内、党内、共产国际内占上风。一九二五年以前一直是斯大林在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看来他相当了解列宁的学说和俄国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的经验，但他并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例如，在多

大程度上发动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在象中国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应于何时建立苏维埃政权，对这些基本问题，他找不出答案。

列宁曾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领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并且最终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sup>③</sup> 斯大林因为不了解国民党的性质，也指望在中国民族革命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内也能够起这样双重的作用。

至于能否立即在中国建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也是根据俄国经验来作判断。俄国成立苏维埃，是为了领导群众起义，以推翻现政权，并成立自己的政府。按照斯大林的看法，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条件。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他认为，只有农民运动达到推翻旧制度、创造新政权的阶段，才能建立苏维埃。而中国农民运动或整个革命形势，都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因此，当时谈建立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sup>④</sup>

托洛茨基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推迟土地革命，就会断送革命。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次演说》中，他断言，除非允许工人建立苏维埃，否则他们就不算武装了起来。随着革命进一步发展，工人建立苏维埃的动力就会更加强大。因此，工人作为领导阶级，应当发动、加强和扩大这一运动。<sup>⑤</sup>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要求中共继续在国民党内建立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会议还进一步指示中共和国民党加强革命军队和群众组织，并把农民运动视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根本问题。<sup>⑥</sup> 斯大林特别把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看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主要力量。<sup>⑦</sup>

斯大林主义者还尽力说服冯玉祥的“国民军”支持革命。自一九二五年春起，鲍罗廷为此一直在同冯谈判。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冯玉祥得到价值一千零八十九万七千六百四十一卢布的武器和弹药，用以同北洋军阀奉直联军作战。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闭幕三天以后，广州发生了有历史意义的“中山舰事件”，或称“三月二十日事变”。此事件是蒋介石得势的一个里程碑。自此，蒋不仅成了中国革命的顶梁柱，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者要赖以实现其《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所规定的战略，而且是后来一个时期国民党内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一个人。

在处理这一事件上，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和中共中央其他成员，要求建立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同蒋介石进行斗争。彭述之奉命去广州同共产国际代表讨论具体办法，国际代表却全盘拒绝，并力促共产党支持蒋介石。<sup>⑧</sup> 后来，一艘满载军事物资的俄国船驶抵黄埔。陈独秀要求共产国际代表拨出五千支步枪武装广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不要把全部物资都送给靠不住的蒋介石。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国际代表告诉陈独秀的代表张国焘说，共产党目前必须为国

民党干“苦力活”。<sup>⑨</sup>

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而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又是那样固执，陈独秀便将这一事件报告莫斯科，试图改变一下政策。他建议将当时的“党内”合作政策改为“党外”联合。莫斯科认为这个建议反映了“错误的倾向”，立即派威金斯基返华以贯彻莫斯科的路线。<sup>⑩</sup>

此事件使陈独秀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已经不再可能保持国共合作。可是共产国际坚决认为，不能让此事件干扰合作政策的执行，并要求中共坚持莫斯科的总战略。陈独秀后来回忆说，这是国共合作极其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迫使无产阶级服从其意志，无产阶级正式向资产阶级投降。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从此跌进“机会主义的泥坑”。<sup>⑪</sup>

陈独秀想使共产国际改变其关于中国的政策，但是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他完全意识到，他不再是有职有权的中共领袖，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他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人们会问，他为什么不辞职？他非但不辞职，反而采取温和的立场，尽管违背自己的意志，仍然尽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他之所以留任，并采取默认的态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个性有关。陈独秀在他未写完的自传中曾承认，他因为不果断，并且宽大为怀，才造成政治上的失败。

为贯彻斯大林路线，威金斯基对有关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报道，一概斥之为帝国主义阴谋，是歪曲中国革命。鲍罗廷当时去华北访问冯玉祥，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后便

尽力使局势平静下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加亲热了。

蒋介石在达到驱逐某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的初步目的之后，便企图把自己装扮成革命群众的支持者。他发表革命演说，谴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对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声称，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关系密切；国民党应当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中央执委就调整党内事务问题通过四项决议。从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决议禁止共产党向国民党内共产党员发指示，除非事前得到两党联合委员会的批准。决议还剥夺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构担任部长的合法权利，并将共产党员在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席位限制在三分之一。蒋介石的密友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委主席。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和他的党不仅屈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而且也向蒋介石的意志屈服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共产党在信中向国民党重申继续合作的诚意；承认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限制；但要求凡采取针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措施，两党之间应先协商。<sup>⑫</sup> 在同一期《向导》周报上，陈独秀也发表了他本人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否认蒋的指责（蒋说“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企图谋害他）；指出中国革命只完成了一半，两党之间需要继续合作；并要蒋警惕帝国主义破坏中



国革命的阴谋。<sup>⑬</sup>

至此，各方领导人的内心打算都昭然若揭了。斯大林脱离中国政治现实，远在数千英里之外操纵着共产国际这部机器。鲍罗廷虽然人在广州，身临现场，但却力图证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二人似乎都认为，即使在“中山舰事件”以后，他们还能够利用蒋介石以争取时间，等到中共强大了再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是蒋介石确信，只要他表现出支持革命群众，他就能够在军事上和道义上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有朝一日他在军事上强大了就能够消灭共产党。陈独秀则因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他所认为的政治现实之间相抵触而左右为难。由于陈独秀所特有的个性，再加上他对共产国际十分顺从，中共在政治角逐中一旦灾难临头，陈独秀势必会成为牺牲品。

### 北伐和武汉政府

据蒋介石说，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北伐时，鲍罗廷不赞成，但鲍后来改变主意，企图利用北伐推进共产主义事业。<sup>⑭</sup>

陈独秀态度消极。他认为，北伐只是国民革命的一个方面——军事行动，决没有体现出革命的真正意义。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各阶级革命群众奋起解放自己，特别是解除工农的痛苦。<sup>⑮</sup>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只有在革命高潮向北方发展时，北伐才是一次有意义的革命行动。如果北伐只供投机军人和政客谋取个人利益，则北伐的任何成功，都不是革命的胜利，只能是军事机会主义的胜利。<sup>⑯</sup>

陈独秀怀疑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这也许是他采取消极态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认为，北伐实际上是一次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以防止吴佩孚的部队南下，而不是向华北发展革命势力的攻势作战。陈独秀希望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抱真诚合作的态度，解决人民的各种问题，并尊重他们的自由和基本权利，以获得他们的充分支持。只有这样，北伐才有可能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sup>①7</sup> 归根到底，陈独秀不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能够消灭强大的北方军阀。历史证明，他正确地预见到了蒋介石会在北伐期间扩张个人权力，但他错误地低估了国民党的力量。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在上海召开扩大的二中全会。会议附和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一些观点。<sup>①8</sup>

至于莫斯科对待北伐的态度，据罗易说，那里的大人物大多是支持鲍罗廷的。鲍计划采取以下手段夺取权力：第一，呼吁全国欢迎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重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并攻击张静江。第二，加速俄国对冯玉祥的援助，以便使冯玉祥的军队成为国民党在华北的一支革命力量，并邀请冯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访问莫斯科。第三，唐生智加入国民党后，有很大的个人野心，尤其是在他的军队控制湖北以后。鲍决定利用唐反蒋。后来武汉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总之，在北伐头几个月，鲍罗廷的战略主要是阻止蒋介石个人得势，而不是按照中共扩大的二中全会的决议，

在后方发动工农群众。

从以上情况看，在北伐期间，斯大林及其顾问们，和后来毛泽东的作法不同，不知道利用到处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农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二六年十月，克里姆林宫还命令中共，在攻占上海之前，要限制农民运动，以免给国民党将领带来麻烦。斯大林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承认那个命令是错误的。<sup>①9</sup>

更为严重的失算也许是，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甚至在上海的陈独秀本人，都没有预料到国民党的军队竟能打到北方那样远的地方。六个月之内，长江以南各省几乎全部收复。共产国际和中共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目光短浅，或者掌握的情况不正确。

正当北伐军向武汉挺进时，鲍罗廷乘蒋介石不在广州，耍了一个政治手腕。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即攻克武汉数日后，鲍借口重新研究行政和体制问题，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在鲍罗廷和共产党员的把持下，不仅议决敦促汪精卫回国后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而且还通过了迁都武汉的决议。<sup>②0</sup>

联席会议之后，鲍罗廷随即派陈友仁（外交部长）、徐谦（司法部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孙科（交通部长）以及其他几名中央执委去武汉。他们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达。三天后，成立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合委员会（后称“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机构，在武汉执行政府职能。<sup>②1</sup>徐谦当选为联席会议主席，唐生智驻防武汉，鲍罗廷这时的问题是如何使武汉政府合法化。



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攻占南昌，并在该地设司令部。他的直接目标是消灭长江下游孙传芳的部队，以便控制上海、南京这两个金融工业中心。尽管他早先想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sup>②②</sup>这时却决定迁都南昌。

不过，要达到这个政治上的目标，蒋介石会遇到一些困难。政府按照联席会议迁都武汉的决议，已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在广州办公。为贯彻另一个决议，也已正式邀请汪精卫重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只是临时性的。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大多倾向于支持这两个决议。

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起，蒋介石便极力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支持，以实现其政治上的谋略。他提出政府必须设在南昌，因为在北伐期间政府必须在后方工作。同时，他也促请汪精卫回国领导国民政府。<sup>②③</sup>他似乎认为，他可以再次同汪合作并撤去鲍罗廷政治顾问的职务。

蒋介石心里这样打算，对鲍罗廷在武汉的所作所为，暂时予以容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他一再致电武汉，表示支持临时联席会议。<sup>②④</sup>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他甚至亲赴武汉，以求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临时妥协。但是在一次宴会上，鲍罗廷公开批评蒋介石有压迫工农和共产党的倾向，并企图制造对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对立情绪。<sup>②⑤</sup>蒋介石受到莫大的污辱。一周后，蒋

离武汉回南昌，此后完全致力于收复孙传芳占领下的其余各省。

鲍罗廷在武汉除发动反蒋运动外，还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以使武汉政府合法化。蒋介石没有出席，徐谦和其他国民党左派，实际上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把持了会议。鲍得悉汪精卫在回国途中，便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废除政治委员会主席，指定七人组成主席团；废除国民政府主席，指定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废除军事委员会主席，指定七人（后改为九人）组成主席团。<sup>②6</sup> 鲍罗廷希望汪精卫回国，但要剥夺他的权力，以便利用他作为反蒋的政治工具。

这次会议一个更为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都为共产党所左右。关于统一革命军队的决议，明确地规定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sup>②7</sup> 共产党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本已被蒋介石剥夺了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权利，这时在武汉又恢复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同等职权，而且还成立了农业部和劳工部，分别由谭平山和苏兆征这两个共产党员任部长。

不出所料，一九二七年春，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鲍罗廷随即成了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要政治手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知道如何利用左派的反蒋心理去控制国民党，如何利用野心勃勃的将领们的弱点去阻止蒋介石扩张个人权力。他甚至能够把工农动员起来支持革命，帮助实现其政治策略。但他似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级状况。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蒋

介石的容忍是有限度的。鲍罗廷一方面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领导人玩弄权术，并力争获得有野心的资产阶级将领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组织贫农和产业工人，而这些人的革命目标正是资产阶级——蒋介石和那些将领的亲友。换句话说，鲍罗廷为实现其临时对付蒋介石的政治目标所极需团结的阶级（大地主、富商，其子弟是军官），正是贫农和产业工人的革命目标。因此，以贫农和产业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以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以武汉工商界为代表的资本家，这些支持武汉政府的社会力量是互相对立的。各阶级最后都把武汉政府视为敌人，其理由各不相同：无产阶级认为政府对资产阶级太软弱，因为政府不让工人对资产阶级发动大规模革命；资产阶级感到虽然自己被武汉政府用来反对北洋军阀，后来又反对蒋介石，却成了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牺牲品。这样，当蒋介石在南京发动政变时，鲍罗廷就措手不及。

### 斯大林的新政策和宁汉分裂

在发起北伐之后和鲍罗廷抵达武汉之前，斯大林的中国纲领一般地是按照鲍罗廷的建议行事，即在上海攻占以前，限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以利于蒋介石推翻北洋军阀。国共合作仍是其基本政策，但侧重在争取左派，以阻止蒋介石个人得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派巴布诺夫等人来华考察“中国问题”。他们回国后，斯大林要布哈林和罗易写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提纲中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sup>②</sup>



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谭平山，主张利用北伐在全国掀起土地革命。<sup>⑳</sup>但据罗易说，俄国领导人大多支持鲍罗廷而不支持谭平山。<sup>㉑</sup>结果，全会按照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方式，通过了一项二重性策略：既强调农民造反，也支持拥有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斯大林主义者是这样想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实行激进的土地纲领，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丧失对全国解放运动的领导权。<sup>㉒</sup>但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均应在不脱离国民党的前提下进行，因为中国革命在涉及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进行工作。<sup>㉓</sup>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国民党的政府机构，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接触农民的途径。只要共产党人利用左派反对右派，中共就可以将国民党转变成为一个真正人民的党（一个稳固的革命集团，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被剥削阶层），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决定性的斗争。<sup>㉔</sup>

斯大林坐在莫斯科，却十分自信能够为中国革命者指出一条以革命目标发动亿万中国农民的实际途径。他认为农会组成后，革命分子可以打进去，还可以通过新的革命政府机构和革命军队，对农民施加影响。<sup>㉕</sup>一九二七年一月，斯大林派罗易去武汉帮助鲍罗廷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土地革命问题的决议。

鉴于以上所述，毋庸置疑，武汉政府的成立是鲍罗廷执行斯大林新政策的产物，不过经由鲍的运筹策划而带有

其政治上的特征。换句话说，武汉政府之成立，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场反蒋把戏，而不是一种能够持久的政治局面。

当时，随着北伐军迅速向北挺进，陈独秀逐渐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武汉攻克以后，他宣称，北伐乃是封建势力和民主势力之间的战争，有其主义和社会目的，不是仅仅为一人或一党的利益服务。陈认为，如果北伐军取胜，中国最后至少会取得民族独立，并在国内建设民主政治。<sup>③⑤</sup>

一九二六年年底前后，鲍罗廷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中共中央曾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有些人建议将中共中央也迁往武汉，以避免再发生过去鲍罗廷在广州时同上海党中央之间出现过的不协调现象。但陈独秀和大多数中央委员不同意，理由是上海是最重要的革命中心，武汉局势仍然不稳。<sup>③⑥</sup>

陈拒绝迁移党中央是可以理解的。自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一直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政策作为最高权威，以便他在国共合作的轨道上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长时期内，他无视中共的决议和陈独秀个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认为，他如果避开鲍罗廷所在地武汉，至少还可以发展新党员，指导出版党的各种刊物；否则，他这个党的总书记不过是象征性而已。可是，远离鲍罗廷并将党中央保留在上海之后，他和党中央对武汉的形势发展就闭塞了。但作为党的总书记，一旦党在武汉的活动出岔子，他是免不了要分担责任的。

根据张国焘回忆，鲍罗廷认为北伐军虽然在蒋介石的统帅之下，但由各将领分别指挥，这些人并不都是那样忠于蒋介石，大部分北伐军不会支持蒋，因此他满有信心地在武汉建立国民政府，利用国民党左派作为最有效的反蒋武器。<sup>③⑦</sup> 上海中共当局同意并完全支持鲍罗廷的意见，<sup>③⑧</sup> 陈独秀也只好赞成，别无其他选择余地。

武汉政府最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甚至比工人运动还要激进。北伐军的军官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他们这时成了武汉政府的牺牲品。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是武汉国民政府最强大的推动力量，那末，这一运动也许又是后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最强大的武器。一九二七年夏群众运动高涨时，有组织的工农坚决支持武汉政府反蒋——革命好象就要取得胜利了。但是唐生智所部将领和其他军官的家庭是地主或富商，受群众运动之害最大，这些军官就突然掉转枪口反对政府，政府终于垮台。

自一九二七年初开始，上海中共中央忙于发动工人罢工，反对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二月底，数千名工人纠察队已经武装起来。但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却发生分裂。

瞿秋白为首的一派，计划在北伐军进城之前召开“上海人民会议”，成立“人民政府”。他为会议选定三十五名代表，其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为上海人民拥护而在共产党控制下的联合政



府。<sup>③</sup>此计划得到鲍罗廷和武汉政府的批准。<sup>④</sup>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领导的一派，则认为当时的中心问题不是在上海建立和控制“人民政府”，而是组织并武装无产阶级去领导小资产阶级以击败蒋介石的军队。否则，一旦蒋军进入并控制了上海，蒋介石就会大规模屠杀无产阶级，以讨好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那时，纵然上海成立了“人民政府”，并为共产党人所控制，无产阶级政党也会在全国遭到失败，因为蒋介石的反共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出现反革命倾向的一个信号。因而陈独秀派彭述之去武汉，将武装共产党所掌握的上海大多数工人纠察队的计划告诉共产国际代表。

鲍罗廷对党的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反而要求陈独秀立即去武汉——任何重要问题都必须在那里解决。同时，共产国际代表命令上海工人将武器埋藏起来，以免同蒋军发生武装冲突。<sup>⑤</sup>陈独秀再次屈从了莫斯科的领导。

陈独秀在当时提出的作战计划是颇为荒唐的。以数千名未经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如何能抵得过蒋介石的重兵？武汉和上海之间又缺乏协调，一次地方性的武装抵抗如何能掀起全国性的革命浪潮？而且，陈独秀认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象征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如果这个论断正确，一次地方性的武装反抗又如何能扭转反革命逆流。时间这样紧迫，中共在上海又几乎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陈独秀的计划，即便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其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从他失败了的反蒋斗争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个

关键时刻，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所持的立场和观点。第一，在其内心深处，陈独秀仍然不相信通过国共合作完成国民革命后能够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第二，陈独秀完全脱离鲍罗廷建立的、以斯大林的新政策为指针的武汉政府。第三，在蒋介石进占上海前后，陈独秀并没有应变的准备。第四，对于发生流血冲突后国共合作可能破裂，陈独秀更是毫无防备。由此看来，他似乎是听之任之使自己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成为牺牲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汪精卫从巴黎回上海，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在那里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完全支持。<sup>④</sup>

四月二日蒋汪会见后，二人又举行了几次会谈。蒋劝汪放弃去武汉的念头，邀请他去南京领导未来的反共国民政府。<sup>⑤</sup>其后不久，汪精卫大概认为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可加强他讨价还价的地位，便去拜访在上海的陈独秀，并同他签署《汪陈联合宣言》。联合宣言（四月五日发表）重申，中共承认中国革命需要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并再次表示，为抵抗反革命势力，当时中国所最需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成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政府。宣言并告诫两党领导人，不要为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旨在分裂两党的阴谋所蒙骗，还要求领导人互相合作，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sup>⑥</sup>

汪精卫未能同蒋介石达成妥协，便秘密地离上海，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抵达武汉。陈独秀在发表联合宣言后，也在鲍罗廷的催促下去武汉。汪去武汉使蒋得有理由撕毁他们之间关于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共同谅解。蒋介石随即

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共行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次日，通过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的决议，胡汉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同日，发表宣言，号召北伐军和中国人民承认并支持南京政府，推翻共产党控制的武汉伪政府。<sup>④5</sup>

至此，国共两党完全分裂。就连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他说：“帝国主义不仅封锁了整个中国，而且还雇用蒋介石分裂了国民党的统一。”<sup>④6</sup>但他却仍然试图指挥武汉国民政府执行其“正确的”政策。陈独秀又一次在服从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尊重他所认为的中国现实之间进退维谷。

### **共产党在武汉垮台和陈独秀失去党内领导地位**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后，随即在南京发动“清党运动”，不久又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安徽、广西、四川等省。到四月底，在这些省活动的共产党员大部被捕或被处决。<sup>④7</sup>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当时陈独秀正在赴武汉途中，瞿秋白随即召集罗易、威金斯基、张国焘等人，讨论共产党的严重处境。瞿秋白指责上海党中央，当武汉党的领导人已发起反蒋运动的时候，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瞿还责备党中央荒谬地否定广东党组织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的计划。他认为，这种作法危害了党的领导。<sup>④8</sup>



陈独秀当时在同志们的攻击面前无心为自己辩护。中共领导人也许再没有谁比他更为苦恼了。他义不容辞地为党所面临的问题操心，还为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许多朋友和同志的牺牲而悲痛。在这种局面下，他所尽力以求的是找出重建党的办法，并制定一项较为切实可行的政策。

事实上，陈独秀到武汉后，并不想否认对他的责备。但他认为，其他中央委员，如瞿秋白，对促成蒋介石政变也负有同样的责任。照他看来，对党来说前面还有更多的困难。他指出，既然共产国际坚持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必须保持国共合作，就谈不上建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中共如果不顾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开展土地革命以建立苏维埃，党就会脱离世界革命，其结果是苏维埃就会失败。可是，倘要保持国共合作，中共为安抚国民党左派，就得纠正工农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即便采取了这后一种办法，为实现国民革命而力图与蒋介石合作的结果究竟如何，也难于预料。<sup>④</sup>

正是在这种灰心泄气的情况下，陈独秀再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对于时局的见解。他向党建议，要末放弃对国共合作的领导权，要末立即同国民党决裂。政治局委员对他的建议保持沉默。<sup>⑤</sup>很明显，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有相当的削弱。从此，武汉政府制定政策的人看来只有汪精卫和鲍罗廷。

当时，鲍罗廷、汪精卫、陈独秀都认为，出师北伐是打破对武汉的包围并阻止张作霖南下的唯一办法。但是鲍罗廷和罗易在出师方向上意见尖锐分歧。鲍罗廷深知国民

党左派士气不高，坚持进行第二次北伐。他的战略是，协同冯玉祥占领河南这一重要省份，使武汉政府得以通过西北各省和外蒙建立直达苏联的交通线。同时，北伐军还能够达到对南京进行反包围这一最终目标。执行这项计划，土地革命自然要推迟到收复北京以后，但该计划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因为汪认为，重新获得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唯一的办法是同冯玉祥合作。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也支持鲍罗廷。<sup>⑤1</sup>

罗易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代表赴武汉指挥鲍罗廷。<sup>⑤2</sup>他认为，在这个阶段，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扩大地盘，而是如何巩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为达到这个目标，北伐军必须重新夺回广东、江西、福建等南方各省，因为那里的群众革命运动组织得好，但却为右派所控制。罗易认为，一旦重新占领这三个省，北伐军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包围国民党右派在长江下游的据点，并从而击败蒋介石，发起新的北伐。张国焘、谭平山赞同罗易。<sup>⑤3</sup>

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在政策上发生分歧，罗易便请示莫斯科。莫斯科的答复模棱两可：同意在执行军事计划的同时在武汉政府控制区推进土地革命——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不久之后事实也证明如此。

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者为什么不承认中国的现实？为什么要他们在中国的代表去干办不到的事情？必须知道，此时斯大林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为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而制定一项新政策，而是力图证明他的老政策是正确的。他需要在托洛茨基的攻击面前为自己辩护。为此，他尽力把

共产党在中国的失败说成“胜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写了《中国革命问题》，他在此文中好象说，他曾确切的预料到中国的事态发展，包括蒋介石在南京和上海的政变。他宣称，被包围的武汉政府的内部斗争，也进入其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民族革命已转变为工农革命，这将加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地主的斗争和反对军阀、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sup>⑤4</sup>

托洛茨基要求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党，并成立苏维埃。斯大林认为，这种行动就是放弃阵地，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这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希望的。<sup>⑤5</sup>换句话说，斯大林认为，当时成立苏维埃的时机还不成熟。在他看来，必须把武汉的革命国民党转变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便控制整个国家。

显而易见，斯大林当时的计划，仍然是个政治手腕，而不是一项革命政策。他要求他的代表利用武汉政府以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最终从国民党左派手中接管整个政府。

在斯大林指示下，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正式否定托洛茨基的要求，批准了斯大林为中共拟订的纲领：支持国民党左派，继续北伐，并在整个武汉政府辖区开展土地革命。<sup>⑤6</sup>这真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的双重策略——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两手。罗易的主张没有获胜，托洛茨基也得不到支持，而鲍罗廷的计划再次获得通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七日在武汉举行。陈独秀在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一般地赞同土地革命，但认为必须向小资产阶级让步，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在军事行动取得新的进展以前，还必须停止没收土地。<sup>⑤7</sup>

陈独秀的政策同鲍罗廷一致，但同罗易相抵触。共产党因产生两条路线而发生分裂。陈独秀得到彭述之，谭平山等人的支持，以瞿秋白为首的反对派，不同意他的政策，以致攻击他的领导。<sup>⑤8</sup>

第五次代表大会，坚决采纳《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的分析》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体会议关于中共行动计划的决议案》，作为扩大国民革命并加强阶级斗争的指导原则。<sup>⑤9</sup>关于土地革命，大会也采纳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体会议的决议，表示中共要领导农民开展平分土地的斗争。<sup>⑥0</sup>大会决定继续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军事行动。<sup>⑥1</sup>总之，第五次大会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双重策略。陈独秀再次当选党的总书记，但反对他的人开始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武汉政府所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转而反对土地革命和共产党。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仍是合作的，所有问题皆由工农的过激行动造成。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必须保持，工农的过火行动应予纠正。<sup>⑥2</sup>可是罗易认为，武汉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再代表左派，他们已开始同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当时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推翻国民政府。<sup>⑥3</sup>

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同罗易意见一致，但他又作最后

一次努力，建议党改变政策。他向中共政治局提议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党，以独立开展群众运动。瞿秋白完全反对。鲍罗廷虽同意，但他怀疑莫斯科会允许这样作。出于对共产国际权威和政治局多数人意见的尊重，陈独秀又屈从了，这是其最后一次。当时他感到，他虽是党的领袖，但党根本不服从他的意志。从此，他既不再向党的领导机构提建议，也不再采取反对党的政策的立场，而尽量避免同鲍罗廷和党的其他负责人接触。他也许早已意识到党即将开除他。<sup>64</sup>

就国民党左派而言，汪精卫仍然是其最有影响的领袖。他主张国共合作，原是为了挫败蒋介石，恢复自己在国民党中的权威。夏斗寅攻打武汉，许克祥占领长沙，汪精卫均归咎于土地革命。<sup>65</sup>因而他通过武汉政府发布一系列法令，一方面纠正土地革命中的过火行为，另一方面同那些将领们达成谅解。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早先关于土地革命的立场动摇了——在他看来，不采取反对农民造反的立场就会使资产阶级左派反对共产党，这就意味着会爆发内战。<sup>66</sup>但他仍然认为必须支持国民党左派以争取时间，等共产党变得更强大，然后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sup>67</sup>

斯大林决定采取这个战略后，就指示他在中国的代表：没收土地要将军官家中的土地除外；命令中共中央限制土地革命中的过火行为；遣散不可靠的将领，并在湖南、湖北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以建立一支属于共产党的新式军队；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增加一些工农分

子，以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还要成立一个革命法庭，由有威望的国民党员任庭长，审判反动军官。<sup>⑥8</sup>

罗易在六月一日接到这些指示，并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包括鲍罗廷、威金斯基在内，人人都认为在当时形势下无法执行，便决定向莫斯科反映其困难。<sup>⑥9</sup>但与此同时，罗易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将上述指示的副本送给汪精卫。汪之所以同共产党合作，部分是因为忠于孙中山的理想，部分是出于个人掌权的野心。他这时认为，苏联违背了一九二三年《孙文越飞宣言》，并准备将国民革命导向共产主义。当时他和拥护他的人便开始防备共产党接管国民党。

汪精卫采取“等着瞧”的政策，陈独秀和鲍罗廷倒因而变得非常合作。两人都反对推翻国民政府（推翻国民政府是罗易和蔡和森、李立三、毛泽东等激进共产党人的主张）；两人都要求向国民党左派让步。大概他们认为，执行斯大林的政策比别的任何事情都重要。

鲍罗廷竭力以自己的东征计划去打动唐生智。鲍认为，唐有野心，在他进占长江下游之前是不会驱逐共产党人的。<sup>⑦0</sup>罗易因为失去了进行激进的土地革命的理由，也转向汪精卫以挽回不断恶化的局面。这样，东征和联汪便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领导人解救自己的唯一办法。<sup>⑦1</sup>

也许是为了表示诚意，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发表十一点声明，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强调武汉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是国民党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表示他们为避免冲突可随时退出政府；同意工农组织



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并命令拥有武装的工人组织和其他工农队伍服从武汉政府的条例和接受其训练。<sup>⑫</sup>

六月二十八日，鲍罗廷、汪精卫、唐生智三人还在谈判，唐生智所部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突然要求汪、唐将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次日，何键所部便在汉口逮捕共产党员。<sup>⑬</sup>汉口的其他国民党部队也跟着这样做。武汉实施戒严，中共政治局瘫痪了。共产党领导人全都逃往武昌避难。<sup>⑭</sup>

因局势紧张，中共中央于七月三日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和鲍罗廷共同提议，土地革命一律停止，党员集中力量在通商口岸活动，以挑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想这样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响，使统一战线得以重新建立。<sup>⑮</sup>罗易认为这项建议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不予支持，此后他便离开汉口去莫斯科。

斯大林因不了解自己以往所制定的政策在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复杂性，他从罗易和鲍罗廷那里得悉冯玉祥倒向“反革命”阵线，而且武汉政府也倒台了，便将武汉的失败归咎于中共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新的决议案，也责备他们没有发动并领导土地革命；没有改变国民党左派半心半意的懦怯态度；没有使群众对武汉将领可能发生的背叛行为有所准备。<sup>⑯</sup>共产国际于是命令中共党员辞去在武汉政府中的职务，但仍保留国民党员身份，以便带领国民党广大党员反对党的领导及其政策。共产国际还指示中共加强工农群众运动，并要求改进党的领导，使党能够指引中国革命向着新的方向发展。<sup>⑰</sup>为确保其命令得到执行，斯

大林召回鲍罗廷，派两个新的代表（罗明纳兹和牛曼）来华。后来罗明纳兹召开“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党内领导职务，牛曼领导了十二月份广州起义。

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反动军人背叛国民革命。同时，共产党宣布，愿意同国民党中央真正的革命分子并肩战斗，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派。<sup>⑧</sup>

既然在武汉的将领坚决反共，而共产党的政策又日益反军方，汪精卫本人也只得采取反共立场，别无其他办法。七月十五日标志着汪“等着瞧”的政策开始结束。这一天，他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所谓“和平分离”决议案，其中包括以下几点：（1）一个月内，国民党召开四中全会，决定将共产党员逐出国民党问题。（2）四中全会之前，共产党员停止一切活动，但安全受到保护。（3）国民党派一代表团赴莫斯科，讨论中苏之间切合实际的合作办法。<sup>⑨</sup>

如果苏联当时能够改变政策，并制止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汪精卫同共产党合作的大门还是敞开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汪看到一份题为《告中国青年劳动者》的共产党传单，将武汉政府称作中国革命的敌人，他这时才最后决定逮捕共产党人。<sup>⑩</sup>共产党员从此转入地下，大部分离开武汉去上海和其他城市。共产党在罗明纳兹和牛曼（他们于七月二十三日抵达武汉）的影响下，当时已在酝酿新的领导人，并在制定武装起义的方针。

据张国焘回忆，七月十五日以后，陈独秀一直避免接

触党员。他在七月十五日向党中央写了一封内容很简单的信，说他不能继续担任总书记，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执行其政策，而不让他们退出国民党。<sup>⑧</sup>当时，鲍罗廷以健康不佳为借口，偕瞿秋白到庐山，他们在那里讨论了中共新的领导人问题，鲍随后于七月二十七日离华回莫斯科。<sup>⑨</sup>张国焘和周恩来奉命负责党中央和党员撤出武汉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返武汉，开始考虑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瞿尽力说服张国焘接受鲍罗廷和他关于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结论性意见。他说，中国革命已经失败，尽管中共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但不能归罪于共产国际。中共当局必须引咎自责，因为共产国际的威信倘若受到损害，就不利于它领导世界革命，就会帮助托洛茨基分子攻击斯大林的领导，而最有害的，会使党员怀疑共产国际的领导。瞿秋白因而建议，为提高党的新领导人的威信，必须把陈独秀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并对党的失败负责。<sup>⑩</sup>

张国焘对瞿秋白的主张表示愤慨。他断言，在武汉遭受失败，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其主要根源。对这种政策不作实事求是的彻底检查就将失败归罪于陈独秀，是不公正的。他质问，不顾革命道德，新的领导怎么能够建立得起来。<sup>⑪</sup>

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张国焘和瞿秋白最后达成妥协。二人一致同意党中央秘密地迁回上海。张国焘赞同中共承担失败的责任，以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并保持共产国际



和中共之间的良好关系。瞿秋白向张表示，他将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共没有正确地、有力地贯彻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他们决定，陈独秀（对党内事务已采取消极态度）不应再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机构必须改组。<sup>⑮</sup>

### 注 释

- ① 《斯大林全集》(莫斯科, 1952年版)第8卷, 374—379页。
-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 1966年版), 94—100页。
- ③ 《列宁选集》(纽约, 1935—1938年版), 第5卷, 145—146页。
- ④ 《斯大林全集》第8卷, 384页。
- ⑤ 《托洛茨基文集》, 100—101页。
-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
- ⑦ 《斯大林全集》第8卷, 378—379页。
- ⑧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第3页。
- ⑨ 同上, 并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5期, 92—93页。
- ⑩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第4页。
- ⑪ 同上, 第3页。
- ⑫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周报》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 ⑬ 陈独秀:《致蒋介石的一封信》, 同上。
- ⑭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 ⑮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 ⑯ 同上。
- ⑰ 同上。
- ⑱ 威尔伯与郝(Wilbur and How):《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在中国文献——1918年至1927年》(纽约, 1950年版)。
- ⑲ 斯大林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纽约, 1935年版)。
- ⑳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纪录》(广州,

1926年10月)。

- ⑳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纪录》，(广州1926年12月13日)。
- ㉑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南京，1927年版)，第17卷，第105页。
- ㉒ 唐朗里(译音)：《中国革命内幕》(伦敦，1930年版)，第262页。
- ㉓ 同㉒注，第20卷，第55、63页。
- ㉔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年版)第2卷，第536—537页。
- ㉕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1958年版)第16卷，第18—22页。
- ㉖ 同上。
- ㉗ 罗伯特·诺尔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美国，1953年版)第90页。
- ㉘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12月1日)，第1430页。
- ㉙ 同㉘注，第91页。
- ㉚ 尤丁与诺尔斯：《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计划》，第359页。
- ㉛ 同上，361页。
- ㉜ 同上。
- ㉝ 斯大林：《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86—387页。
- ㉞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 ㉟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6期(1967年6月)，第92页。
- ㊱ 同上，第7期(1967年7月)，第96页。
- ㊲ 同上。
- ㊳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
- ㊴ 《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速记录》，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年版)第2卷，第591—592页。
- 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 ㊶ 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加尔各答，1946年版)，第520页。
- ㊷ 《蒋中正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出席总司令部第五次纪念周讲辞》，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66年版)，第2卷，第616—

617 页。

- ④ 陈独秀后来回忆说，联合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拟定的。因此，宣言无疑是由陈独秀本人起草的，因为汪精卫即便属于国民党左派，也不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起草一份联合宣言。
- ⑤ 蒋介石：《蒋总司令告国民党同志书》，《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卷，第274—280页。
- ⑥ 《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4月21日)，第525页。
- ⑦ 同⑤注，第649—669页。
- ⑧ 同⑥注，第8期(1967年8月)，第89页。
- ⑨ 同⑥注，第8期(1967年8月)，第89—90页。
- ⑩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 ⑪ 诺尔斯与尤丁：《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美国，1963年版)，第61—63页。
- ⑫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432页。
- ⑬ 同⑫注，第63页。
- ⑭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为宣传员而写的提纲》，《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9页。
- ⑮ 同上，第229—231页。
- ⑯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1927年5月。
- ⑰ 《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4期(莫斯科，1927年6月9日)，第716—717页。
- ⑱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版)第1卷，第360—361页。
- ⑲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1927年5月9日。
- ⑳ 同上。
- ㉑ 同上。
- ㉒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引自黎民魂所编《赤色档案》(北平，1928年版)。
- ㉓ 同上。
- ㉔ 同⑳注，第10期(1967年10月)，第90页。
- ㉕ 《武汉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纪录》，武汉，1927年5



月30日。

- ⑥⑥ 诺尔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美国，1953年版）。
- ⑥⑦ 赫罗德·伊塞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本）（美国，1951年版）。
- ⑥⑧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引自郎醒石所编《革命与反革命》（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
- ⑥⑨ 同⑥⑥注，第11期（1967年11月），第89页。
- ⑦⑩ 同⑥②注，第51—52页。
- ⑦⑪ 同⑥②注，第52页。
- ⑦⑫ 同⑥⑥注，第11期，第92页。
- ⑦⑬ 《武汉分共之重要文献》，《国闻周报》第29期（1927年7月31日）。
- ⑦⑭ 同⑥②注，第51—52页。
- ⑦⑮ 同⑥⑥注，第108页。
- ⑦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议案》，《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7月28日）。
- ⑦⑰ 同上。
- ⑦⑱ 同⑦⑬注。
- ⑦⑲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
- ⑧⑰ 《武汉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
- ⑧⑱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上海，1929年12月10日）。
- ⑧⑲ 同⑥⑥注，第12期（1967年12月）第90页。
- ⑧⑳ 同上，第92—93页。
- ⑧㉑ 同上，第93页。
- ⑧㉒ 同上，第94页。

## 二、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点

陈独秀最后一次露面，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一次讲话。一九三九年春，因健康情况不佳，他偕妻子由重庆去江津，在该地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他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此外，还通过通信，同友人探讨政治哲学，其中一些通信于一九五〇年汇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出版。

陈独秀晚年虽然清贫，但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和某些老朋友的资助。他坚持自食其力，这大概是他整天忙于讲演、写作和教书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健康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活动。后来，他的一位老友、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设法接济了他：他从昆明联大领月薪，条件是联大独家出版他的中国古文字学论著。这个办法，最能满足他既隐居而又维持经济自立的愿望，也为国民党政府所欢迎，因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国民党政府这时对他也有好感了。他时而也感到孤寂，但他却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牵连。他所发表的各种政治见解，无疑是他个人的，除了代表他自己外，谁也不代表。他甚至宣称，就是朋友们抛弃他，他也不在意。

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研究中国古文字学。他认为自己应当发表对国家以至对整个世界的见解。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已经卧床不起，还与朋友们通信，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下面就谈谈他对于共产主义、苏联、民主以及世界形

势的最后见解。

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入侵波兰，欧战爆发，陈独秀这时敏锐地觉察到民主和极权问题。重庆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反复刊登列宁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共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参战各方都是掠夺成性的好战分子。中国托派机关报《动向月刊》也持这种观点。

陈独秀在致友人西流的信中指出，列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之所以正确，正是在于它没有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观点。列宁的论点是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情况的分析为依据的。陈独秀认为，任何政治理论，都不能离开时间和地点。在他看来，说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重蹈覆辙，只能是指重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而不能说是历史事件本身重演。陈独秀认为，第二次大战，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发生在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为了维护民主，中国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应该同盟国一起战斗，制止极权主义倾向的发展。<sup>①</sup>

当时，莫斯科对待盟国和纳粹德国的态度，在陈独秀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九三九年春，苏联虽仍然表示愿同其他国家一起抗击德国侵略，但已经准备不久要在政策上来个急转弯。在回顾日本侵华过程时，斯大林指责西方各国自扫门前雪，导致一些国家去同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两方面都搞交易。斯大林暗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外交手腕来保卫自己。一九三九年八



月，在斯大林谴责西方国家之后仅仅五个月，莫斯科便同纳粹德国签订一项条约（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苏联再一次同一个死敌联合在一起。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很难说是形势所迫，或出于策略，或纯粹是偶然事件。不管怎么说，这种政策上的逆转，使不得不表示拥护并为之而辩解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为难。陈独秀下决心揭露共产国际的两面派面目。他断言，一个人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既反希特勒又亲希特勒。既同希特勒斗，就不应再同希特勒的敌人斗，不然就不可能打败纳粹德国。<sup>②</sup>

一个月后，陈独秀又向西流写信，谈反极权主义战争的真正意义。在此信中，他不仅站在为民主而斗争的盟国一边，而且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比作希特勒德国的纳粹政府。<sup>③</sup>

陈独秀的一些朋友写信给他，反对他支持盟国。他们怀疑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否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应首先打败资本主义国家，被压迫民族才能动员起来，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陈独秀在一九四〇年七月接到此信时已经卧床不起，仅能复以短函。在复信中，他列举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无法院拘捕证不能捕人；不经议会通过不得征税；除执政党外，其他党也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有罢工自由；农民有耕种土地的权利；有思想和宗教自由。他强调指出，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也许还不完善，但却为人民所普遍需要，并且是经过了大约七个世纪的斗争得来的。可是自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来的共

产党领袖们理解不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价值，反而认为这种民主为资产阶级所操纵，是虚伪的骗局。于是，这种民主便遭到布尔什维克政府、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一致反对。<sup>④</sup>

陈独秀进一步说，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在其实质或特征上，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区别，只是实施范围广狭不同。遗憾的是，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政府用“无产阶级民主”这个空洞的名词，攻击资产阶级真正的但不完整的民主。陈独秀这封简短的复信，不仅表现出自己超乎所有政党之上，进行独立思考，而且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制度和民主的看法。陈独秀约有二十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历，大概最有资格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最有资格指责“无产阶级民主”的空洞性。他认为，只有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制度，才是进步的政治制度。<sup>⑤</sup>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陈独秀从朋友那里收到另一封信。他当时病已很重，但并未因此而停止探索真理。他花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才写出一封回信。<sup>⑥</sup>他在信中重申：“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两者都追求基本人权和自由。如果没有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或大众民主，所谓“大众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斯大林式的少数人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sup>⑦</sup>然而，陈独秀并不认为这都是斯大林的过错。相反，他归咎于政治制度本身。斯大林所犯的一切罪过，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合乎逻辑的发展。他说，这都是实行反民主专政（采用秘密警察制度与

一党制，无任何自由）的后果。他重申，并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本身造成了这些祸害。<sup>⑧</sup> 按照陈独秀的观点，防止出现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唯一的办法是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民主政府。不在政治制度上进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便斯大林本人倒台，苏联以及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类似斯大林的独裁。陈独秀的中心思想是，苏联产生极权主义独裁的根源，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个人。<sup>⑨</sup>

陈独秀所要强调的是，不管使用什么政治术语，任何时代的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将真正的民主放在首位。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他说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公民也应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对党应享有同样的自由。否则，政治机器就一文不值，不管它是采取议会形式，还是苏维埃形式。<sup>⑩</sup>

显而易见，陈独秀经过六、七年的独立思考（不再因对共产党负有责任而受束缚）之后，不仅增强了对民主的信念，而且认识到了近代民主的精华，即反对党享有自由。这一点的确是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根本区别。有了这种对民主的深刻理解，陈独秀就能够看到，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是互为补充的。一方面，民主并不是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虽鼓吹大众享有政治权力而缺乏民主，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⑪</sup> 政府若不采取民主体制，社会主义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在陈独秀看来，常和“民主”一词等同的“议会民主”，不过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形式。民主的理想，始终是人类努力争取的最高奋斗目标，随着历史进入更高阶段，这个理想本身也有了发展。自希腊、罗马实行民主制度以来，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容丰富了，范围也扩大了。现代民主，后来虽因受资产阶级控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但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广大群众都是欢迎的，因为它是许多世纪以来经过无数人民的斗争和牺牲得来的。<sup>⑫</sup>

有鉴于此，陈独秀指出，将资本主义统治和民主制度一起推翻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他看来，科学、近代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是人类最光辉的三项发现，也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不幸的是，俄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完全破坏了民主的本质。十月革命之后，当时整个政府已经在无产阶级控制之下，本来没有必要再建立一种取代民主制度的极权主义制度。陈独秀认为，民主制度可以防止产生官僚特权，但是列宁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这种制度。到了布尔什维克滥用政治权力的时候，列宁才开始大声疾呼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组织必须实行民主，但为时已晚。<sup>⑬</sup>

陈独秀坚信，莫斯科、柏林、罗马已成为反动的大本营。那里的独裁者，企图将现代世界退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将有头脑的人类，变成机械一般的奴隶。陈独秀告诫说，任何有意义的斗争，都必须同摧毁这三个反动中心联系起来。诸如“无产阶级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之类好听的名词，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这三个独裁者加强与扩

大其非人道的统治。<sup>⑭</sup>

为了说明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互不相容，陈独秀将二者作了如下对比：

在英、美、法民主制度下

1. 议会或国会经全体公民  
从各政党中选出。

2. 无法院命令不许捕人  
或处决人。

3. 反对党，包括共产党，  
容许存在。

4. 有思想、言论、出版自  
由。

5. 罢工本身不算犯罪。

在苏、德、意极权制度下

1. 苏维埃或国民会议由政府  
从一个政党中选出。

2. 秘密警察可奉独裁者之  
命捕人与处决人。

3. 只容许一个政党存在。

4. 无思想、言论、出版自  
由。

5. 罢工是犯罪，不许发  
生。<sup>⑮</sup>

根据上述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对比，陈独秀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优越。

很清楚，陈独秀在这个阶段的政治见解，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各种政治理论。在他看来，不管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民主的理想都是相同的。同样地，只要人们的自由受到压制，无论是苏维埃还是纳粹，都是极权主义制度。换句话说，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必须作为政治制度的唯一奋斗目标。这个观念，对于政治上分析问题深刻的自由派思想家来说，也许并不稀奇，但对一个信奉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人来说，确是异乎寻常。

一九四二年春，就在陈独秀去世前不久，他写了三篇文章，展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他特别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前途。他断言，只有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革命高潮，被压迫民族才能获得解放。<sup>①⑥</sup>也就是说，由于战后时期国际形势变化得快，孤立地发动一场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将会减少。理由有二：第一，任何战争，包括民族解放战争，都会给国民经济以及国内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极大的紧张，这会使一个落后的国家更加落后。第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帝国主义强国的援助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样，落后国家就决不能获得完全的独立。

按照陈独秀的观点，被压迫民族和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希望，是自己联合起来，齐心协力，一劳永逸地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那时，国际社会主义就将取代以商品交易为特征的资本帝国主义旧世界。在国际社会主义实行劳动分工原则的新制度下，那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sup>①⑦</sup>陈独秀的见解，不同于毛泽东的号召世界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战争理论。这种理论声称，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榜样。

归根到底，陈独秀认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好办法，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解放被压迫民族。他这个观念，显然是在俄国革命初期产生的。当时俄国革命在国内实现了平等，并废除了沙皇政府强加于被压迫国家的不平等条



约。陈独秀认为，这些都属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列。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莫斯科视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灯塔和大本营，其原因也在于此。<sup>⑱</sup>不幸的是，当苏联领导人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干涉其内战的时候，便开始改变了他们原来的革命政策，只知道追求俄国一国的利益。其结果，苏联在当代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不再是被压迫民族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sup>⑲</sup>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对苏联修正主义者也进行了类似的谴责。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展开激烈论战时，他们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完全抛弃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并破坏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sup>⑳</sup>

不容怀疑，在陈独秀所设想的国际社会主义新秩序中，必须维护民主，一切被压迫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陈独秀极其强调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团结。他为政治世界正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前景，但对国际政治的总趋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为战后时期，民族主义继续是支配人类事务的动力。

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去世。因他在最后四年同现实政治生活完全隔绝，中共和国国民党政府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都完全保持沉默。

## 注 释

- ① 陈独秀致西流等的信 (1940年3月2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② 同上。
- ③ 陈独秀致西流等的信 (1940年4月24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④ 陈独秀致连根的信 (1940年7月31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⑤ 同上。
- ⑥ 陈独秀致西流的信 (1940年9月),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⑦ 同上。
- ⑧ 同上。
- ⑨ 同上。
- ⑩ 陈独秀: 《我的根本意见》。
- ⑪ 同上。
- ⑫ 陈独秀致西流的信 (1940年9月)。
- ⑬ 同上。
- ⑭ 同上。
- ⑮ 同上。
- ⑯ 陈独秀: 《战后世界之轮廓》,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⑰ 陈独秀: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 ⑱ 同上。
- ⑲ 同上。
- ⑳ 林彪: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王应一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2 9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